



訂 增
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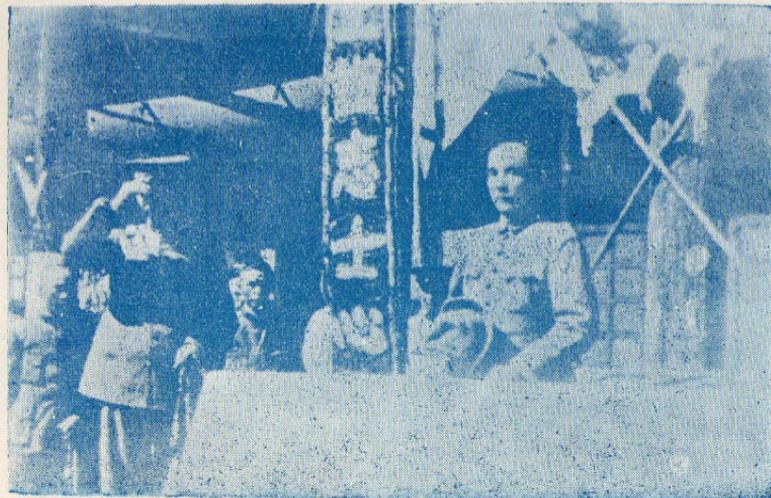
李浴日 著

世界兵學社發行

國父肖像



國父侍立黃埔軍校



國父蒞詔關誓師北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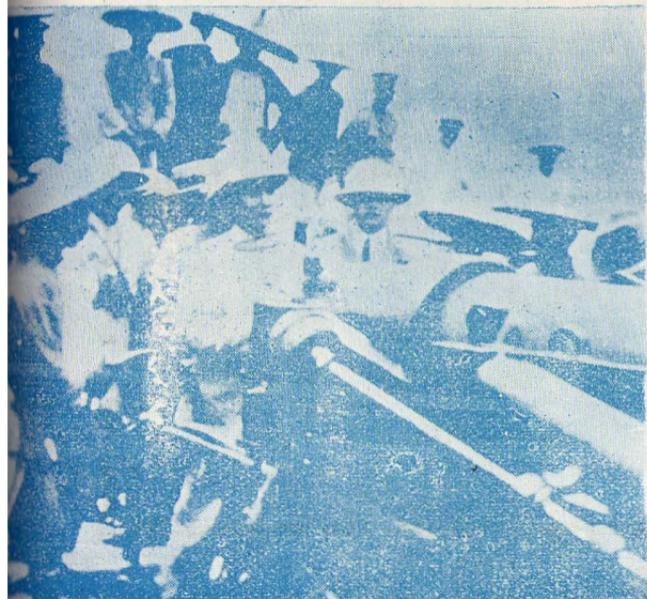
地陣龍石察考等察幕率父國

… 役 之 江 東 …

城州惠擊攻砲重揮指岸對州惠在父國



鐵近附龍石在父國
軍敵攻進兵督路



大家要知道：我們 總理就是一個大軍事家，由

於他能研究軍事，精通軍事，所以他能夠發明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創造本黨，領導國民革命，建立中華民國。

——恭錄 蔣總統「軍事之要領」

鄒序

國父於學孜孜不倦，於書無所不窺，嘗有問 國父究治何種學問者， 國父語之曰：「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也。凡一切學問，苟有以助余革命智識及能力者，余皆以為研究之資料，俾以組成余革命之學也。」 國父於學勤博如此，自立體系如此，故不論何種學說，皆能取其精而用其宏，咀其華而含其英，融匯之，貫通之，今讀遺教，無所不包，靡學不具，治遺教者，各以其所治而求之，莫不各有所得，如入百寶庫藏者，必能恣其所悅而懷寶以歸，絕無求而不獲者也。李君浴日風治兵學，見解獨到，近取 國父有關兵學遺教，著 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一書，將 國父各種戰爭理論，分別闡述，其研究可謂勤而有獲者矣。夫革命者，應乎天，順乎人，而革故鼎新之大業也。質言之，用生存戰政治戰經濟戰以翦戰勝敵人，而達到平等自由和平，以竟革命之全功也。 國父之生存戰，以民族主義為武器；政治戰，以民權主義為武器；經濟戰，以民生主義為武器。猶憶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國父在廣州歡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時，講演「主義戰勝敵人」，即以此訓示黨員。復申言：「有此主義為武器，又必須堅信其可以獲致勝利。革命鬪士，有此信念，乃能一以當百，如黃花崗鎮南關武昌河口各役，迭次起義，類皆以少敵衆，莫不以幾十人或幾百人敗清兵數萬，為兵家之所咋舌稱奇也。」昔皇甫肱曰：「太公論將，曰勇智仁信忠；孫子論將曰智信仁勇嚴。」太公以勇為首，孫子以智為先，誠以勇非智無以成，智非勇無以行。 國父

以智勇均為革命軍人所必備，又以實行三民主義為革命軍人之仁，故能以少敵衆，以寡勝多，實比姜太公與孫子為進步。李君此書，首言國父戰爭思想，次言戰時政治經濟宣傳諸端，並以精神力為決勝之本，是已深得國父革命戰理之真諦，於目前加強反抗餓之貢獻，尤不鮮也。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六月十日 鄒魯序于臺北

自序

「當今之世，能戰則存，不能戰則亡。」這是國父的名言。國父又說：「拿歷史來證明，從前宋朝怎樣亡國呢？是由於崖門一戰，便亡於元朝。明朝怎樣亡國呢？是由於揚州一戰，便亡於清朝。拿外國來看，華鐵路一戰，拿破崙第一之帝國便亡。斯丹一戰，拿破崙第三之帝國便亡。」這些勝敗存亡之理事，大家在今日總可澈底了解吧！

蔣百里先生說：「生活條件與戰鬪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這是指出我民族國家五千年來強弱興亡的癥結所在，到了今日，大家還不覺醒嗎？

所以我們在今日不要害怕戰爭，更不必諱談戰爭，我們要習慣戰爭，參加戰爭，更要把我們正確的戰爭理論建立起來。

偉大的反共抗俄戰爭，是一個長期的戰爭，也是一個新型的戰爭，最忌空談，尤忌盲動。它要有理論的基礎，更要有正確的理論來做行動的指針。這便是我今日出版這本書的動機。

國父戰爭理論是中國歷史的產物，是由研究到實踐的結論，博大精深，闡揚匪易，尤其散見於全部遺教之中，未成體系，整理確要相當時間。記得民國三十一年，我基於研究孫子兵法的啓示，及創辦「世界兵學」雜誌的機會，在韶關一個山崗上或作或輟，費時一年，並經博訪周諮，寫成本書的前身「中山戰爭論」，出版之後，曾承中宣部嘉獎。勝利還都，由

葉出版社印行，校對不精，錯誤驚人。現以時代的需要，爰將修正補充，並配合反共抗俄，易名「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適為俗務困擾，未能盡量發揮。校對時，雖欲增添，已受限制。至於體系的構成，資料的處理，幾經考慮，不知絞盡了多少腦汁。

對 國父革命戰理作有系統的研究，尚無第二部著作。我不敢說本書已臻於完善，不過讀者於本書裏，對 國父戰爭思想的正確，國防計劃之宏偉，戰時政治經濟宣傳的重視，還有：建軍方略，精神重於物質，對外抗戰應採取的戰略，以寡擊衆的非常戰術，以及 國父怎樣成爲一個大軍事家，知難行易在軍事上的價值等等，自可得到一個明確的認識，由認識進而實踐，亦即說我們能夠切實遵照 國父這套最明智而正確的戰理來反共抗俄，必可爭取最後的勝利，且可縮短勝利的時間。

于先生右任爲中國現代文武兼全的人物，亦即「中山型」的人物，本書此次出版，作者嘗謁於其寓邸，承賜鼓勵，並親題封面。鄒先生海濱追隨 國父多年，功高黨國，著述等身，憶前寫「中山戰爭論」時，在渝迭荷指示，此次又承賜序，均使本書增色不少，感激之餘，謹此誌謝。

又，本書此次出版，慎重再三，各章均分別敦請友好評閱一過，並承指正，感激無既。爲求完善起見，謹以至誠希望讀者賜予教正和批評，以便他日重訂。拋磚引玉，尤所企望。

李浴日

民國四十年
七月一日序於臺北

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李浴日著

目次

照片

鄉序

自序

一、緒言——國父確是一個大軍事家……………(一)

一、國父研究軍事的經過 二、國父指揮軍事的經過

二、戰爭思想……………(一九)

一、爲生存而戰 二、爲和平而戰 三、爲剷除障礙而戰 四、爲抵抗侵略而戰

三、國防建設……………(三)

一、國防政治建設 二、國防經濟建設 三、國防文化建設 四、國防軍事建設

四、戰爭與政治……………(四)

一、內政方面 二、外交方面

五、戰爭與經濟

- 一、財政方面
- 二、工業方面
- 三、糧食方面

(五)

六、戰爭與宣傳

- 一、宣傳戰的效果
- 二、宣傳戰的對象
- 三、宣傳戰的種種

(六)

七、建軍要圖

- 一、整理軍政
- 二、練兵要點
- 三、官兵生活
- 四、兵工政策

(七)

八、軍人精神

- 一、精神重於物質
- 二、軍人的精神力

(八)

九、軍隊紀律

- 一、倒清時代的軍紀
- 二、倒袁時代的軍紀

(九)

十、戰略戰術

- 一、戰略方面
- 二、戰術方面

(十)

十一、戰史述評

- 一、關於本國戰史
- 二、關於外國戰史

(十一)

十二、結論——知難行易的軍事上證明

(十二)

一、緒言——國父確是一個大軍事家

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中國國民黨的手創者，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建設者——國父孫中山先生，向來一般人一致推崇他為現代中國一個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却很少認識他也是一個大軍事家，在遺教中建立了現代中國革命的戰爭理論。這個整理和闡揚的任務，正待我們今日來把它完成。

國父一生雖然沒有機會進過軍事學校，却常和軍事專家研究軍事，並自修古今中外的兵書，尤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在西醫學校時代科學修養的精湛，更助他成爲一個大軍事家的存在。國父原是愛好和平的，但爲完成國民革命，不得不採用戰爭手段，亦即「革命的手段」，一個健全的革命領袖固要擅長政治，亦須兼長軍事。退一步說，縱不一定要有用兵的天才，起碼亦須懂得軍事。

現在我們研究 國父的革命戰理，首先應知道 國父研究軍事及指揮軍事的經過實情，因爲這是國父成爲一個大軍事家的存在，亦即 國父戰爭理論的淵源。

一、國父 研究軍 事的經 過

根據我們的考證：國父的研究軍事應溯源於太平天國滅亡後十年，國父十一歲在村塾讀書時，村中有一個太平天國的遺兵，常到塾裏爲學童講述洪楊革命的故事，國父聽得，深慕洪秀全之爲人，推翻滿清之志，不禁油然而生，遺兵對 國父特加愛許，一遇無事，便和 國父詳談當年戰事，如洪秀全怎樣起義，怎樣從廣西打到湖南，再打到武漢和南京等等。並以洪秀全第二勉 國父，國父得此徽號，引爲無上榮耀，亦輒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國父自決心致力革命之後，對於軍事學術即特別留意。一八八七年（丁亥）入香港西醫書院研習醫學，常置鉅幅中國地圖於樓壁，對之而審思攻守之方。此為兵要地理研究的開始。又與陳少白、尤少執、楊鶴齡三人朝夕往還，亦常研究軍事問題。一八九四年（甲午）北上上李鴻章書，並「遊市北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自傳」）此為政治軍事的實際考察。

一九〇三年（癸卯）夏，國父安南東渡日本，致力外交活動，結識日野熊藏少佐，日野留英多年，為日本軍事專家，以研究南非洲波亞人（註一）抵抗英軍所採用的散兵戰術，及發明日本式盒子砲，聞名於時。國父認此種戰術最適用於揭竿起義的中國革命軍，乃與日野研究，除筆記其口述外，並購置英文的英波戰史及圖籍百數十卷，日夕觀摩，孜孜不倦。同時為實施同志以軍事訓練，又秘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延聘日野為校長，小室健次郎大尉為助教，學科除普通兵學及製造盒子砲炸藥外，尤注重波亞人散兵戰術的傳授。第一期學生共十四人，開課之日，國父親臨致訓，聽者深受感動。至於國父當時為推翻滿清，在粵桂邊境及各地所組織的革命軍或稱「民軍」，類似今日的游擊隊，戰鬪所用的戰術，即是散兵戰術（亦稱「波亞戰術」）。往後國父於民元發表「錢幣革命通電」，曾暗示採用散兵戰術以抵抗帝俄。迄民十一年於「軍人精神教育」的講詞中又主張採用游擊戰術（即散兵戰術），以與北方軍閥交戰，可見國父對散兵戰術的心得，及起義軍事所受散兵戰術的影響。

國父的學問博而精，對古今中外有用之書，無所不讀，兵書尤為愛好。加以他的虛懷若谷，又常與國軍事專家切磋，像上述的日野，便是其一。此外還有美國「天下最傑出軍事家」堪馬利將軍（註二），俄國嘉倫、李摩及英德法將校多人。

國父對普通軍事書籍，如典範令及各種教程，莫不熟讀。在「民權初步」的自序中，曾提及步兵

經典說：「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瀏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軍人精神教育」起亦提及游勇戰術的伏擊技能「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對於外國軍事名著更爲愛讀，據一位老同志最近給我的信說：「總理所讀各國兵書，以德著英譯爲多。據言：軍事學以德著爲第一。」又說：「總理對外人用兵者最崇拜拿破崙，書架上滿置各國名人關於拿破崙之著作。癸卯年（民前九年）曾語人謂：拿破崙略，百年後始大放光明，蓋歐人研究拿破崙戰略之佳本，多出版於百年以後也。總理對拿破崙每次戰役，皆瞭如指掌，有條不紊，據言：諸役以攻奧一役爲最神妙，於戰史上最有價值。」（註三）其次對於我國古代各家兵法，亦有精湛研究，就中以孫子兵法爲最。曾評該書說：「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民權主義」第一講）又對同志說過：「拿破崙的作戰，深得孫子的蘊奧。」（註四）原來拿破崙在歐陸作戰，陣中常披閱法譯孫子兵法。當對同志講解太平天國戰史及其他攻守之事，輒引孫子的原理原則來說明，有時並很詳細地指出那原理原則見於孫子兵法中第幾篇第幾頁第幾行。（註五）

此外，國父於各種演講中常喜以軍事爲喻，他說：「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民權主義」第五講）又說：「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第六講）又說：「亦猶之軍人上陣戰爭，必須明白其槍砲之效力，及其用法。……譬如草人提槍射擊，若命中，其人必死，否則亦傷。」（「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講詞）又說：「這次的大會（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浴日誌）好像是一個大軍事會議，定了種種作戰計劃，下了許多攻擊命令，交各將領帶回去實行作戰一樣。又好像是一個大兵工廠，製了許多槍砲，出了很多子彈，諸君在此領了很多槍砲子彈，回到本地去，便要分給到各位同志去補充他們，各位同志得了補充，便要他們實行攻擊，不可空耗了這些補充，到了實行攻擊的時候，必須察察敵情，隨機應變，對於敵人要能够收效，那才算是冤枉了這補充。」（「黨員

之奮鬥同於軍隊之奮鬥」講詞)於此，亦足見 國父對於軍事的興趣與研究。

二、國父 揮指軍 事的經 過

國父致力革命，認為欲掃除革命的障礙，不是單採用和平手段所可完全奏效，必須假以軍政時期，斷然採取戰爭的手段。在歷史上，像我國的湯武革命，美國的獨立運動，法國和俄國的大革命。

國父於一八八五年(乙酉)中法戰爭結束之時，即決意致力於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正如自何所述：「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以醫術為入世之媒。」而首先採取軍事行動，以圖推翻滿清，係肇端於一八九五年(乙未)廣州之役(第一次起義)。如自傳說：「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為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為機關。當時贊襄幹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為機關者，則陸皓東、鄧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通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澹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眾，本可一舉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彈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之第一人。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帥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因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這一役，國父是在廣州親自指揮的，這是他第一次指揮軍事的光榮記錄，雖不幸失敗，國父的英勇已可概見。

自此而後，國父更積極地策劃軍事的進行，由他直接發動同志起義的，有一九〇〇年(庚子)惠州之役(第二次起義)，一九〇七年(丁未)潮州黃岡之役(第三次起義)，惠州七女湖之役(第四次起義)，欽廉之役(第五次起義)，鎮南關之役(第六次起義)，及一九〇八年(戊申)欽廉上思之役(第七次起義)，雲南河口之役(第八次起義)，就中惠州之役，國父由日本到臺北，(按國父到臺

共有兩次，此爲第一次，尙有一次在民國二年）親自策劃，一面令鄭士良在惠州起義，一面就地加聘軍官備用，依 國父的計劃，惠州的革命軍要沿着海岸向東推進，以廈門爲目標， 國父則由臺渡海，親臨督戰。旋因日本政變，計劃遂遭破壞，但臺灣在中國革命史上已寫上光榮的一頁。欽廉之役， 國父派王和順率領二百餘人大破清兵於王光山，當時安南的法文報紙曾論此役說：「此次革命軍，不知用何戰術，能一戰而去清兵四分之一，可稱奇捷。」尤以鎮南關之役， 國父親臨督戰，以一當十，更表現了革命統帥的英勇和偉大。

鎮南關是桂省南部的一个重要隘，向有「第二旅順口」之稱，這一役可以稱爲小規模的要塞戰。 國父當時欲奪取鎮南關，以壯革命聲勢，乃派黃明堂於十月二十六日率領百餘人襲取該關。當將所有鎮中鎮南鎮北三座砲台完全克復。 國父在河內接得捷報，興奮異常，乃率同黃克強、胡漢民、胡毅生、及日本志士池亨吉（新聞記者）、法國退職砲兵上尉（佚名）等，於二十九日從河內搭乘火車直達同登站（距鎮南關只有數里）下車步行抵關，時已入夜，當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防禦計劃，並指定何伍坐守鎮南，李裕卿坐守鎮中，自己與明堂、克強等坐守鎮北，檢查所俘戰利品，爲數無多，不足以增強我軍的戰鬥力。而清軍陸榮廷等却率眾二千餘人浩浩蕩蕩地來圍攻。 國父利用居高臨下的地形，沉着指揮守軍抵抗，又親自督率法國砲兵上尉發砲，轟擊敵陣，使敵人不敵仰攻。惜因聚寡懸殊，未能由守勢轉爲攻勢，給敵人以包圍殲滅。到第二天 國父爲逼返河內，籌款購械，以圖大舉，便偕同行者乘黑夜繞道下山。惟仍令明堂等繼續抵抗，因糧盡彈絕，及活躍於十萬大山的友軍道遠不能來援，一直抵抗到十一月四日，才突圍而出。（註六）

可是，上述各戰役，在軍事上，雖然收效甚微，在政治上，卻得到偉大的成功，震撼羶屨的心膽，樹立大漢的聲威，造成革命的時勢，促進全國各地的起義。然而 國父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以清廷

的辭緝，遠避海外，仍命國內同志到處發難，於是便有一九一〇年（庚戌）廣州新軍之役（第九次起義）及轟動全國的一九一二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第十次起義），因而促成是年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國父在海外聞訊，奔馳回國，各省代表於十一月十日齊集南京，選舉國父爲臨時大總統，民元正月一日宣誓就職。這時清帝溥儀，仍負隅北京，國父毅然主張用武力徹底解決，積極進行北伐軍事，每召集各軍將領指示機宜，置地圖於桌上，按圖指示，如何進軍，如何攻守，均合用兵原則，並強調革命軍不怕武器的拙劣，只要攻擊精神旺盛，便可以寡擊衆，百戰百勝。起初一般將領以爲國父沒有進過軍事專門學校，不懂軍事，及至領略這一番訓示後，大家都深深地佩服他兵學的精湛，尤佩服他那種審慎而虛心的指示態度，這是一位親歷其境的老軍官告訴我的（註七）。至於決定的北伐計劃：「現在用兵方略當以鄂湘爲第一軍，由京漢鐵道進。粵皖爲第二軍，向河南進，與第一軍會於開封鄭州之間。淮揚爲第三軍，煙台爲第四軍，向山東進，會於濰州秦皇島，合關外之兵爲第五軍，由陝爲第六軍，向北京進。一、二、三、四軍既達第一之目的後，與第五軍直指敵巢。」（「覆黎元洪指示北伐方略電」）這時由津浦路前進的北伐軍，所向無前，連戰皆捷，初次粵軍姚雨平及蘇軍合敗敵軍張勳於固鎮，敵方增援而來，戰於南宿州，又爲姚軍及淮軍陳幹打得落花流水。於是張勳等只得放棄徐州，各路亦正謀分進合擊，直搗幽燕。清廷見情勢危急，授權袁世凱議和，同時我方主和者亦居多數，遂以清帝退位爲條件，而中止北伐軍事。這是民國成立以來，國父首次指揮軍事的經過。

可是滿清雖告推翻，而繼滿清之後的封建遺孽及反革命勢力，卻此仆彼起，變本加厲。國父身軀心傷，認爲職責所在，非重整旗鼓，繼續討逆不可。十餘年間，由討袁之役（民二及民四兩次），而護法之役（民六聲討馮國璋、段祺瑞），而討莫榮新之役（民九），而討陸榮廷之役（民十），而討陳炯明之役（民十一至十三），而討沈鴻英之役（民十二）及削平廣州商團之變（民十三）等，就中除討袁之

役，避居日本，遙爲指揮各省同志起兵討伐外，其他戰役均以廣州爲根據地，就近指揮。在這個時期，國父於民六被選爲海陸軍大元帥，民十被選爲非常大總統，每次均統攬黨政軍的大權。民十二由滬重返廣州主持討陳，因各將領之推戴，又暫就陸海軍大元帥職。可是國父原以貫徹護法、實現國家統一及完成國民革命爲職志，自不能偏促於南方一隅，亟宜興師北向，剷除北洋軍閥。因此國父先後在廣州發動了兩次北伐：第一次在民十一年，國父於民十以兩廣底定，親至桂林，整理軍隊，準備於十一年春督師由桂取道湖南，大舉討伐非法總統徐世昌及直系軍閥。不料，北伐軍於是年初陸續出發到達湖南邊境時，陳炯明竟在後方勾結直系軍閥吳佩孚，既斷絕北伐餉械的接濟，且從而阻撓北伐軍的前進。國父不得已，由桂班師返粵，罷免陳炯明職務，改道江西北伐，於是年五月六日親臨韶關誓師。這次作戰計劃：第一期奪取贛州，第二期奪取南昌九江，義師所指，節節勝利，經將贛州克復，北伐軍前鋒到達吉安泰和，但又因陳炯明在後方搗亂，嚇使部下圍攻總統府，只得回師靖亂了。第二次在民十三年，國父以曹錕、吳佩孚朋比爲奸，毀法禍國，遂於九月率師重蒞韶關，發表宣言，檄告天下，名正言順，聲威大震。旋以曹吳倒塌，及北方國民軍領袖諸同志紛電入京共商國是，國父應召離粵北上，改用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糾紛，遂中止北伐。

國父於討賊各役中，以指揮討伐陳逆之役，其沉着大膽，剛毅果斷及機智，比之中外古今的名將，毫無遜色，洵爲我國今後軍人的楷模。却說國父因陳炯明的阻撓北伐，由桂返粵，乃免其粵軍總司令及省長兼內務總長等職，忿其前勞，冀能悔過自新，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旋爲利於北伐起見，復畀以辦理兩廣軍務。而陳却野心不死，竟愈演愈兇，於民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嚇使部下葉舉圍攻總統府，欲置國父於死地，實現其獨霸廣東的陰謀，國父當時接得這個謀害的密報，在叛軍的刀光劍影中，從容退入楚豫艦，轉登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以爲紀念），便造成「廣州蒙難」的一幕，這和「倫敦蒙難」

，同樣的悲壯險絕，成爲中國革命史上的兩大奇蹟。

國父登艦後，即召集各艦長商議變戡亂的策略。這一役就海軍作戰說：假如海軍力量強大的話，就應使陸戰隊單獨登陸，佔領據點，進擊敵軍。反之海軍力量薄弱，不能單獨登陸作戰的話，就應發揮砲火協同陸上部隊，夾擊敵軍。國父當時因海軍陸戰隊，力量很小，只得採取後一策略，一面令衛戍總司令魏邦平率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進攻陸上部隊，一面親率座艦永豐及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等艦，於十七日由黃埔出動，經車歪砲臺駛入白鷺潭，砲擊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等處叛軍，各彈多中標的，叛軍聞聲落膽，紛紛棄械逃遁，死於砲火之下者達數百人。惟陸上部隊，未能如期發動策應，砲擊之後，叛軍仍散而復聚，其亂未獲平，然已足表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致本黨同志書」）

國父見情況如此，遂率各艦駛回黃埔鎮守，這時各艦艦長均主張艦隊移往西江。國父却認爲只有襲取車歪砲臺，駛進白鷺潭，等候北伐軍回師夾擊，較爲得計，旋於七月十日又親率座艦及楚豫、豫章、廣玉、寶璧等艦，從海心岡駛往三江口，向車歪砲臺轟擊，叛軍亦發砲還擊，一時砲聲震天，雙方均有損失，各艦艦長目擊叛軍砲火佔優勢，畏縮不敢前進，國父以身作則，令座艦駛於先頭，一致攻擊前進。而叛軍在該砲臺兩岸佈置野砲有二營之多，一見艦隊駛近，便構成交叉火網，實施封鎖射擊，殲滅射擊，彈如雨下，各艦均受微傷，座艦連中六彈，官兵死傷十餘人，國父一面指揮各艦作戰，一面觀書艙內，雍容鎮定，大有古代儒將之風。正如國父說：「此役也，以兵艦數艘，處叛軍四集環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進至省河，以儆叛軍之膽，而壯義士之氣，中外觀聽，亦爲之聳。」（「致本黨同志書」）國父在白鷺潭，一直支持到八月九日，見李烈鈞、許崇智等北伐軍回師討逆的失利，認爲孤守省河，於事無濟，方離粵赴滬，再圖討伐。于此，值得大書特書的，當座艦寄碇白鷺潭時，陳逆曾逆

動海軍叛變，以威脅 國父，施放水雷魚雷，以謀害 國父，遣派飛機，盤旋於座艦之上，以恐嚇 國父，又用民船鋼板小輪及敢死隊，圖襲 國父座艦，這時全體官兵均驚惶失色， 國父却屹然不動，這是由於秉持「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總統為民國而死，分所應爾」，「我輩既為國犧牲，當置死生於度外，方寸既定，逆軍其如予何？」（註八）的偉大精神所致，這種精神，正和英國海將納爾遜於伐拉加的大海戰中，身為敵彈所傷，仍負傷指揮，直至絕命為止的精神，先後輝映。

讓我於此補述 國父對於海軍的研究： 國父對於往昔水戰上所謂「風沙水線」的知識，無不通曉（註九），對於英美各國出版之海軍名著，無所不讀。 據說：每年都訂有英國海軍年鑑，常置案上，以供參考，並屢對同志詳論海軍在國防上的重要性（註十）。像在這一役中，當肇和、海琛、海圻三大艦為陳逆運動，駛離黃埔時，叛軍以為這三大艦他移之後，則 國父所停止在黃埔各小艦，均在魚珠砲臺監視之下，並為黃埔後方的海心岡，平日水深只有六尺，各艦必不能通過，那不為魚珠砲臺所轟燬，亦必為其所封鎖，任憑為所欲為。却不知道 國父對於海圖，瞭如指掌，他為應付這個突變，即派員往測該處河水的深度，一聽得水深達十五呎的報告，私心大喜，嘆為果不出所料，立即督率各艦從黃埔上游，經海心岡駛出三河口，繞道駛往新造村附近，使叛軍無所售其奸。這一個斷然的處置，使全體海軍將士，為之心折，就是叛軍方面，也深驚其神算。至於對各艦艦長主張艦隊不可移駐西江，列舉五大理由：（一）以西江水淺，各艦移至西江，僅留三大艦在黃埔，則海軍以勢分而力弱，大艦或為逆軍所買，則將來更難取勝。（二）以大本營一離黃埔，則長洲要塞必失，廣州附近水陸形勢，盡入逆軍範圍之中，牽制更難，賊鋒必張。（三）以總統移駐西江，其地面較廣，活動雖易，然黃埔為廣州咽喉，且有長洲要塞，其地點重要，非西江可比。且總統駐於黃埔，廣州雖失，猶易恢復，威望仍在。如移西江，地勢偏僻，無以繫中外之望。（四）海軍如往西江，重來省河較難，如北伐軍回粵，不能奏水陸夾攻之效。

(五) 移駐西江，而棄長洲天然之要塞，另謀陸上根據地，能否佔領，尙不可知。且西江各部陸軍，態度不明，能否爲吾所用，尙未可必。如果陸上毫無根據，陸軍又不奉命，則海軍勢絀，可立而待。有此五害，故動不如靜，堅持北伐軍速來，以備水陸夾攻省城，則賊亡有日也。」又說：「各艦由此出動西江，經道牛山、魚珠之叛軍砲臺，又有三大艦已在沙路港口，監視我各艦行動，叛軍砲臺或可鼓勇衝過，而沙路港口之三艦，監視嚴密，其妨礙我行動，阻止我通過無疑。故我艦隊此時惟有襲取車至砲臺，駛入省城之一策，其餘皆非計也。」(註十一)這真是一個英明的指示及決策。民十三致蔣中正先生的親筆信說：「聞仲愷說：械船到時，擬在金星門內起卸，以避耳目，我以爲不必如此，若爲避人耳目計，則金星門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門之對面，即伶仃關，該關有望樓，有緝艇，凡到金星門附近之船無不一目了然，實在不能避，而反露我們欲規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艦之干涉。因英艦已視此等海面爲其範圍，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門外年年淤淺，此時之水路，當較數年前海圖，必差數尺，恐致擱淺，此二不可也。又在該處搬運，實花費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風雨盜賊之危險，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來黃埔，公然起卸爲妙。」當時依照此指示而行，果得安然起卸。足見國父的熟悉海上形勢。又說：「好像外國的舊兵艦，從前如果是裝了十二門大砲，便分成六個砲臺，要瞄準放砲，打什麼敵人，都是由許多砲手去分別執行，做指揮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現在的新兵船，要測量敵人的遠近，在桅頂便有測量機，要瞄準放砲，在指揮官的房中，便有電機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敵人，不必要許多砲手去瞄準放砲，只要做指揮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測量機的報告，按距離的遠近，撥動電機。要用那一門砲，打那一方的敵人，或者是要十二門砲，同時放砲，都可以如願，都可以命中，像這種海軍砲的使用，是叫做直接管理。」(「民權主義」第六講)足見國父對於海軍砲兵的研究。此外國父對於古代水戰亦很注意，他說：「從前莊子說：『宋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澠爲事，客問之，請買其方百金

，聚族而謀之曰：『我世世爲泚辭統不過數百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則與越人水戰，大破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瞞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泚辭統，則所用之異也。」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保護手在冬天不至破裂的那種藥，宋人用之不適當，世世僅供灑布後塗手之用，吳人用之適當，使供水兵冬天耐戰之用，而得一國。」（「國民要以人格救國」講詞）

前面說過 國父因討逆未果，乃離粵赴滬。可是 國父於到滬之後，依然籌劃討陳事宜，不數月（十一年底），陳逆便爲滇桂各軍驅出廣州，各將領見粵局稍定，乃電迎 國父於十二年二月重返廣州主持大計，惟此時陳逆仍盤據于惠州，國父認爲「孔明欲出中原，先擒孟獲，吾欲出長江，非先滅陳不可。」（註十二）遂於是年夏季，親自督師東征，其經過情形有如下述：

國父爲剷除陳逆炯明以除後患，乃決計親征，設大本營於石龍。於八月廿三日乘大南洋輪船爲座駕，十二時向東江進發，下午九時，抵達石龍。時天氣奇熱，船復湍隘，所處之室，僅容一席，而 國父居之泰然，按圖握管，決策定計，晝夜不少息。及至許葉某由博羅來謁，請示機宜，並謂逆軍分三路來襲，李易標已抵距此二十里之湯村，敵將接近，不意帥座冒險來此也。時滇桂各軍，已與陳逆激戰數日，迄未得勝。廿五日，博羅方面，又告失敗，林某即率逆軍向石龍進犯。廿六日，博羅飛鵬嶺失守，逆軍佔銅鼓嶺等地， 國父乃命飛機出獵博羅，使守城者知有援應，並親函許某某堅守，更命差艦載糧冒彈前進，以資接濟，又電廣州促援軍急速來援，羽檄如雪片，而軍行轉緩，蓋廣州派軍待餉乃發，不問博羅被圍之急與不急也。因之博羅之圍，終不得解。廿七日，情勢亦惡，及至深夜，尙不見援軍之至， 國父乃遣古應芬回省，催促滇軍福軍與吳鐵城所部開進。李福林即率所部偕朱培德赴前方，同時吳鐵城部亦開抵增城。廿九日， 國父由石龍向博羅前進，從禮村至蘇村，沿途風雨急驟，船阻難行，甚至李福林、吳鐵城兩部偵察任務

之騎兵，均不得進。座駕小舟，顛簸動盪，勢頗危險，然國父正襟危坐，策畫軍事，並以民元以前之革命史，昭示同行官佐，而披閱圖籍，未嘗一口輟也。卅一日，國父由鐵岡泊池地抵松村，博羅時被圍已久，守將劉震寰拚死堅持，城下水漲急，軍不得近，僅以砲遠射而已。適譚延闓入湘之軍，由敗轉勝，捷報傳來，國父喜形於色，乃命各軍攻擊前進。九月一日，座船至第七礮，命福軍演軍登山警戒，並飭副官於山顛燃火爲號，使城內知主帥親自來援。次日，國父親登北嶺，專事均躬爲之，於致胡漢民書曾云：「吾今日兼盡一排長之職務，凡偵查敵情，考察地勢，吾悉爲之。」惟其時演軍大部份尙未集中，且驕不受命，國父不得已，重返石龍督促，雖許演軍祿國藩以重賞，而無效果，悍將驕兵，殊可恨也。三日，東路軍所屬師長張民達，與逆軍戰於淡水，大破之。四日，張至石龍捷報請訓，國父命福軍演軍分左右兩翼進攻，演軍第四次要挾軍餉未得，全軍引退，止之無效。得南路鄧本殷攻陷北海訊，國父命永豐艦往援。七日，許莚某決突圍，但以援軍不克，早八時，福軍與逆軍大部接觸，演軍田中毅、粵軍張某某等部聞雄雞拍翼佈陣。國父親自登山督戰，左翼福軍，初猶小勝，及逆軍大部衝進，福軍退去，逆乃乘勢闖進，沿義和墟而蘇村，欲斷福軍之歸路。是夜，退至石龍。八日，重進蘇村，張部等會同福軍，進攻義和墟之逆，破之。九日，國父由雄雞拍翼至譚公廟，率屬登山督戰，各軍奮勇分途追擊，鏖戰甚烈，自朝至午，進退數次，雙方均有死傷。十日，博羅守軍楊廷培，突圍至銅鼓嶺，逆軍死傷枕籍，向派尾響水退却，博羅之圍，乃得以解。國父即乘艦赴梅湖視察重砲兵陣地，以備進攻惠州。博羅之圍解後，國父命福軍及張部等分途追擊，十一日，克平山。十二日，命飛機隊往惠州城投彈。十三日，國父入梅湖，親發重砲（由虎門運往之十五生的要塞砲）五彈，轟擊陳逆所盤據之惠州城。次日返廣州，得增城報捷訊。十八日，國父復至前方。二十日

，至飛鸞嶺籌攻惠州，上午十一時至砲兵陣地，被逆軍發見，敵即不斷發砲向 國父射擊，彈落身旁，距不尋丈，從者多爲 國父危，而國父但諭以無恐，並謂敵砲射程已止於此，縱密發，必不及。此種大無畏精神，與料敵之準確，軍事專家嘆爲罕見。旋以事返梅湖，留程清等禦敵，行至中途，忽聞爆炸聲甚烈，後知白沙堆所泊電船自炸，飛機隊長楊仙逸，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魚雷局長謝鐵良均遇難。廿一日，復至梅湖重砲陣地親發六彈攻惠城。次日復攻，雖不破敵，逆膽已寒。廿三日午，合各軍並進，作衝鋒之搏擊。戰至廿四日拂曉，以魚雷炸城基，飛機擲炸彈，亦不克。午後，逆軍反攻死亡過鉅，不支而退。十月卅一日。兩軍相戰，互有勝負，剝震寰於是日退出飛鸞嶺，十一月六日， 國父恐博羅失守，重行出發親征，激戰之餘，雖告勝利，而惠城仍然在逆軍之手。八日，逆軍傾巢而出，各軍均受挫。九日 國父急懸重賞，嚴督反攻，無如各軍各顧地盤，不肯力戰。十一日移大本營於石灘車站。十二日，逆軍迫近石灘，被瀛軍擊退，旋聞荃蘭，鐵牆方面戰急，討逆軍不支， 國父即令新到之李根溥部沿廣九路前進，不移時，開戰大敗，潰兵沿鐵路紛奔，訛言四起。 國父即率古應芬、李烈鈞等急下車制止，以圖反攻。不料潰兵多不從命，向後紛退，車遂倒行，侍從秘書副官黃惠龍等乃強 國父上車，旋改登機車，直開廣州，而李烈鈞等已不及趕上，特另乘車到石灘佈防。時逆軍乘勢尾追，幾及石灘。然而范石生一聞敗耗，不待炊畢，急奔赴救，大破之於石灘以東，遂逆軍洪兆麟部於石龍。逆軍之勢乃稍戢，事後各路逆軍復以重兵自廣九路圍迫廣州，廣州形勢危急，不堪言狀， 國父仍本其大無畏之精神，堅持一兵一槍之奮鬪，又急電湘軍豫軍馳援，豫軍樊鍾秀部日夜兼程趕到廣州，徒步出擊破之，廣州賴以保全。是役也， 國父之危，不減於白鸞潭之役，而堅剛勇邁之氣，視白鸞潭之役殆尤過之，從其役者，談及此番戰事，莫不神往。（註十三）

以上記載，自然不够詳盡。雖說戰鬪以殲滅敵人戰鬪力，迅速獲取勝利爲旨，國父在這一役中，以八十餘天的短期間，因陳述濶據惠州的天險，及我方雜牌軍隊未能用命，致不克將其包圍殲滅，却給予重大的消耗，並摧毀其鬪志，尤以國父親臨前線督戰的精神，足以感召我全體革命將士，造成他日東江大捷的因素。就通例說，國父以大元帥的地位，五十有九的高齡，對於討賊軍事，本應坐鎮後方的廣州，遙用電話電報來指揮，却不顧一切險阻，毅然挺身到前線去，如設大本營於石龍，親到砲兵陣地發砲轟擊陳逆，及敵砲對其射擊，彈落身傍，而不退避等，這極大無畏的精神，實與拿破崙在法奧之役，率旗前進的精神，同出一轍。

此外，在此役中尚有兩點，值得一述如左：

一、是披閱圖籍：我們知道，不能判讀地圖，固然不配做指揮官，而地圖又常爲指揮官必携的工具，指揮官不能拋棄地圖而指揮作戰，正如航海者不能拋棄羅盤針而航行。否則，在戰場上就變成瞎子，既不辨東西南北，也不辨地形地勢，固不會適切地運用戰略戰術，更無從判斷敵軍的企圖，位置與配備。國父對於輿圖向極重視，民前十三年冬在日本曾自製中國地圖，並在自跋中強調說：「蕭何入關，先收圖籍，所以能運籌帷幄之中，而決勝千里之外，卒佐漢高以成帝業者，多在此云。」據說：在這次東征中，常吩咐參謀祕書或親自携帶地圖，到野外時，平舖地上，站着用手杖指點判讀，並指示部屬。在軍營中，懸掛壁上，或平置桌上，用紅藍鉛筆劃出記號，以爲指揮作戰的根據。登山視察地形時，用望遠鏡瞭望之後，又對照地圖，判別有否差誤，對圖上所示路程的遠近，山川的高低廣狹，都能迅速計算出來。對於地圖上一個很小地名，都能記得清清楚楚（註十四）。雖在督戰時，一有餘暇，便手不釋卷，一種好學的精神，真爲常人望塵莫及。考拿翁在作戰時，他不論自己擔任職務怎樣重大，凡關於豫定戰地，必先在歷史上和地圖上仔細研究，並自行嚴密整理各種地圖，出發時，在龍駒的革囊中常携帶

必要的地圖和書籍，以精嫻拿破崙戰略的 國父，也許受其影響。

二、是使用空軍助戰：空軍的大量使用於戰場上開始於第一次歐洲大戰，從此戰爭的形態，便由平而變爲立體，空軍在現代戰爭上幾取陸海軍的地位而代之，沒有擁着強大的空軍，而被迫參加現代新型的戰爭，其吃虧將不堪設想。 國父對空軍的認識，在中國實爲第一人，民元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任內的，已設立航空隊，並購「飛船」。(「覆黎元洪告已購飛船及各物電」) 民六致南洋同志書說：「飛機爲近世軍用之最大利器」，並鼓勵同志學習飛行，派遣同志到外國學習航空，提倡「航空救國」，及在廣州大沙頭設置航空局，有飛機六架，水上飛機一架，他說過：「像飛機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飛的，是經過許多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像大沙頭的那般青年飛機師，從前不知道怎麼樣飛，只是請外國的技師來教，所以學到現在，便飛得很好。」(「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講詞) 國父在這次東征中，爲導致戰局於有利的形勢，曾派空軍到前方助戰(註十五)，雖說當時擁有的軍用機操練習機僅有十餘架，未能實行「杜黑主義」，使用強大的空軍，協同地面部隊，一舉而殲滅逆軍，且機上所裝置的機關槍，係步兵使用的手機關槍，所投擲的炸彈，係改裝的水雷或迫擊砲彈，一切都是很幼稚的(註十六)，但却可以看到 國父已拋棄陳舊的平面戰爭的觀念，踏上嶄新的立體戰爭的大道了。于此應附帶一說的： 國父亦已從事於現代裝甲部隊的建設了，裝甲部隊以戰車爲主體，它具有優越的運動力、攻擊力與防禦力。而這號稱爲「地上雄獅」的戰車，係出現於第一次歐戰，並在戰場上表演了驚人的奇蹟。自此以後，各國競相建立裝甲部隊，加以英國裝甲部隊理論家富勒將軍的鼓吹，更使裝甲部隊的建設與空軍的擴張，俱成爲今日世界軍事的兩大主流。 國父對於第一次歐戰很有研究，對於歐美鼓吹建設裝甲部隊的理論，自必受其洗禮，所以在當時物質條件的限制之下，仍勉力設置一個「甲車隊」，設計者爲擅長甲車戰術的俄國顧問李際君(註十七)，雖說這個甲車隊亦同飛機隊

一樣的幼稚，使用於鐵路上的改裝鋼甲火車（據說使用於廣九、廣三、粵漢鐵路上收效頗大），使用於公路馬路上的改裝鐵甲汽車，均為數無幾，及擁有的坦克兩輛尚在試驗中（註十八），但此舉却開了中國裝甲部隊建設的先河。我們今後的建軍，應澈底地接受 國父這兩個偉大的遺規吧！

還有：國父於同盟會時代的一九〇五年，親訂軍事規章：「軍政府與各處民軍關係條例」，「軍隊之編制」，「將官之等級」，「軍餉」，「戰士賞恤」，「軍律」，「招軍章程」，「略地規則」和「因糧規則」等。於中華革命黨時代的一九一四年，又親訂有：「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內分「軍政」、「軍政府」、「限制勳紀」、「軍律軍法」，「因糧徵發及其他則例」等，其中大部份亦屬於軍事規章，從這些規章看來，非對於兵學及軍事法規素有研究，曷克此。其次是 國父鑒於歷次革命的失敗及蘇俄建軍的成績，以為今後欲掃除國內反革命勢力，其為鞏固中國國防及對外打倒帝國主義，決不是利用烏合之眾的民軍，可以成事，因為他們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缺乏戰鬥的能力，也不是利用舊軍閥的武力，所可濟事，因為舊軍閥以爭權奪利為目的，不聽命令，不守紀律，隨時可以幹起反革命的勾當來，像陳炯明、陸榮廷、沈鴻英之流，何莫非一度投機參加革命，但終變成與革命為敵的反動軍閥，所以非從新建設強大的革命武力不可，尤非從新養成大批新革命幹部不可，這便是 國父設立黃埔軍官學校（原名「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原因。國父為設立這個軍官學校，於民十三年派蔣中正、廖仲愷兩先生負責籌備，旋任蔣氏為校長，廖氏為黨代表。開學之日，國父親臨致訓，勗勉全體學生以「革命軍的基礎在深高的學問」。從此積極訓練，一面授以軍事學術，一面施以政治訓練，因而養成無數革命的幹部，在現代中國建軍史上寫上最光榮的一頁。

西人論將帥的條件：「一曰無畏的大勇，二曰創造的智慧，三曰強健的體魄。」德國名將魯登道夫也說過：「主帥的地位，應為第一等艱辛，第一等天才，第一等堅強意志。」國父實足以當之而無愧。

國父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文武合一的大人物，也是現代一個智仁勇兼全之天才的大軍事家！

(註一) 波亞 (Poers) 人爲荷蘭農民移殖南非，分居杜蘭斯亞及阿倫治自由邦，國父在「錢幣革命通電」中所稱「杜阿二國」，即指此。在「軍人精神教育」中所稱「杜國」即指杜蘭斯亞。在「民權主義」裡所稱：「波人」，即波亞人。

(註二) 堪馮利將軍 Homer Lea (1876—1913) 美國軍事專家，著有「無知的勇氣」一書，風行各國，與國父締識於三藩市，共同研究軍事，旋與國父經歐來華，曾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高等軍事顧問，國父譽爲「天下最傑出軍事家」。

(註三) 據馮自由先生於民國三十年七月由渝給我的信。

(註四) (註五)，(註九)，(註十四) 及 (註十六) 據李仙根先生口述。

(註六) 據胡毅生先生 (是役參加者) 口述，修正坊本記述寫成。

(註七) 據張先生口述。

(註八) 及 (註十一) 見蔣中正先生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國父語。

(註十) 據張溥泉先生口述。

(註十一) 見鄒海濱先生編著：「中國國民黨史稿」，國父語。

(註十二) 參照胡去非編纂：「總理事略」第十一章六十節寫成，並承參與是役兩位老同志校正。因該文據古應芬著：「孫大元帥東征日記」寫成，而古著與事實略有出入。

(註十五) 據國父促王榮連辦攻惠軍需書說：「新飛機日內可到，必照應着航空局趕將飛機配好，趕來前敵應用。」

(註十七) 國父致蔣中正先生函云：「前李烈鈞將軍要取手機槍拾八枝，爲配甲車之用，務要照發。……李君專長甲車戰術，一切須由其配備乃能靈捷，且敵人已來窺翁源、河頭，欲斷我省韶鐵路之交通，我日內往韶關，則此鐵路之防備更爲急要。」

(註十八) 據趙超先生口述。

參攷書：胡漢民先生編：「總理全集」，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總理全書」，吳稚暉先生著：「總理行誼」，張其尚先生著：「黨史概要」，馮自由先生著：「革命逸史」，陸輯：「孫中山先生外集」，中宣部編：「國父孫中山先生年譜」等書，及克勞塞維慈「戰爭論」，魯登道夫「全體性戰爭」，拙作「孫子兵法新研究」等書，又，本書全文所參考書籍達一百二十種，論文二百十五篇，爲節約篇幅，未能盡錄，合併聲明。

二、戰 爭 思 想

思想是行動的指針，是力量的根源，一種戰爭必有一種戰爭的思想。德國兵學大師克勞塞維慈在其不朽的傑作「戰爭論」一書說：「戰爭是起因於戰事爆發時所存在之各種思想觀念等關係，復因此等關係，而使戰爭有種種形態。」

中國過去的歷史是戰爭起伏的歷史，今後的歷史，在世界未大同前，當然也免不掉戰爭的發生，但今後的戰爭思想，是不容再有紛歧或錯誤了，分歧則力量分散，難期勝利，錯誤則輕舉妄動，禍國殃民。所以必須建立一種正確的戰爭思想，以爲今後戰爭行動的南針。

尤其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主義思想的戰爭，正如日本軍事家土居明夫說：「下次戰爭是主義與世界觀的戰爭。……下次戰爭倘若主義思想的戰爭，物質的戰爭，長期的戰爭，則主義思想的光明正大者，資源生產、科學技術優越者勝利，在綜合此種戰力的總體戰上，能勝者勝利。」（註一）足見這個無形的戰爭，與有形的軍事武力的戰爭有着同樣的重要性。在主義思想的戰爭中，其光明正大者必可獲勝，反之必敗，稍一檢討過去我們北伐的勝利，及法西斯德日意在二次大戰中的失敗，已可得到答案，這更使我們非從速把我們的戰爭思想建立起來不可。

縱觀現代世界的戰爭思想，自德日意失敗之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經已崩壞，迄今猶存的，可分爲兩大體系：一爲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一爲共產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前者以自由與和平爲目的，美國爲其代表，後者以侵略與奴役爲目的，蘇俄爲其代表，兩相比較，已可推斷蘇俄在來日三次大戰中是必敗的。

今日我們所要建立的戰爭思想，當然是反對俄式共產主義的戰爭思想，而應與美國諸民主國家的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相協調，相一致，始為「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自傳」）

大凡戰爭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國父的三民主義是我們的政治思想。自然我們的戰爭思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即為實行三民主義，造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而戰的戰爭思想。但為實現三民主義，在現階段，首要反共抗俄，而今日世界各民主國家亦莫不正在反共抗俄，可見反共抗俄是國際性的，非一二國家的事，亦唯有全球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始可爭取反共抗俄的勝利。

正如下面所述，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的本質，是為求生存，求和平的，又是反極權的，反侵略的，這是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相協調，相一致，抑且更為進步和完美。因為民主主義尚帶有資本主義的氣味，而三民主義則無。所以今日為建立中國的戰爭思想，只有從三民主義中（國父全部遺教俱可歸結於三民主義）來發掘和建立了。

克勞塞維慈氏關於戰爭的定義說：「戰爭的基本要素，是兩人以上之間的鬭爭，即決鬭，戰爭不外是決鬭的擴大。」跟着說：「戰爭是為屈服敵人，以實現我意志所用的暴力行為。」國父對於戰爭這個術語，雖然沒有下過一個完整的定義，却說過：「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民權主義」第一講）克氏又說：「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的行動，實為一種政治的手段，政治上對外關係的一種繼續，而以其他手段（暴力行為——浴日註）施行之。」國父亦認戰爭屬於政治的形態，他說：「政治的海陸軍力」，跟着又說：「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民族主義」第二講）所以我想 國父一定讀到克氏「戰爭論」而受其影響的。於此，我可再舉出一些例證來：克氏說：「凡為指揮一種戰爭或一幕戰役的重大活動，而取得光榮的勝利，非具有政治上的特別高見不可，所以戰爭與政治是一致，將帥也是政治家。」國

父說：「現代軍人只懂得軍事是不夠的，軍事以外還必須了解政治。」（「政治基礎在於地方自治」談話）又說：「如果說軍人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通，但說不懂政治，便講不通了。因為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然要懂政治，要明白什麼是政治。」（「民權主義」第一講）克氏「戰爭論」是世界軍事名著，也是一種戰爭哲學，不特軍人應該精讀，即一般思想家亦應人手一卷。它是政治家、外交家、顧問及一切與政務有關者的枕中祕本。誠如國父的好學與博學，尤以指導戰爭的需要，自不會不知道這部名著，又不會不加以深刻研究，雖說目前未找到更確鑿的證據，但依於上述的對照已可以推知其究竟了。但國父與克氏亦有不同之點，就是國父不是克氏為戰爭而戰爭的論者，乃是為革命而戰爭的論者，他一面反對「野蠻」與「弱肉強食」的侵略戰爭，另一面却主張「以戰止戰」，「為人類作干城，為進化除障礙」的革命戰爭。（「戰學入門序」）亦即為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戰爭，可見他的戰爭思想比克氏來得正確和進步。

其次，國父對於戰爭發生的見解，不是看做偶然的現象，也不是看做經常的現象。他認為有國家即有戰爭，戰爭是國家間不可避免的現象，又為一種不得已的舉動，他說：「論國家之起源，大概以侵略人之目的，或以避免人侵略之目的而為結合，其侵略人固為戰爭，即欲避人侵略亦不能避去戰爭。：以一國而為戰爭，萬不得已之事也。：凡國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仍當復於外交之序。故國與國遇，用外交手段與用戰爭手段，均為行政策所不可闕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時多，用戰爭手段之時少，用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軌則，戰爭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云者，外交手段既盡，無可如何之謂也。」（「中國存亡問題」）他又認為在革命過程中，戰爭亦為不可避免的現象，誠以革命是最艱鉅的事業，或為推翻統治者，或為打倒侵略者，不是完全採取和平的手段所可奏效，不得已時還要訴諸流血的戰爭。故國父致力革命之始，即揭

業「驅除韃虜」的綱領（「同盟會宣言」）。又在手訂建國大綱上制定「軍政時期」為革命建設步驟的第一個時期，即第六條：「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于此又可見國父并不同過去法西斯主義者謳歌戰爭為「創造之父，文化之母。」又不同現在赤色共產主義者以階級鬭爭為社會進化原動力，到處發動侵略的戰爭。至於根據國父最高的理想，戰爭並不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却有待於大同世界的實現。這個大同世界的內容，正如國父親書禮記大同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便是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亦即三民主義最高理想的實現。

國父的戰爭思想是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已如前述，而我們基於戰爭哲學的觀點，在國父的全部遺教中，却可以發現他的戰爭思想是建立於「生存」與「和平」的基礎之上，即它的本質是為「生存」與「和平」而戰。茲分述如左：

一、為生

存而戰

這可以說是國父戰爭思想的核心。三民主義的基礎是民生哲學。國父說：「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民生主義」第一講）又說：「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全）又說：「人類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全）再又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雖說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却是人類求生存的一種手段，亦即說人類社會民族國家強弱生存的

威脅——別國的侵略時，則非斷然採取戰爭的手段不可，否則，便不能自衛，維持其生存，而陷於滅亡。至於侵略人國，以掠奪財富，擴大空間爲目的的戰爭，則非革命的戰爭，自然亦非 國父所謂「求生存。」 國父說得更明白：「人類如能够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够生存。……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註二）」（「民權主義」第一講）這裡所謂自衛的能力，當然是指武力，唯擁有足以自衛的武力，亦即能戰的武力，始能維持民族國家的生存。又說：「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即爲求生存——浴日註）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啓戰爭。」（「臨時大總統佈告友邦書」）亦即說戰則爲求民族國家的生存。而非爲侵略。又說：「吾人初不以黷武善戰策我同胞，然處競爭劇烈之時代，不知求自衛之道，則不適用於生存。」（「精武本記序」）又，國父於民元解職後，在香港與西報記者談話說：「惟吾意中國無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陸大軍者，只爲自保（即爲求生存——浴日註），而非攻人，若果歐人勢逼吾人，則吾人將以武力強國。」（「南北統一後之政治與外交方針」談話）依此可見 國父的戰爭思想是以民族國家的生存爲核心，昭然若揭。他發動推翻滿清，是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他主張抵抗帝俄，也是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他屢次興師討賊，也是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至於我們過去對日抗戰，與現在的反共抗俄，也是繼承 國父的遺志，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本來魯登道夫將軍在「全體性戰爭」一書上，也是主張爲求生存而戰的，他說：「全體性的戰爭之目的，在於民族生存之維持。」實則他僅爲求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在大日耳曼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之下，他可以犧牲別個民族的生存，即他只要自己民族的生存，不要別個民族的生存。我 國父則比他正權和進步，既要自己民族國家的生存，同樣也要別個民族國家的生存，扶助別個民族國家的生存，正如 國父所主張的「濟弱扶傾」。（「民族主義」第六講）

二、為和

平而戰

和平與戰爭本是對立的現象，也是統一的現象。主張和平不能否認戰爭，主張戰爭亦不能否認和平。但我們今後的戰爭，則不可徒為戰爭而戰爭，更不可為侵略而戰爭，應為和平而戰爭，戰則要打破一切不和平的現象而使歸於和平，亦即說戰爭僅為和平的手段，而和平才是戰爭的目的，唯有這樣才是革命的戰爭。這便是 國父戰

爭思想的第二個本質。中國人的天性是愛好和平，國父的天性更愛好和平，不得已而戰，乃以和平為目的。民元前一年在香港舟次對胡漢民說：「且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是開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之大患即在無政府，如能創建政府，則滿清之政府固必傾覆，即袁世凱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為患於新政府，故不宜預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謀以武力爭天下也。」（「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即不必用兵」談話）於此可見 國父不是一個好戰者，也不是一個武力崇拜者，其愛好和平的天性溢於言表。民十四逝世的彌留時對同志說：「余此次放棄兩廣北上，實為和平統一而來，」又反復斷續的說：「和平！奮鬥！救中國！」益見愛好和平的天性。愛好和平既是 國父的天性，至於不得已而戰乃係為和平而戰。國父說：「中華民國之創造者，其目的為和平。」（「實業計劃結論」）這是說為打破滿清對我漢族的不和不平，才發動推翻滿清的戰爭，依於戰爭的勝利，而創造中華民國，即創造新的和平，達到和平的目的。尤值得注意的，國父發動推翻滿清的戰爭係出於不得已而在和平絕望之後，民元就臨時大總統告各友邦書說：「自滿清盜竊中國，於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間虐政，譬竹難書。吾民族唯有隱忍受之，如倒懸之得解，求自由而企進步，亦常為改革之要求。而終勉求所以和平解決之道，初不欲見諸流血之慘也。屢起屢蹶，卒難達吾人之目的，至於今日，實忍無能忍。吾人鑒於天賦人權之萬難放棄，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於萬重壓軛。」民十三神戶講演說：「要請歐洲人之在亞洲者，俱以和平方法，退還亞洲人之權利，如果不能達到目的，便當訴諸

武力。」〔大亞洲主義〕這是說和平方法失效後，始可訴諸戰爭，戰爭則為達到和平的目的。其國父常贊揚中國人素愛和平的天性說：「中國人民本甚和平，現在世界上，立國百有數十，雄強相處，保不有戰爭發生。惟中國數千年來，即知和平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種思想，故數千年來之中國，純向和平以進行。中華民國有此民數，有此民習，何難登世界舞臺之上，與各國交際，共謀世界之和平。此種和平運動，即中華民國國民之天職。」〔中國人之天職在促進世界和平〕講詞〕又指出蘇和平為中國一種極好的固有道德說：「中國更有了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民族，只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來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方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民權主義〕第六講〕并再三呼籲「維持世界和平」（散見遺教中）。我們深望外國人能够了解我民族暨國父這個優點。同時也希望外國人亦能具此優點，不來侵略我們，又不去侵略人家，共同維持世界的和平。

要之，愛好和平的精神是貫通着國父整個思想的，其表現於戰爭上，則為「為和平而戰」。我們過去對日抗戰及今日反共抗俄，就是爭取中國的和平與世界的和平，同時也是發揚國父倡導和平的偉大精神。

以上係就國父戰爭思想的本質，亦即戰爭的基本觀念，以下我就形式上，亦即戰爭的對象來談

這是上述本質的進一步說明，而後者「爲抵抗侵略而戰」又成爲前者「爲剷除障礙而戰」的說明。

三、爲剷除障礙而戰

國民革命的障礙有三：一口專制君主，一口封建軍閥，一口帝國主義，這三大障礙物，如果沒有根本剷除，則國民革命無由成功，民族國家亦無從生存發展與和平。

但欲根本剷除這三大障礙，除作和平的奮鬥外，不得已時還須訴諸流血的戰爭。所以國父當進行推翻專制君主的主張之時，便倡率起義，採取戰爭手段。同盟會宣言說：

「滿清政府，窺覓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自滿清被推翻之後，繼之而起便是封建軍閥，于是便先後實行討袁、護法、討莫、討陸、討陳、討沈及北伐曹吳。國父說：「軍事的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黨員不可存心做官」講詞）又說：「四年以來，愛國之士，討伐軍閥及賣國賊，無非爲護法主義及國家生存計，此不能名爲南北之爭，實共和主義與軍閥主義宣戰，愛國者與禍國者宣戰而已。」（「就非常大總統後對外宣言」）又說：「今將開始一新時期，爲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爲廣州商團事件對外宣言」）又說：「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國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掃除障礙之故而活潑進行也。」（「北上宣言」）并在民族主義裡強調打倒帝國主義，民權主義裡強調打倒封建軍閥，因爲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不倒，則民族、民權主義無從實現，民生主義亦無由着手。過去北伐的成功，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打倒（抗戰勝利）。可以說國民革命的障礙殆已經剷除淨盡。否料，朱毛匪幫又繼起與俄帝狼狽爲奸，盤據大陸，拑制人民，屠殺無辜，摧殘民族，出賣國家，成爲我們國民革命的新障礙。今日我們正欲打回大陸，肅清匪幫，驅除俄帝，就是爲剷除國民革命的新障礙，亦可謂「爲反極權而戰」，「爲自由而戰」，因匪俄太極權太剝削人民的自由了。

四、為抵
抗侵略
而戰

一國當外患之來，很明顯的，抵抗就是自衛的生路，屈服就是自殺的死路。大凡一個民族國家之亡，是亡於失敗主義，投降主義。如抱着抵抗主義，為抵抗侵略而戰，亦即所謂「為反侵略而戰」，有時雖告失敗，終必獲勝。近代中國受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已達於極點，故 國父在民族主義裡大聲疾呼振起民族精神以抵抗之，說：「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列強要抵抗他。」又說：「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那一個，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抗，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始終未主張侵略人家，不獨不主張，且反對之。又在其手訂建國大綱上訂有「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的條文，這是進而確定抵抗侵略為國策的。又 國父實業計劃一書的結論說：「今則日本之軍閥政策，欲以獨力併吞中國……今中國已醒覺，日本即欲實行其侵略政策，中國人亦必出而拒絕之。」這是 國父主張「為抵抗侵略而戰」的更具體主張，亦即我們過去對日抗戰的根據，依於抗戰的勝利，果得維持中華民族的生存，亦盡了維持世界和平的義務。

至於俄國處心積慮之欲亡我， 國父早已洞若觀火，見於民前十三年撰支那現勢地圖說：「中國輿圖以俄人所繪者精審，蓋俄早具蕭何之智，久已視此中華土地為彼囊中之物矣。故其考察支那之山川險要，城郭人民，較之他國輿地家尤為留意。」今日以大彼得自命，又繼承沙皇衣鉢的大獨裁者史達林，朱毛匪幫已為其所控制，而把中國整個大陸作「囊中之物矣。」不待說，這是我們民族遭受着一次空前未有的大侵略，我們為維持民族生存與世界和平，則非反共抗俄不可，尤應與世界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打倒莫斯科，把 國父抗俄的精神與計劃實現於今日！

當民國元年，帝俄侵我外蒙古甚急，製造所謂「庫倫獨立」，旋以俄蒙協約，迫我承認，野心勃勃，節節進逼，屢屢乎有囊括我東北各省之勢。這時 國父爲打破這個危機，便以在野之身，堅決地提出對俄抗戰的主張，在其錢幣革命通電上說：「今者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外蒙古，以當情論之，我萬無能抵抗之理，在俄人固知之素，而審之熟，故甘冒不韙行之。我國人皆知蒙古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爲壯烈之亡。」跟着說：「與其俯首聽人之瓜分，何若發奮一戰，以戰強俄，而固我國基於萬代之爲愈也。況當此民氣正盛，國體方新，戰有必勝之道，不戰爲必亡之階，孰利孰害，不待智者之決也。縱以常理論之，今日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屈於霸道強權而亡，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一戰不獨不亡，而更可揚國光，衛人道，伸公理於世界也。」國父爲糾正當時北京政府和議派的錯誤主張，在該電文上又大聲疾呼說：「語曰：『能戰而後能和』，惟我今日不能戰，故俄敢公然侵我領土，若徒然與辦交涉，與之言仲裁，悉歸無效。」國父這個偉大的主張，因當時北京軍閥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未能實現，致把外蒙古的主權斷送於俄人。可見不抵抗主義的危險。至於國父當時抗俄的作戰計劃，係主張採取長期的作戰計劃，正如該電文說：「必備屢戰屢敗而氣卒不撓，乃能求最終之一勝。語有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俄有常兵百萬，戰時兵五百萬，我現在練兵五十萬，民兵無量數。就俄之現勢而觀，六個月之內，必難出至五十萬兵，而我則於此期之內，可出五十萬。於外蒙北滿六個月之後，又可加練新兵五十萬，然以此而敵俄，在第一年之戰，勝負未可知。惟第二年，我當出兵二百萬，意料中當可逐俄出滿蒙之野，而復我黑龍江沿海州之侵地。然萬一仍敗，則第三年當出兵四百萬，若猶不能得利，則第四年當出兵六百萬，則未有不勝者也。在此期內，俄必有財政之恐慌，革命之起義，與我可乘之隙者甚多。若彼猶不屈服，則期第五年之大舉，必出兵至八百萬或至千萬，必直抵莫斯科聖彼得堡而後已。」真是我們今日反共抗俄的南針。

以上便是 國父戰爭思想的本質，亦即 國父的戰爭觀，依此而論，自然他是反對軍閥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關於前者，他說：「軍閥惟知以武力據地盤，以欺詐權利。」（「覆瀟翼、楊道福函」）國父釐定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亦說：「事實上，不能禁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派而施以攻擊，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僱傭軍隊，推其結果，不能不出於戰爭，出於搶奪，蓋搶奪於隣省，較之搶奪於本省爲尤易也。」關於後者，他說：「國際戰爭者無他，純然一簡直有組織之大強盜行爲耳。故對此種強盜行爲，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之。」（「實業計劃結論」）又說：「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因爲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民權主義」第四講）關於階級戰爭呢？ 國父認爲階級戰爭，是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在今日的中國則不能發動此種戰爭，他說：「階級戰爭，即工人與資本家之戰爭也。此種之戰爭，現已發動於各工業國家者，極形劇烈。在工人則自以爲得最後之勝利，在資本家則決意以爲最苦之壓迫，故此種戰爭，何時可以終局，如何可以解決，無人敢預言之者。中國因工業進步之遲緩，故就形式上觀之，尙未流入階級戰爭中。吾國之所謂工人者，通稱爲苦力，而其生活只以手爲飯碗，不論何資本家，若能成一小店予他等以工作者，將必歡迎之。況資本家在中國家若晨星，亦僅見於通商口岸耳。」（「實業計劃結論」）

此外，我們可以證明 國父也是一個總體戰的倡導者，雖說總體戰（*Totale Krieg*）有譯總力戰，或全體性戰爭）的理論，倡導自德國名將魯登道夫，其根據是第一次歐戰的經驗和教訓。 國父所擬著「國防計劃」一書，亦係根據第一次歐戰的經驗和教訓，雖說該書尙未完成，而國父先逝世，在其擬就的該書大綱草案裡，却可窺見 國父早已具有總體戰的觀念，——把政治、經濟、文化諸端和軍事

一起來論列。(請參閱下章「國防建設」)又從本書「戰爭與政治」,「戰爭與經濟」,「戰爭與宣傳」諸章來看,更可證明 國父是總體戰的倡導者。原來 國父的思想是「迎頭趕上去」的,自然他的戰爭思想也不能例外。這一個總體戰的方式,正是我們今日反共抗俄戰爭的最高指導。

總之,國父的戰爭思想是革命的,是救國救世的戰爭思想,換言之,是以「仁」為中心(註三)并以「世界大同」為最高理想的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這個光明正大的戰爭思想是比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為進步與完美,(請注意!尚須表現於實際行動,方能發生偉大的作用)最後必能粉碎萬惡的共產主義的戰爭思想。我們應從速把它弘揚于全世界,蔚為民主國家戰爭思想的主流,爭取反共抗俄戰爭的早日勝利。

(註一)見日本大陸問題研究所長士居明夫中將著:「美蘇戰爭的預測」一書,一九五二年出版。

(註二)國父所說的「奮鬥」,據我的研究,可分為和平的奮鬥,軍事或戰爭的奮鬥,他說:「軍官學校教學生,用槍砲去奮鬥,這個講習所,是教學生用言語文字去奮鬥,即和平的奮鬥。」(言語文字的奮鬥)講詞)

(註三)國父說:「我們南方革命,大家知道犧牲了多少性命,流了多少鮮血,這是為甚麼?無非是想革命成功,造成一個很安樂的國家,讓人民可以享幸福,抱這種宗旨去奮鬥的軍隊,才是仁義之師。滇軍這次到廣東來,繼續顧總司令的志氣,為革命奮鬥,費了很大的犧牲,真是仁義之師,所做的大事,可算是一半成功。如果現在去北伐,收復江西,統一中國,便是要做的大事,完全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講詞)

三、國防建設

倘若人類皆愛和平，戰爭已經廢除的話，那麼我們現在也不必再來談什麼國防建設了。

國防建設即是戰爭準備，現代的戰爭即為總體戰。因此一般學者對於現代國防建設恒分為國防政治建設、國防經濟建設、國防文化建設及國防軍事建設諸部門。惟欲從事於這個新型國防的建設，決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可有濟。必須了解本身與認識對象（假想敵），發揮全力，作有計劃的建設，才能強化國防，鞏固國防，做到「避免戰爭」或「戰則必勝」——實現國防的目的。

中國是世界一個古國，也是一個大國，氣候溫和、物產豐富，陸有長白山、興安嶺、阿爾泰山、天山、蔥嶺、崑崙山、喜馬拉雅山為天然屏障，海有舟山群島、澎湖列島、臺灣、香港、海南島、及東面沙群島為天然屏障，固然這些地理因素有利於我們國防上的防禦，但亦不過是補助的因素而已。正如孫子說：「地者兵之助也。」所以我們不可專恃這個天然屏障來鞏固我們的國防。因為現代交通工具的發達，由於輪船戰艦的使用，便可以打破我們海上的天然屏障。陸上的天然屏障，如天山、阿爾泰山大敵多和邊界的方向垂直，亦不足以阻止彼此的交通。白山、興安嶺橫互於東北的邊境，蔥嶺、崑崙山、喜馬拉雅橫互於西南的邊境，彼此亦有相通的道路，何況今後以飛機的進步，可以橫渡海洋，又可以飛越高山峻嶺，又依于降落傘部隊與空中步兵的使用，隨時可以侵入我們的內部。其次我們的境內有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黃河三角洲），東南平原（長江三角洲），嶺南平原（珠江三角洲），兩湖平原（包括洞庭湖流域和鄱陽湖流域），亦便於侵入之敵裝甲部隊的活躍。我們再看：在過去對日抗戰中，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敵人便得安然在我沿海登陸。反之，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中，日本為什麼不一鼓

作氣侵入美國本部，主要的不是太平洋的障礙，而是因為沒有優勢的海空軍。又看德國的發動歐戰，始終未能侵入英倫，主要的不是多維海峽的障礙，而是由於英國海軍的優勢，及擁有相當的空軍，足以控制多維海峽。我們明乎此，就應致力於人為的國防建設了。但在人為的國防體系中，像靜的國防力量是不足恃的，正如二次歐戰中，列日要塞不足以保障比利時的安全，馬奇諾防線不足以保障法國的安全，所以我們在人為的國防建設上，必須置重點於動的國防力量的建設，方足以鞏固國防，適應今後戰爭的要求。

在中國國防建設上，孫子兵法十三篇為一部偉大的國防指導原理。該書劈頭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是指示我們在未戰之前，就要致力於國防建設。倘若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而貿然與人家開戰，其危險將不堪設想。跟着又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取。」又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又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再說：「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可惜歷代掌握着國防建設大權的君臣們只把它當作一部兵法的書看，鮮有把它的原理運用到國防上，即忽略它在國防指導上的價值。加以支配着歷代君臣們的腦筋，又是那些所謂「優武修文」、「重文輕武」、「以大事小」、「以德服人」、「佳兵不祥」、「兵兇戰危」的思想，益以內戰的頻仍，國力的空虛，遂使國防建設無從發展。即頂大工程的萬里長城，在歷代的防禦上，亦幾等於零。尤以降及宋明之世，廢除徵兵制度，極端抑武揚文，一則崇尚理學，一則提倡八股，致士林日趨文弱，更造成國防上一個大大的漏洞，所以宋明皆由偏安而至亡國。迄於滿清，以異族入主中華，對於漢人的拊制，無所不用其極，所有兵事不許漢人過問，專事防內，不思防外。洎乎列強帝國主義的侵入，先後慘遭鴉片（中英戰爭）、丁巳（英法聯軍戰爭）、甲申（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

）、庚子（八國聯軍戰爭）諸役的失敗，割地賠款，舉國騷然。這時清廷自知以一族一姓之力不足以禦侮圖存，漢人從此始得過問兵事。說到當時對於國防建設的主張，先後有以林則徐爲代表的「海防論」，以曾國藩，左宗棠爲代表的「洋務論」，以李鴻章、張之洞爲代表的「時務論」，以康有爲、梁啟超爲代表的「維新論」，畢竟因爲他們沒有真正了解西洋富強的原因，文化的精神，及中國國情，故所發爲議論和主張，均未成爲起死回生之藥，且因清廷的腐敗過甚，（如慈禧太后移海軍建設經費來修頤和園等），亦多未付諸實施，故終未把中國國防的力量壯大起來。

「沒有國防，便沒有國家。」國父因飽受第一次歐戰的教訓，又目擊國防的危機，更感到過去「海防論」，「洋務論」，「時務論」及「維新論」的錯誤與失敗，便決意爲中國國防開闢一條新生之路，擬著「國防計劃」一書以爲宣傳，並作爲今後國防建設的南針。

國父的國防言論，可以遠溯上李鴻章書的「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也可以說是他最初關於國防的主張。此後，民元在廣州軍界歡迎會上致詞說：「今日要務，在乎擴張軍備，以成完全鞏固之國防，然後可與世界列強並駕齊驅。」民二覆陳其美先生論建設國防武備書說：「中國之海軍，合全國之大小戰艦，不能過百隻，設不幸有外侮，則中國危矣。何也？我國之兵船不如外國之堅利也，槍砲不如外國之精銳也，兵工廠不如外國設備齊完也，故今日中國欲富強，非厲行擴張新軍備建設不可。同志謂中國國防不有相當武備建設，此中國不富強之原因，誠是也。故中國政府須勤修軍備，然後可以保障國家獨立民族生存也。文現聞袁君世凱，擬向外國大借外債以爲擴張新軍備建設之需，果此事實行，則中國有相當新軍備建設也。如是則中國富強可計日而待也。昔滿清政府將擴張海軍建設之費以爲建設一大娛樂園（指頤和園——浴日註）以作私人之娛樂，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軍備建設，改革中國舊軍備也，而不有昔日滿清政府之腐敗也。現在強隣如虎，各欲吞食我國，若我

國不有相當武械自衛，則我國必爲虎所食也。故我國須改良武器，然後能自衛也，不爲虎所食也。」民十三演講三民主義時，更指出中國國防的危機說：「因爲我們的海陸軍和各險要地方，沒有預備國防，外國隨時可以衝入，隨時可以亡中國。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他們的陸軍，平時可出一百萬，戰時可加到三百萬，海軍也是很強的，幾幾乎可以和英美爭雄。經過華盛頓會議之後，戰艦才限制到三十萬噸。日本的大戰船，像巡洋艦、潛水艇、驅逐艦都是很堅固，戰鬥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鷲潭來的兩隻驅逐艦，中國便沒有更大的戰鬥力的船可以抵抗，像這種驅逐艦在日本有百幾隻，日本如果用這種戰艦來和我們打仗，隨時便可以破我們的國防，制我們的死命。而且我們沿海各險要地方，又沒有很大的砲台，可以鞏固國防，所以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海陸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專就軍事上的壓迫說，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強國，都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

從上錄 國父這些言論，便可窺見 國父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的動機。至於該書的內容，根據 國父於民國十年七月八日在廣州給廖仲愷先生的手札，那僅是 國父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綱目草案，並非「國防計劃」一書的全豹。三民主義的自序說：「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爲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冊，於思想之線索，研究之門徑，亦大略規畫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大陳炯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燬去，殊可痛恨！」

所以 國父給廖先生這封信，可當作他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的「大略規畫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倘若不遭陳逆叛變的影響，而他又不是逝世得那麼早，則這部國防經典必可依

照此綱目完成。

國父給廖先生的手札，原文如左：

仲愷同志鑒：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予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為建國計劃（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國防計劃、革命方略等），畢而行之，以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之域焉。不期當時之黨人，以予之理想太高，遂格而不行。至今民國建元，十年於茲，中國猶未富強如列強者，皆以不實行予之救國計劃而已。余近日擬著一書（十年國防計劃）以為宣傳，使我國全國國民了解予之救國計劃也。該書之綱目，筆之如左：

- 一 國防概論
- 二 國防之方針與國防政策
- 三 國防之原則
- 四 國防建設大綱
- 五 製定永遠國防政策，和永遠以國防軍備充實建設，為立國之政策
- 六 國防與憲法
- 七 太平洋國際政治問題與中國
- 八 國防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外交政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關係
- 九 國防與實業計劃之關係
- 十 發展國防工業計劃
- 十一 發展國防農業計劃
- 十二 發展國防鑛業計劃

- 十三 發展國防商業計劃
- 十四 發展國防交通計劃
- 十五 發展國防教育計劃
- 十六 財政之整理
- 十七 外交之政策和戰時外交之政策
- 十八 移民於東三省、新疆、西藏、內蒙古各邊疆省計劃
- 十九 保護海外各地華僑之意見書
- 二十 各地軍港、要塞、砲台、航空港之新設計劃
- 二一 都市與鄉村之國防計劃
- 二二 發展海軍建設計劃
- 二三 發展航空建設計劃
- 二四 發展陸軍建設計劃
- 二五 各項重要會議之召集，如開全國國防建設會議，海軍建設會議，軍事教育會議之屬，由中央政府，每年舉行一次，以爲整理國防建設
- 二六 軍事教育之改革與訓練計劃
- 二七 軍器之改良計劃
- 二八 軍制之改革
- 二九 軍醫之整理及改良軍人衛生之建設計劃
- 三十 國防警察之訓練

- 三二 軍用禽獸之訓練
- 三三 國防本部之進行工作
- 三四 仿效各國最新國防建設計劃
- 三五 舉行全國國防總動員之大演習計劃，和全國海陸空軍隊國防攻守戰術之大操演作戰計劃
- 三六 遣派青年軍校學生留學歐美各國學習各軍事專門學校及國防科學物質工程專門學校之意見書
- 三七 向列強定製各項陸海空新式兵器，如潛水艇、航空機、坦克砲車、軍用飛機、汽球等，以爲充實我國之精銳兵器與仿製兵器之需
- 三八 獎勵國民關於國防物質科學發明之方略
- 三九 購買各國軍事書籍、軍用品、軍用科學儀器、軍用交通器具、軍用大小機器等，以爲整理國防之需
- 四十 組織考察世界各國軍備建設之意見書
- 四一 聘請列強軍事專門人員來華教練我國海陸空軍事學生，及教練國防物質技術工程之意見計劃書
- 四二 收回我國一切喪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讓地之計劃
- 四三 我國與各國國防實力比較表
- 四四 抵禦各國侵略中國計劃之方略
- 四五 訓練國防基本人才三千萬計劃，訓練國防物質工程技術人才一千萬計劃

四六 完成十年國防重要建設計劃一覽表

四七 新兵器之標準

四八 組織海陸空軍隊之標準

四九 擴張漢陽兵工廠如德國克魯伯砲廠之計劃

五十 國民代表大會關於國防計劃之修改、國防建設意見書

五一 歐戰戰後之經驗

五二 國防與人口問題

五三 國防與國權

五四 指導國民研究軍事學問之研究

五五 實施全國精兵政策

五六 軍人精神教育與物質教育之比較

五七 注重國際軍備之狀況

五八 我國之海軍建艦計劃，航空建設計劃，陸軍各種新式槍砲戰車及科學兵器機械兵器建造計劃

五九 訓練不敗之海陸空軍計劃

六十 列強之遠東遠征海陸空軍與我國國防

六一 各國富強之研究

六二 結論

以上各計劃，不過大綱而已，至於詳細之計劃，待本書脫稿，方可閱覽。予鑒察世界大勢及

本國國情，而中國欲爲世界第一等大強國，及免重受各國兵力侵略，則需努力實行擴張軍備建設也。○若國民與政府一心一德實行之，則中國富強，如反掌之易也。手此，即候

毅安！

孫 文 七月八日

這封手札中所載「國防計劃」一書的綱目六十二項，雖說尙是一篇信筆寫來的簡單初稿，却具有現代化國防計劃的新規模。申言之，它不是十九世紀以前那種純粹軍事的國防計劃，已進而把國家的整個活動如政治、經濟、文化等部門和軍事並列一起，完成全體性的國防建設，來適應現代全體性的戰爭（即總體戰）。他眼光的遠大，計慮的週詳，實爲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爲、梁啟超輩望塵莫及。

國父這個國防計劃大綱草案，真是範圍龐大，項目繁多，如果完成，必是一部輝煌巨著，與三民主義，實業計劃二書，鼎足而三。我要加以說明和研究的：首先是第一項：「國防概論」，這是關於國防一般論述，亦可以說是全書的楔子或緒論。第二項：「國防之方針與國防政策」，所謂國防方針是根據國防思想（國防思想根據戰爭思想），假想敵國及本國各種特殊情形而制定的。國父所要制定的國防方針，是自衛的，不是侵略的，是守勢的，不是攻勢的，正如四十二項所說：「收回一切喪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讓地，」及四十四項：「抵禦各國侵略中國之方略。」又如手札所說：「免受各國兵力侵略」，依此而完成中國之自由獨立。所謂國防政策是爲實現國防方針的手段與方案，它是隨時代環境而變更的。而國防方針則可經久不變，或往往一成不變，兩者的關係如此，其不同又如彼。至於國防政策的範圍應包括國防政治政策，國防經濟政策，國防文化政策，國防軍事政策，而以軍事爲中心。第三項：「國防之原則」，本來在國防原則上，是以使敵人一兵一卒，不得侵入國境爲最高原則，英國亞爾夫來多氏說：「真正的國防，在於不使敵人上陸一步。」近代各國軍事家亦多主張：「求戰場必於國境之外

但還是要擁有強大的武力，例如美國今日的國防，以擁有優勢的原子武器及陸海空軍，當然可以採用此一最高原則，試看她西邊的第一道防線在易北河，東邊的第一道防線，在所謂「太平洋防線」，便可想而知。以我們今日的國防力量，自然談不上採取此原則。惟依 國父的意見，則以採取守勢作戰擊敗侵入的敵軍為原則。不過今日的國防觀念，已由一國的自衛，擴大為一個集團的共同防衛，如歐洲的比利時、荷蘭、盧森堡諸小國，由於加入北大西洋公約國，亦可以保其安全。不過一個國家總要能自強才可。

第四項：「國防建設大綱」這是確定國防建設的依據、宗旨、實行的方法與步驟，及所必備的條件與程序，正如建國必須制定「建國大綱」一樣。國父國防建設計劃的整個內容，依於大綱草案可分別歸納為國防政治建設，國防經濟建設，國防文化建設，國防軍事建設四部門，並作簡單的說明和研究如左：

一、國防 政治建設

政治要以國防為中心，這是現代政治的趨勢。倘若政治建設不合乎國防的要求，或失敗的話，在平時足以招致國防的不安，到戰時，尤足導致戰爭的失敗。所以大綱中對於政治極為重視，故訂有第五十三項：「國防與國權」，國權亦稱主權，從事國防的建設，必須先求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要能自由行使，不受人家的支配。第六項防的建設，必須先求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要能自由行使，不受人家的支配。第六項

：「國防與憲法」，憲法是國家的大本，是說中華民國應建設為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俾能發揮全民的力量來建設國防，並使軍事國防的進行，不受政治變動的影響。第八項：「國防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中央政府之關係。」三民主義與國防的關係，略如上述。五權憲法乃為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建立一個萬能政府，負責國防的建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於國防建設，應釐定職權，分工合作，且全體人員均要潔已奉公，增進效率。第三十項：「國防警察之訓練」，用以防奸捕諜，維持國家治安，且可作為戰時的預備軍。第二十一項：「都市與鄉村之國防計劃」，是為建設全國都市與鄉村國的防化。

第五十二項：「國防與人口問題」。這是關於全國人口的生殖養育問題，在國防上所需要的國民是質優量多，但兩者比較，質重於量。故應提倡國民體育，預防疾病，增進營養。第十八項：「移民東三省、新疆、西藏、內外蒙古各邊省計劃」，用政府力量，移民於西北邊省，以解決本部人口的過剩，並得充實邊疆，開發資源，鞏固國防。第十九項：「保護海外各地華僑之意見書」，華僑為革命之母，向來對於祖國有很大貢獻。故在國防上應盡量設法（或用外交或用海軍）來保護他們，使他們在海外得以自由生存發展，不受人家的侮辱與宰制。還有第十七項：「外交之政策和戰時外交之政策」，平時外交，在取得友邦的協調與援助，以利國防建設。戰時外交在孤立敵人，爭取與國，以促進戰爭的勝利。因此必須確立有效的外交政策。總之，我們要儘量利用外交來達到我國防上的要求，却不可忽略外交的後盾——國防武力。

二、國防 經濟建設

經濟為國防力之一環，現在一國的經濟建設，已由國民經濟發展到國防經濟的階段。關於國防經濟的定義，據國防經濟學者的見解，它是表現於下述的三種形態：第一、平時經濟，作戰爭的準備，其主要目的，仍在滿足一般國民經濟的需要。第二、過渡時期經濟，即在戰爭危機迫切的時候，實行各種準備戰時經濟的手段，如經濟動員。第三、戰時經濟，即經濟戰爭，主要在滿足國防武力，國民經濟的需要，及對敵實施經濟戰。在國防建設上，如果經濟沒有建設成功，則其他一切建設計劃，將難完成，而國防經濟的建設，要在完成軍事經濟力量。國父說：「大德意志聯邦成立之初，本來是農業國，後來變成工業國，因為工業發達，所以陸海軍也隨之強盛。」（「民族主義」第四講）大綱上有第五項：「永遠以國防軍備充實建設，為立國之政策。」這是指示我們今後的經濟建設要以國防軍事為中心。第九項：「國防與實業計劃之關係」，國父的實業計劃，即屬於國防經濟——平時的國防經濟，自然與戰時有密切關係。第十項

：「發展國防工業計劃」，工業分爲輕工業與重工業，我國今後對於工業的建設，應側重於重工業，以便生產新武器，而加強國防軍的戰鬥力。正如俾士麥說：「國防的基幹是深植於工業繁榮的沃土中。」

第十一項：「發展國防農業計劃」，實現全國糧食的自給自足，準備支持來日的長期戰爭。第十二項：「發展國防鑛業計劃」，在儘量開發各地鑛產，如開採金銀鑛產，以應財政上之需。開採煤、油、銅、錫、鎊、鎳、鉛、鋅等鑛產以供工業上之用。第十三項：「發展國防商業計劃」，在使國內和國外的貿易活動，都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俾有助於國防力量的養成。例如獎勵大量輸入國防用品及重工業的器材原料，使一切國防上及重工業上之基本設施，得以儘速完成。而於奢侈品及非必需品則禁止輸入，以節約外匯，但要注意的，必須禁絕奸商汚吏的走私漏稅。第十四項：「發展國防交通計劃」，爲建設陸上水空中各種交通網，以便國防上的通訊和運輸。第十六項：「財政之整理」，這是 國父有感於當時財政的紊亂，不合乎國防的要求，故提出這個計劃，在肅清貪污，確立制度，平衡收支，培養稅源，增加收入，俾國防建設得以順利進行。

三、國防

文化建

設

文化力量在戰爭上亦可以取勝，與武力的比較，武力固可以取勝，但武力爲保持其所獲得的勝利，仍須繼以文化的發揚。國父說得好：「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強盛的緣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

（「民族主義」第六講）可是爲發展文化，充實文化的力量，首在改革教育，使成爲國防教育。普之勝法，俾士麥歸功於小學教師。日之勝清勝俄，日人歸功於「忠君愛國」的教育，便是兩大例證。所以大綱中有第十五項：「發展國防教育計劃」，這個計劃的範圍，首在實現學校教育的國防化，但亦包括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的國防化，旨在把每一個國民養成「國防人」，以參加國防工作及全民戰爭。

第四十五項：「訓練國防基本人才三千萬計劃，訓練國防物質工程技術人才一千萬計劃」，這真是一個

迫切而龐大的計劃，在常人驟然看來，似乎近於吹牛，誠如現代國防部門之廣，國防業務之繁，非養成這麼多的人才莫辦，尤以戰時國防各部門的動員需要人才更多，故不可不預為準備。第五十四項：「指導國民研究軍事學問之研究」，在增進國民的軍事常識及技能，其實施方式——或用演講，或用通訊，或用圖書儀器，或設立訓練班，或設立各種協會如射擊協會、防空協會來促成之。還有第三十八項：「獎勵國民關於國防物質科學發明之方略」，我們知道：科學是國防的基礎。今日我國最感落後的就是科學，而欲發展科學，除普及科學教育外，還要獎勵專家分途研究，多多發明。現在世界各國科學水準最高的國家，首推美國，科學研究機關，有如林立，不惜金錢的耗費，所以在二次大戰中，終完成了原子彈的發明。至於各國政府對於科學上有特殊貢獻或發明的專家，獎予巨金，乃為常事，且有賜以爵位者，如英國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的獲得侯爵，有享受國葬之禮者，如德國巴羅尼布氏的逝世，他是尼布可武圖版的發明家，又為無線電傳真的功勞者。且遠在一八八二年陸巴特克福博士遠赴印度，發現了虎疫的病原菌，回國時，威廉第二歡迎以凱旋將軍之禮，科學壇上，一時傳為佳話。國父說過：「恢復我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外國的長處，就是科學。……如果能夠迎頭去學，十年之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民族主義」第六講）確是真知灼見。

四、國防 軍事建 設

軍事在國防上為重要的一環。上述政治、經濟、文化諸部門均要與軍事配合而並進。因為國防建設是準備戰爭，而軍事戰又是總體戰的骨幹，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簡直無從鞏固國防，參加現代的戰爭。先談軍事教育，大綱中第二十六項：「軍事教育之改革與訓練計劃」，我國軍事教育向落人後，亟應改革，及樹立健全的訓練計劃，以資養成優良的幹部。第五十六項：「軍人精神教育與物質教育之比較」，兩者比較，當以精神教育為重，尤以物質裝備處於劣勢的國軍，更應以精神教育為重。第五十九項：「訓練不敗之海陸空軍

計劃」，欲訓練陸海空軍成爲戰而不敗的軍隊，確非易事，有待於優良教育的建設，使指揮官對於戰略戰術運用自如，士兵對於戰鬥技能極爲嫻熟，及全體官兵均有爲主義而奮鬥犧牲的決心。第三十六項：「遣派青年軍校學生留學歐美各國，學習於各軍事專門學校，及國防科學、物質工程專門學校之意見書。」此爲深造青年學生成爲專家來擔當軍事上或經濟上的國防建設等任務。第四十一項：「聘請列強軍事專門人員來華教練我海陸空軍事學生，及教練國防物質技術工程之意見書」，這是「楚材晉用」的政策，因我國向來缺乏此項專才，故宜酌聘諸友邦，以爲顧問或教官。

說到二十八項：「軍制之改革，是主張改革軍隊的建制及保育制度，以適應國防上的要求。第五十五項：「實施全國精兵政策」，是說今後的建軍，應採取精兵主義，在平時兵額宜少不宜多，以免曠耗國帑。相反的，在戰時却要求兵愈多愈好，兵多而素質又優良，戰則必勝，這也是「國父主張採取「征兵制度」的理由。第四十八項：「組織海陸空軍隊之標準」，這是屬於軍隊的編制問題，而軍隊編制的標準，則以擁有兵員兵器，及戰術要求，敵軍狀態而定，且應不斷提高標準。中國人做事最大的毛病就是沒有標準，在建軍上尤應切戒。第二十九項：「軍醫之整理及改良軍人衛生之建設計劃」，孫子說過，「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故爲維持軍人的康健必須講求改良衛生，而改良衛生，首在整理軍醫，及確立改良衛生建設計劃。第三十一項：「軍用禽獸之訓練」，如驟馬、軍用鴿、軍用犬等的訓練。第二十七項：「軍器之改良計劃」，第三十七項：「向列強定製各項海陸空新式兵器，如潛水艇、航空機、坦克砲車、軍用飛艇、汽球等，爲充實我國之精銳兵器，與仿製兵器之需。」第四十九項：「擴張漢陽兵工廠，如德國克虜伯砲廠之計劃。」第五十八項：「我國之海軍建艦計劃、航空建機計劃、陸軍之各種新式槍砲戰車及科學兵器機械兵器建造計劃。」這都是關於兵器之改良，購買和製造的計劃，在充實國軍的新銳兵器，加強戰鬥力量。但爲製造兵器，及供其他

軍事上之需，則要有種種工具，所以又有第三十九項：「購買各國軍事書籍、軍用品、軍用科學儀器、軍用交通器具、軍用大小儀器等等，以爲整理之需。」還有第四十七項：「新兵器之標準」，這是說國軍所用的新兵器，如陸軍兵器、空軍兵器、海軍兵器、化學兵器等，均要有一定的標準，即新兵器的制式要一律，種類要單純，自製的要有一定標準，外購的亦要有一定標準，以便戰時補充。但以未來戰爭的長期，對於一切武器必須能够自製自給，外購的僅爲過渡時期及供仿造而已。至於擴充漢陽兵工廠，如同德國克虜伯砲廠，不過舉其一例，其他海空軍等廠，亦當要與世界第一等強國並駕齊驅。第二十二項：「各地軍港、要塞、砲臺、航空港之新建設計劃」，這是軍事建設上一個大規模的計劃，工程浩大，需費亦鉅。軍港爲海軍根據地，航空港爲海軍航空根據地，要塞爲築城之一種，通常區分爲：（一）陸地要塞，（二）江岸要塞，（三）海軍要塞。砲臺爲設置砲位之所，要塞的一部分。至於要塞的功用，在節省兵力，阻塞敵人，疲困敵人，給予自己的軍隊以攻擊敵人的適當機會。但我們則不可過信要塞的功用，如果認爲我們已構築有強固的要塞，從此敵人便不敢來犯，那是錯誤的。世界頂有名的強固要塞，如比國的列日，法國的馬奇諾，英國的新加坡，曾經先後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宣告她悲慘的命運，這真是我們一個最寶貴的教訓。以上各項皆屬國防軍事建設計劃，亦可分別歸併於第二十二項：「發展海軍建設計劃」，第二十三項：「發展空軍建設計劃」，及第二十四項：「發展陸軍建設計劃」之內，真是無所不包的大軍事建設計劃。

其次，說到第二十五項：「作戰計劃」，孫子說：「多算勝，（算爲作戰計劃——浴日註）少算不勝。」拿破崙說：「完備的計劃爲戰爭勝利之母。」近代各國的作戰計劃通常由參謀本部策定的，像有名的「史蒂芬計劃」，便是德國參謀總長史蒂芬主持參謀本部時所豫定的對法作戰計劃，德國於第一次歐戰未能攻下巴黎，打敗法國，是因小毛奇沒有澈底執行這個計劃的錯誤。二次歐洲大戰希特勒的打敗法國

，也是根據着「史蒂芬計劃」而變化運用。可見作戰計劃在國防上的重要性。這裏所說的「作戰計劃」，雖可以解釋它包括政治作戰，經濟作戰，文化作戰及軍事作戰等計劃，仍以專指軍事的作戰計劃而言為恰當，如陸軍作戰計劃，海軍作戰計劃，空軍作戰計劃，及陸海空軍聯合作戰計劃。還有第三十四項：「舉行全國總動員之大演習計劃，與全國海陸空軍隊國防攻守戰術之大操演。」動員的原意，是最初步的軍事行動，亦即最末一次的軍事準備，也可以說是建軍（裝備）的準備完成與作戰（集中）的行動開始。於此足見動員最初的範圍，是限於軍隊的裝備，但自普法戰爭後，動員範圍已逐漸擴大，直至第一次歐洲大戰，其範圍更加擴大，便有全國總動員之說。所謂全國總動員，即包括軍事動員與民事動員兩部，民事動員，日本稱為「國家總動員」，即除軍事外之全國動員。所謂全國總動員演習，係在平時將所編成的動員計劃加以實地演習，錯誤發生即予改正，並求熟則生巧，俾到真正動員的時候，得以迅速確實，為完成全國總動員的準備，以便戰時立刻實現全國的總動員。

以上各部門的國防計劃，國父原擬假以十年的長期間來完成其重要建設的，故大綱中有「完成十年國防重要建設計劃一覽表」的第四十六項，不過以科學落後，國防基礎薄弱的我國，欲使其變為世界第一等強國，守必固，攻必取，則非十年所可奏效，十年之後，仍須來無數個十年。正如德皇威廉第二所說：「國防是永遠做不完的怪物，改善和增進，亦同樣的無止境。」雖說威廉的國防觀是侵略的，但我們為自衛計，亦須不斷地建設下去，因為世界各國的國防建設，有進無止，科學的進步，亦一日千里，倘若我們自甘落後，或中着「一勞永逸」之毒，則所建設的國防，必不足以適應將來戰爭的要求，無法逃避亡國滅種的命運。所以國父在大綱的第五項中定有「制定永遠國防政策」。國父說過：「所謂無敵國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覺得沒有外患，自以為很安全，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外人不致來侵犯，可以不必講國防，所以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國。」（「民族主義」第五講）這也是說國防要作不斷的建設

的。

此外，第三十三項：「仿效各國最新國防建設計劃」，此為取長補短，但須經過消化，可歸併於上述四大部門之內。關於國防建設的機構，國父主張設置一個具有綜合性的國防本部（第三十二項）及召集各種國防會議（第二十五項及第五十項）以為整理國防建設及設計之資。

總之，中國為世界的一環，中國不能離開世界而閉關自守，所以為建設中國的國防，或確立有效的國防計劃，固然要「知己」，更要「知彼」，即要明瞭國際形勢，列強虛實，及其對我態度，謀我奸計。所以大綱中有第四十項：「組織考察世界各國軍備建設團之意見書」，第五十七項：「注重國際軍備之狀態」，第七項：「太平洋國際政治問題與中國」，第六十項：「列強之遠東遠征海陸空軍與我國國防」，第四十三項：「我國與各國國防實力比較表」，第六十一項：「各國富強之研究」，及第五十一項「歐戰戰後之經驗」，這一項所謂「歐戰」，係指第一次歐戰而言，今日我們是要進而接受二次歐戰及韓戰的經驗了。但在國防建設上，則不能只是根據今天戰爭的經驗，而忽略了未來戰爭的遠景。

司馬法說：「國雖強，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是教示我們不可好戰，却不可鬆懈了國防的建設。所以我們在戰時要積極建設國防，就是平時也一樣要積極建設國防。我們因為過去國防力量的薄弱，所以一遇日本的侵略，只得且戰且退。勝利後，未遑建設新的國防力量，又遇俄帝侵略，共匪倡亂，大陸淪亡，赤禍蔓延，言念及此，殊可痛恨！今我政府已決意一切從臺灣做起，勵精圖治，整軍經武，他日反攻勝利，務須根據國父這個寶貴的遺教，斟酌實際需要，詳訂實施計劃，淬勵奮鬥，實踐力行，使我國防日臻強固，永無外患的侵凌，並維持世界的和平。

四、戰爭與政治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是克勞塞維慈氏的名言，根據克氏的意見，戰爭為政治的手段，用以貫徹政治目的之手段。前面說過，國父是受着克氏學說的影響的，但克氏是為戰爭而戰爭，却不開政治目的的好壞，國父却是為革命而戰爭，有着偉大的政治理想，這是國父比克氏進步得多了。近代戰爭是要求政治家要懂得軍事，軍事家要懂得政治，否則，便不能密切配合，尤以軍事是政治的一部門，為政者非懂得戰略不可。國父是一個政治家，也是一個軍事家，這是他偉大的所在，也是我們的楷模。內政與外交為政治的兩大形態，關係戰爭的勝敗至鉅。倘若內政與外交俱不配合戰爭，甚至背道而馳，非導致戰爭失敗不可。在這裡，我且把國父關於戰爭與政治的言論亦即戰時政治的言論，分為內政與外交兩方面來研究。

一、內政

方面

戰爭所要求於內政，最要緊的是舉國團結一致。因為舉國上下及各黨各派團結一致，才可以構成強大的力量，協助戰爭，支持戰爭。國父說：「中國現在時勢，尚在危險時代，如各自為謀，不以國家為前提，無論外人虎視眈眈，瓜分之禍，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謀，而離心離德，亦難有成。是中國欲建鞏固之國家，非萬眾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覬覦。」（「謀建設須掃除舊思想」講詞）又說：「大敵當前，而內紛不息，事甚無謂，文已電同志，俾泯猜慮，並求事實上之一致。……務嚴約束，勿復生釁，庶幾同心戮力，共伸天討。」（「致岑春煊協力討袁電」）同樣在對外戰爭時，更要促成國內的團結一致，能如是，方不致發生無謂的磨擦，以互相抵銷，更不會被人挑撥離間，以自相分裂。國父於民元目擊帝俄侵略我

外蒙古，便發表錢幣革命通電，主張對俄抗戰說：「故舉國一致，誓死靡他也。」這真是我們今日反共抗俄的箴言。

「足食」、「足兵」亦為戰時內政的要項，關於足食方面，留待下篇論述。關於足兵方面，在反共抗俄的今日，亟應實行「國父所主張的『徵兵制度』」，做到人人能戰，使臺灣成爲一個現代「斯巴達」。

要之，不啻爲謀舉國一致、或足食足兵，在內政上首要樹立「萬能政府」（見「民權主義」，爲民主政治的核心），以爲領導和推動戰爭。又戰爭所需要全國人民的「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物出物」，更要有取得人民信仰與擁戴的「萬能政府」。要之，戰時內政至爲繁重，措施的適宜與否，往往足以影響戰爭的勝敗，國家的興亡。所以一個戰時政府是不能充斥着無能之輩，貪污之流的。其次，戰時政府是要實行集權的，人民的一切都要受其管制。（但在今日民主時代，應有限度的）國父說：「譬如今次之世界大戰爭，凡參加此戰爭之國，無論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憲政，行軍政，向來人民之行動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皆削奪之，並且飲食營業，皆歸政府支配，而舉國無有異議，且獻其生命爲國家作犧牲，以其目的在戰勝而圖存也。」（「孫文學說」第六章）

二、外交

方面

外交與軍事本爲「難兄難弟」，在戰爭未爆發之前，外交可代替軍事，戰爭一經爆發之後，外交就要協助軍事。第一次歐戰方酣之際，南菲斯末資將軍曾說過：「這次戰爭不僅是單純的武力角逐，如果我們要把擔任最後勝利，我們必須運用外交，如運用其他國力一樣。當我們協約國達到滿意的和平時候，我們最高理想的實現，不僅依賴軍事行動，還須憑藉外交利器。」戰時外交的重要性，於此可見。在普法戰爭中，普之勝法，固勝於色當一役，亦由於俾士麥和英聯奧及對俄調協，使法國陷於孤立，以協助軍事。在意大利統一戰爭中，意之勝奧，雖勝於蘇費立倭一役，亦由於加富爾運外交手段，聯法聯英，及對普親善，得以全對力付

奧國，這是兩大顯著的例證。

國父是一個大革命家，也是一個大外交家，彼在推翻滿清的革命戰爭中，奔走海外，聯絡友邦，用能博得國際同情，取得國際援助。當在美國聽得武昌起義的捷訊，本擬由太平洋潛行返國，親與革命之戰，繼念「吾黨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更大也。」（「自傳」）遂起程赴英，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停止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銷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歸國。此三事均得英政府允許，方取道法國東歸。民國以來，於討賊各役中，亦莫不運用外交以佐之，藉孤奸賊之勢，並取得國際間的援助。又如民十二在廣州收回關稅，以充北伐經費，北京使團竟令外艦集中省河，百端恫嚇，國父從容應付，據理力爭，卒達目的。民十三廣州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利用商團公然叛變，英領且為張目，致國民政府以哀的美敦書，阻止政府戡亂，國父乃向英政府提出抗議，卒使英艦不敢妄動，而英領亦因此去職。還有民十二由於聯俄，亦促進了北伐初期的發展。

以上是國父外交戰成功的事實。其次國父欲本其外交知識經驗，著作「外交政策」一書，雖未完成，而關於外交言論，散見於遺教中頗多。民族主義第五講說：「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砲，他們用槍砲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祇要一張紙和一枝筆，用一張紙和一枝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中國雖然派了代表，所議關於中國之事，表面都說為中國謀利益，但是華盛頓散會不久，各國報紙便有共管之說發生。此共管之說，以後必一日進步一日，各國之處心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他們以後的方法，不必要動陸軍，要開兵船，祇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使可以亡中國。如果動陸軍開兵船，還要十天或者四五十天，才可以亡中國。至於用妥協的方法，祇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

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是一朝，所以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祇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妥協之後，波蘭便亡。照這個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這是說軍事與外交同屬政治力的手段，而其「不戰而屈」的外交手段，尤為可怕。和平統一化兵為工的講詞裡就革命戰爭的中外交說：「革命的成功與否，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起來，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幫助武力，好像左手幫助右手一樣。從前美國獨立，革英國的命，所以成功的原因，一半固然由於本國武力的血戰，但一半可以說是由法國外交力的幫助。如果專靠武力，決是難於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由廣西打過湖南、湖北，以至建都南京，而終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於外交失敗，沒有外交力的幫助（致招英國戈登幫助滿清親自帶兵去打蘇州——浴日註），所以革命的成功與否，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至於軍事的進展亦足以給予外交有利的影響。國父自美洲歐羅巴往英，以說彼中權要，想必能得當。法國政府，則向已有通情者也。如是吾黨今日可決英美法三國政府，必樂觀吾黨之成事，則再舉之日，必無藉端干涉之舉，且必能力阻他國之干涉也。此又外交之路，因羊城之影響而收效果者也。」

國父認為外交在對外關係上是很重要的，又認為一國對外應先用外交手段，然後用戰爭手段，亦是見維護國際和平的精神。他說：「國家既不可以長從事於戰爭，而對外國之關係則有日增無日減。于此關係日密之際，不能用戰爭以求達其存在發達之目的，則必求其他之手段，所謂外交者由是而發生。凡國家之國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仍當復於外交之序。故國與國遇，用外交手段與用戰爭手段，均為行其政策所不可闕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時多

戰爭手段之時少，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軌則，戰爭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云者，外交手段既盡，無可如何之謂也。」這個外交思想，正淵源於孫子所說：「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於此我們要注意的，不論在平時或戰時，爲求外交的勝利，須以國內的一致團結爲基礎。國父說：「夫欲求外交之勝利，必先謀內政之修明。今內部既分裂如是，何能得國際之承認。……倘西南各省，一致擁戴軍政府，承認大元帥，則國內團結既固，對外發言效力自強，斷不患外交團之否認，及交涉之不勝利也。」（「致貴陽王文華、劉顯世電」）又說：「外交恃內政，內政要是好，外交簡直不成問題。」（「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重任」講詞）又說：「內政不清，外交益多荆棘。有謂外交運用得宜，則內政可徐圖改善者，此實未窺見外患之來，由於內障耳。」（「覆王正廷論外交與內政關係函」）可見兩者的關係。

國父在外交上一向反對滿清時代李鴻章所採取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國存亡問題」）他所釐定的民二國民黨政見宣言說：「外交徵與，有應事發生者，未可預定，亦難說明。」却很具體地提出兩個基本方針：一曰聯絡素日親厚與國，（亦即「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曰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該宣言說：「惟外交方針，則可約略言之：一曰聯絡素日親厚與國；今國於世界，孤立無助，實爲險象。故必當聯絡素日親厚之與國，或締協約，或結同盟，或一國，或數國，俱爲當時之妙用。一曰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吾國現勢，非致力對外之時，故宜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使之相承不變，而得專心於內政之整理。」亦即前者爲與利害相關的國家結成同盟，以取得經濟上及軍事上的援助。後者爲維持中立國家素日對我所採取的公平主義，如尊重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維護我國之反抗侵略運動等，使之相承不變。惟在反共抗俄的今日，不祇要維持之，還要發展之，我們應利用外交來孤立敵人，增強自己，促進戰爭的勝利。

其次，爲使外交運用得宜，爭取外交戰的勝利：第一、要明瞭情況；民二國民黨政見宣言說：「吾國之積弱，非善用外交，不足以求存。然欲運用外交，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盡其用。中國向來外交，無往而不失敗，蓋以不知國際上相互之關係，一遇外人虛聲恫嚇，卽惟有讓步之一法，是誠可傷心者也。」尤以辦理戰時外交，更要洞識當時各國千變萬化的實情，及國際間複雜錯綜的利害關係，因此必須建立健全的外交情報網，以求「知己知彼」，才能確立有效的對策。

第二、要爭取自主：一國的外交，不宜媚外，亦不必畏外，不宜盲從人家，亦不可附庸人家，一定要獨立自主，尤以戰時外交爲然。正如 國父說：「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中國存亡問題」）方能操縱自如，爭取勝利。又說：「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彼不能保其自主之精神，何取乎有此國家乎？……中國欲於此危疑之交，免滅亡之患，亦惟有自存其獨立不屈之精神而已。」（全）又說：「吾國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後，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與得失之所在，殊可嘆也。今後吾國之外交，對於海軍國，固當注重，然對於歐亞大陸之俄德二國，更不能不特殊留意，不宜盲從他國，致爲人利用也。」（「外交上應取的態度」談話）又說：「中國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爲外國人廢除不平等條約，必須要有中國有力量，如果中國一日沒有力量，那些舊約便一日不能廢除。這個道理，殊不盡然。要請外國不能廢除舊條約，就要問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力爭。如果大家決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好像最近的華盛頓會議，外國人便主張放鬆，從前的凱馬契約，外國人也主張實行。我們中國人都是不爭，都是不要。假若全國國民一致要求，這種目的，一定可以達到的。」（「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講詞）其強調外交自主的精神可見。我國過去抗戰的外交，卽由於能够發揚 國父這個遺教，獨立自主，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肯中途妥協，故能爭取最後的勝利。在今後反共抗俄的戰爭中，更應如此。

第三、要把握利害：國與國間的分合，係以利害爲前提，其合由於利害的相同，其分由於利害的衝

突，絕不是感情道義所可維繫，必須有着利害關係，然後才有感情道義可言，尤以戰時外交爲然。英國人說：「英國無永久之友，亦無永久之敵，只有英國之利益。」孫子說：「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真是道破外交的真形。國父在外交上向重信義和道德，但對現實的外交則實視利害，他說：「夫兩國之聯盟，匪以其條約而有效者也，真正原因，乃在其利害之共同。英國之無急切與德衝突之必要，業如前章所已言。此次交戰，既不能達摧抑最強國之目的，英國爲保其存在，不得不棄所欲得之利益，以保其所已得之利益，而德國苟以英國之助，得其所欲得之利益，卽爲利害共同，而聯盟之事自生。譬諸意大利，本與法爲近屬，且得法之助以立國。而一旦爭菲洲北岸之地，與德奧有共同利害，則加入三國同盟以敵法。及其戰土以後，利害與奧衝突，而對法緩和，則又復活其同種之感情，與建國之舊恩。故知國際恩怨要約。兩不可恃。同種云者，亦不過使利害易共同之一條件，其他感情上之事實，隨時而變更，非可規律久遠之政策也。欲兩國之真正利害共同，必能有割捨之決心。所謂協調者，各着眼於永久之計劃，於將來兩國發展所必須者以交讓行之。……世人有疑此者，請視日俄，日俄以傾國之力相搏，事纔十載，日俄之宣戰，距樸資茅斯條約，不過八年有餘，日俄媾和之際，吾在東京，親見市民狂熱，攻小村和議特使爲賣國，以桂總理爲無能。焚警舍，擊吏人，卒倒內閣，輿論未聞有贊成和議者，曾幾何時，而人人以狂熱歡迎俄人之捷報。夫感情隨事而逝，亦隨事而生，一國當時之外交，必決諸恆久之利害，決不能以暫時之感情判之，以日俄之前事，可以判英德之將來矣。」（「中國存亡問題」）再說：「大凡立國必須與利害相關之國，携手進行，方能進步，利害不相關之國，縱使欲與我相親，但是不可以與之親近者。從前滿清政府……不知利害相關的道理，純是遠交近攻之政策，……一經親俄，天山以西帕米爾高原一帶，已非我有，延至今日，蒙古又將不見了，這就是利害不相關之國相親的害。……今日謀鞏固中華民國，必須注重外交。」（「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講詞）

所以我們在現實的外交上，一定要透視和把握着彼此間的利害，依此而講求應付之方，自可迎刃而解，尤以戰時外交爲然。

最後，近世以來，世界各國的善用外交者，莫如英德，英國在第一次歐戰中，既把德國的盟友意大利拉過來，又把中立國的美利堅捲入漩渦，並肩作戰，卒收戰勝之果。但在二次歐戰之初，因對俄外交的失敗，使德國得以大胆發動西線之戰，而自己遂罹重大的損失。

德國在二次歐戰中，既聯意以制法，又聯俄以避免東西兩面作戰之苦，而得集中力量解決西線各國，旋轉鋒攻俄，欲求速戰速決，但因赫斯飛英的失敗，遂使攻俄之戰一敗再敗，至於亡國，於此，足見戰時外交運用的困難，但根本的原因，實由他們外交政策的錯誤，弄至無法補救。今日我們反共抗俄，國際形勢雖是對我日益有利，但我們還要善用外交，外交將給予我們無限的助力，外交將促進我們戰爭的勝利。

五、戰爭與經濟

經濟是軍事的基础，足以決定戰爭的繼續，亦足以決定戰爭的勝敗。其表現於古代戰爭上，已相當顯著，「孫子兵法」一書是兩千多年前的著作，其中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聚矣。」惟現代戰時經濟的動員則非古代局部的動員可比，它是要澈底地由平時經濟體制改變為戰時經濟體制，即整個的動員，才能適應現代戰爭的要求。

在 國父遺教中，關於戰爭與經濟及其有關係論很多，我在這裏姑分為——財政、工業、糧食這三方面來研究：

一、財政

方面

近代戰爭是金錢的大需要者，也是金錢的大量消耗者，簡直成為文學上的數字。像普法戰爭，雙方的戰費共計美金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俄戰費共計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一次世界大戰計二〇八、三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二次世界大戰共計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所以近代戰時的支出，尤其是長期戰爭的支出，不是任何財政學者於事前所預想得到的，這個原因是由於：一、動員人數的龐大，二、軍需品消耗的增加，三、物價的上漲，及戰時各種新事業的舉辦。

德國經濟學家說：「戰爭的決勝，是決定於劍，也是決定於金，尤其是金在戰爭的進行中及終結時更表演着不可輕視的作用。」日人中澤三夫在其所著「戰爭」一書曾慨嘆道：「日俄戰爭……日本的現金準備，僅有一億餘元，所以在講和會議上，不能強硬主張我意志的原因，不外為財政困難所壓迫，真

的金錢爲戰爭所不可缺一。」所以一國的對外戰爭爲贏贏得勝利，在財政上應作充分的準備，及戰時的澈底動員。

國父在倒清的革命戰爭中，關於軍費的需要，其解決的辦法，是採取募捐、借債及發行軍用票等項，就中以獲得華僑的捐助爲多，不過當時所需要的數字并不大。國父於推翻滿清之後，不久，適逢帝俄虎視耽耽，欲併吞我外蒙古，這時國父極力主張對俄抗戰，並主張「錢幣革命」，即以「紙幣代金銀」，以解決對俄抗戰的財政困難問題，他說：「第一、行錢幣革命以解決財政之困難。今日我之不能言戰者，無過於財政困難。自南北統一後，則謀借外債，以救我金融之恐慌。然至今六國之借款無成，若一有戰事，則更復無望。然則就財政上言之，無論有戰無戰，財政問題之當解決，必不容緩也。文於謀革命時，卽已注意於此，定爲革命首要之圖。乃至武昌起義，各省不約而同，寢而北軍贊和，清帝退位，進行之順適，迴出意外，故所定方略，百未施一。民國大定後，財政雖困，以爲皆可以習慣之常理常法以解決之，便不欲以非常之事而驚國人也。不圖借債無成，而俄禍又起，存亡所關，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應之也。錢幣之革命者何？現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爲我國今日必較昔日窮乏，其實不然，我之財力如故，出產有加，其所以成此窮困之象者，則錢幣之不足也。錢幣維何？不過交換之中準，而貨財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發達之國，多以金錢爲之，其在工商已發達之國，財貨溢於金錢千百萬倍，則多以紙票代之矣。然則紙票者，將必盡金銀之用，而爲未來之錢幣，如金銀之奪往昔之布帛刀貝之用。……由此觀之，紙幣之行用有方，流弊不生既如彼，而利益之大又如此，況值非常之變，非先解決財政問題，必不能言戰。乃有熱血之士，徒責政府之無能，而不爲設身代想，殊不共諒當局人爲難之甚也。當此強鄰迫處，實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壯語所能抵禦，非有實力之對待不可，是宜政府與人民同心同德，協力進行錢幣革命，以救今日之窮。」（「錢幣革命通電」）

本來在歐美各國早已實行幣制革命，而國父這個偉大的主張，直至民國二十四年方得實現，即所謂「法幣政策」的成功，（禁止紙幣兌現，白銀收歸國有，並規定以中交農四行的鈔票爲法幣）過去抗戰之所以能够持久，端賴財政支持的力量，實行法幣政策的結果，亦即實行國父素所主張錢幣革命的結果。雖說當時通貨膨脹達於極點，却能支持至於勝利，並未拖垮戰爭，這不能算是不幸中之幸。

國父說：「倘財政之困難能解決，則軍事敢說必有把握。」（民十二）「覆蕪某囑解決東征軍費」可見他對戰時財政的重視，及財政影響軍事之大。又說：「此後外部，完全不成問題，所有的還是內部問題，這個內部問題，簡單的說，就是財政問題。」（「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講詞）又說：「政府爲擔負這樣多的軍餉，財政是很困難的。……這個銀行之所以能够開辦，就是因爲借了外國資本一千萬，……發行紙幣，要維持這種紙幣的信用，便要商界工界農界和政界軍界同力合作，來培植這種雞母和穀種的發達，便可以生出許多雞蛋和新穀，這種雞蛋和新穀，又可以再做種子，再生出雞母來生蛋，再長成新穀來做米，這種叢生不絕的生長，是毫無止境的，是毫無限量的。到了那個時候，軍界和政界便不怕窮，工商界和一切人民，便不怕沒有資本，這個銀行更是利益無窮。」（「銀行最高的信用是現兌」講詞）這是國父迫不得已借外債來開設銀行發行紙幣以供軍用的，凡此均可見國父解決戰時財政的苦心。

此外國父在財政上主張徵收直接稅說：「資本家的入息極多，國家直接徵稅，所謂多取之不爲慮。○從前舊稅法，祇是錢糧和關稅兩種，行那種稅法，就是國家的財源，完全取於一般平民，資本家對於國家，只享權利，毫不盡義務，那是很不公平的。德國英國老早發現這種不公平的事實，所以他們老早便行直接征稅的方法。○德國政府的歲入，由所得稅和遺產稅而來的，佔全國收入約自百分之六十之至百分之八十。英國政府關於這種收入，在上次歐戰開始的時候，也到百分之五十八（按英國在歐戰期間，所得稅收入增加七倍，遺產稅增加二倍——浴日誌）。美國實行這種稅法，較爲落後，在十年之前，纔

有這種法律，自有了這種法律以後，國家的收入，便年年大形增加，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專就所得稅一項的收入而論，便約有美金四十萬萬元。」（「民生主義」第一講） 國父這個主張，直至七七事變，我政府於同月廿一日頒直接稅暫行條例，八月廿二日公佈施行細則，方樹立了「直接稅體系」，使租稅重心，由間接稅移於直接稅，因而增加收入，支持長期的抗戰。

依於上述足見 國父對戰費的籌措，是採用發行、增稅、借債及募捐等辦法，正與現代各國戰時財政政策相符。今日我們反共抗俄，在財政上雖感不足，地方券額內外發行將達五億元，但幣值相當穩定，稅收亦有增加，且得源源而來的美援——經濟援助，軍用援助，其基礎頗屬鞏固。不過還要澈底動員，促進生產，節約消費，鼓勵國民捐獻，海外華僑輸將，及博取更多的美援，方能配合反攻大陸的要求。於此應附帶一提的：因為戰時社會的動盪，物價的高漲，生活的困難，每易使財務人員營私舞弊，侵吞中飽的，故必須澈底厲行 國父向所主張「實行懲戒官吏失職」（「國民黨政見宣言」）的政策，以肅清貪污，使財界明則化，做到涓滴歸公，這樣自可提高政府的威信，而博得人民的信仰與擁戴。魯登道夫將軍說：「人民既為國家而犧牲其金錢，則戰時公債一絲一毫，應用之於公，而不應用之於私，應用之於國事，不應以之肥私囊。若有侵吞公款之行爲，無異於政府自爲盜賊，掠奪民財，其應防止之也，自不待論。世界大戰中德人之應募公債者，既爲犧牲一己，原期於維持民族生存，而其結果如何乎？由世界大戰之經驗觀之，惟肅清政治上之弊竇，然後能保國民之一致團結，此在財政上尤爲重要。」

二、工業

方面

工業在現代戰爭上，其重要性並不亞於財政。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軍所以能屢建奇勳。主要的是得力於本國工業的發達，德國的領土雖然狹小，但在很小的領土之內，能建立龐大的軍隊，與敵國作戰達數年之久，就是賴於工業上能够供給德軍所需要的步槍、大砲、機關槍、飛機和技術。又如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能够成爲

「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也是由於平時工業的發達，一到戰時，便能大規模動員，生產大砲、飛機、坦克等精銳武器來源源接濟各盟國作爲反攻軸心國家之用，尤以原子彈的發明爲美國科學與工業上的一大成功。

中國工業的落後，由來已然。所以 國父於上李鴻章書中便提出發展工業的主張說：「機器巧則百業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民國以來，更倡導不遺餘力，因有「實業計劃」一書的發表，同時目擊國內資本、工具及人才的缺乏，認爲欲發展中國工業應求助於外國。他說：「歐美二洲之工業發達，早於中國百年，今欲於甚短時期內追及之，須用其資本，用其機器」若外國資本不可得，至少亦須用其專家發明家，以爲吾國製造機器。無論如何，必須用機器以輔助中國巨大之人工，以發達中國無限之富源也。」（「實業計劃」第五計劃）又說：「吾國既有天然之富源，無量之工人，極大之市場，倘能藉此機會，而利用歐美戰後之機器與人才，則數年之後，吾國實業之發達，亦能並駕歐美矣。」（「中國實業常如何發展」一文）然此非我的創舉，外國亦復如是。國父說：「俄國之製造廠、兵工廠，皆用英美人爲之，日本意大利兩國，其關於製造事業，亦多由英人主持。」（「歡迎外資與門戶開放」講詞）惟主權要操之於我，方不致受外人的宰制。國父說：「鄙人主張用外人辦理工商事業，及訂立一定之期限，屆期由我收贖，並非利權永遠落於他人之手也。」（全）又說：「倘知此爲興國之要圖，爲救亡之急務，而能萬衆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練技術，爲我籌劃，爲我組織，爲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立於國中，我實業之人才，亦同時並起，十年之後，則外資可以陸續償還，人才可以陸續成就，則我可以獨立經營矣。」（「孫文學說」第七章）可是欲發展工業，必須同時發展礦業，如煤鐵等，因爲煤鐵同爲近代工業的兩大原料，沒有鋼鐵，則陸海空兵器，無從製造，沒有煤炭，則一切軍需

工廠的機器亦無從發動。至於石油的開採亦至必要，倘若缺乏石油，則在工業上所生產的兵器如飛機、坦克、兵艦等，均無從活動，變成死物，所以 國父在「實業計劃」上，亦計劃大規模發展石油鑛業。雖說「實業計劃」為平時工業建設的計劃，但平時工業，為戰時工業的基礎，亦即戰時工業的準備。平時工業尤以重工業沒有發達，一遇戰時的動員就要捉襟見肘，無從適應戰爭的需求。現在歐美各國的戰爭工業大半寄托於和平工業之中，因為和平工業可以改變為戰爭工業，例如商船廠可以改製兵艦，汽車廠可以改造飛機發動機，火車廠可以改造大砲，普通機器廠可以改造步槍機關槍，造紙廠可以改造拋射藥，顏料廠可以改造炸藥，造幣廠膠片廠可以改造槍砲彈壳等。同樣戰爭工業亦可以改變為和平工業，國父說：「造巨砲之機器廠，可以改製蒸汽機，以治中國之道路。製裝甲車自動車之廠，可製貨車以輸送中國各地之生貨，凡諸戰爭機器一一可變成和平器具。」（「實業計劃緒言」）可見 國父提倡發展中國工業的用意。

國父說：「軍器一門，我們從前所用是弓箭刀槍，試問現代戰爭，能用不能用？試問現代戰爭，不用外國槍砲，能勝不能？」（「同胞要同心協力做建設事業」講詞）又說：「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槍，不能够和外國的洋槍大砲相抵抗。」（「民權主義」第五講）又說：「德意志聯邦，成立之初，本來是農業國，後來變成工業國，因為工業發達，所以陸海軍也隨之強盛。」（「民族主義」第四講）這是說戰爭與兵器的關係，兵器與工業的關係。今日臺灣的工業力量還是很薄弱的，如為配合將來反攻大陸的要求，必須遵照 國父的遺訓，動員工業，發展工業，並歡迎外商投資。一面大量生產武器，另一面爭取更多的「軍援」。

三、糧食

方面

糧食影響於戰爭的重大，由來已然。唐將張巡孤守睢陽，屢戰屢勝、終因「羅掘俱窮」，為敵所破。在此以前，像歷史家陳壽所撰諸葛亮傳說：「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糧盡而還。……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得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在此以前，孫子主張：「因糧於敵」，及強調：「軍無糧食則亡」。又如拿破崙破崙的天才，當作戰的時候，遇有提到糧食問題者，必痛斥以「不要談糧食」，因犯有這種疏忽，終不免慘敗於莫斯科的飢寒交迫之中。以上係就軍糧而說，至於民糧亦有同樣的重要，德國在第一次歐戰中，因糧食的恐慌，弄得人民個個吃不飽，暴動遍於全國，便促成德國崩壞了。有人說：「糧食是戰爭的生命。」又有人說：「糧食是決定戰爭支持力的因素，又是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實非虛語。

中國號稱地大物博，向以農立國，對於糧食本可自給自足。可是因為地利未盡，及運輸不便，而人口却一天一天的增加，故年豐而太平時，尚可自給，一遇歲歉而戰亂時，就不免發生恐慌。考我國糧食仰給外國由來已久，如唐書陳懋仁的「泉南筆記」，就有洋米輸入的記載。近百年來，因天災人禍的交煎，尤以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我糧食愈不能自給，每年仰給於洋米為數甚鉅（如民十九年達二千萬石左右）。國父早見及此，於上李鴻章書中，就提出「地盡其利」的「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為「富強大經，治國大本。」於民生主義裡又強調：「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又說：「吃飯問題就是頂重要的民生問題，如果吃飯問題不能解決，民生主義便沒法解決。」可見他對糧食問題的注意。又在全主義裏說明糧食與戰爭的關係，舉第一次歐戰中德國為例證說：「未經歐戰以前，各國政治家總沒有注意到吃飯問題，在這十年之中，我們留心歐戰的人，研究到德國為甚麼失敗呢？正當歐戰劇烈的時候，德國都是打勝仗，凡是兩軍交鋒，無論是陸軍的部隊、砲隊和騎兵隊，海裏的

驅逐艦、潛水艇和一切戰鬥艦，空中的飛機、飛艇，都是德國戰勝，自始至終，德國都沒有打過敗仗。但是歐戰結果，德國終歸於大敗，這是甚麼原因呢？德國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吃飯問題。因為德國的海口，都被聯軍封鎖，國內糧食，逐漸缺乏，全國人民和士兵都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終歸失敗，可見吃飯問題，是關係國家之生死存亡的。……德國的糧食，在平時已經是不夠，當歐戰時候，許多農民都去當兵士，生產減少，糧食更是不夠。所以大戰四年，歸到結果，便是失敗。由此可見全國的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第三講）

可是欲求中國糧食的自給自足，必須從增加生產方面着手，國父在民生主義裡指示我們七個增加生產的方法，即機器、肥料、換種、除害、製造、運送、防災等問題，茲分別摘要說明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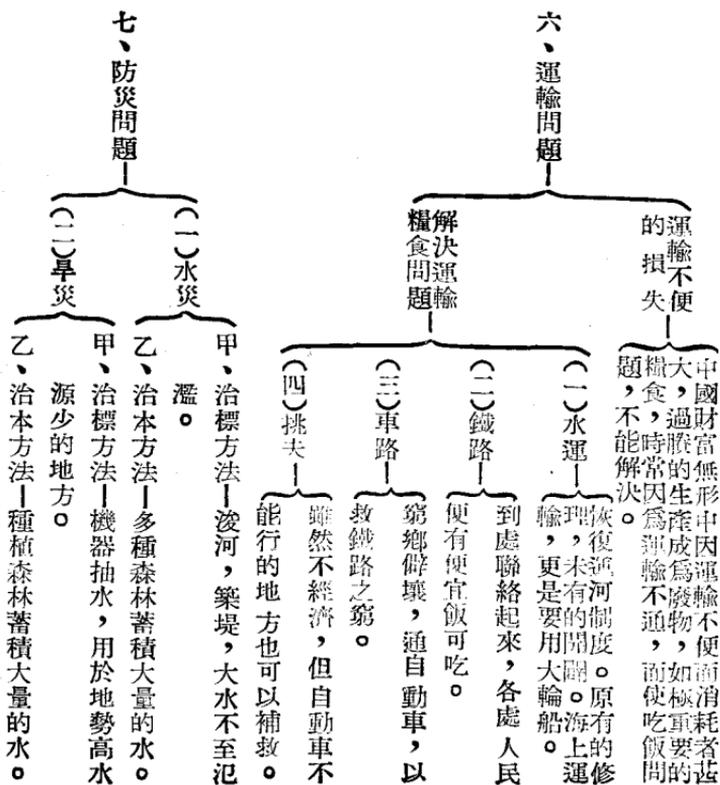
一、機器問題——用機器耕田，生產可加一倍，費用可輕十倍或百倍。用機器抽水來灌溉田地，非常便利。

二、肥料問題——用化學方法來製造肥料，用電來造人工硝，用水力來造便宜的電，農業生產，自然可以增加。

三、換種問題——用交換種子方法，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產力可以增加。

四、除害問題——
（一）植物的害——用科學方法除去野草和利用稅草。
（二）動物的害——用國家力量，研究除害蟲方法。

五、製造問題——
中國製造方法——
（一）曬乾。
（二）醃鹹。
外國製造方法——將食物煮熟，或烘熟，製為罐頭。



其次說到糧食消費的管理：國父於手訂「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第二事的「立機關」中，又主張

設置「糧食管理局」，實行糧食公賣，其所訂辦法是：「糧食一類，當有地方公局買賣，對於人民需要之食物，永定最廉之價，使自耕自食之外，餘人得按口購糧，不准轉賣圖利，地方餘糧則由分局轉運，售賣於外。」於此足證明國父對糧食消費，是主張採取管理政策的，在戰時尤為必要。這樣，自可杜絕地主奸商的囤積居奇，而糧價得以安定。現代世界各國在戰時對於糧食的消費都是採取管理政策，第一次歐戰中各參戰國如此，二次歐戰中各參戰國也是如此。國父關於第一次歐戰德國糧食消費管理的效果，曾有如下的說明：「近代國家之行政民生政策者，以德國之組織為最進步，而此次歐戰一開，則德國海面被英封禁，糧食時虞竭乏，社會忽起恐慌，人民備受種種之痛苦。至兩年以後，乃始任巴特基氏為全國糧食總監，巴氏乃用科學之法，以經理糧食，而竭乏之事，始得無虞，恐慌之事漸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漸減，由德國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則早已絕糧而降服矣。」（「孫文學說」第一章）今日我政府在臺灣已實行糧食管理政策，年產糧食一百五十四萬噸，已超過日據時代年產一百四十萬噸之最高紀錄，故糧價相當穩定，倘能再加改善，糧價更可持平，可見國父政策的正確。

第一次歐戰時，英人特奈爾氏上書英國首相路易喬治說：「我們根本的錯誤，就是以為糧食不是戰爭的軍器，而農村不是兵工廠。」真的戰時生產糧食的「兵工廠」與製造槍炮的兵工廠有着同等重要。所以我們今日在臺灣，由於糧食的充裕，軍民吃飯問題的解決，我們不要忘記終歲勤勞的農民，農民在後方流汗的貢獻，其功并不下於前方流血的士兵。不過為使農民高興去耕田，提高他們生產的興趣，還得實行國父這個偉大的遺教：「中國的糧食生產既然是靠農民，中國的農民又是很辛苦勤勞，所以中國要增加糧食的生產，便要在法律政治上制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中國的人口農民是佔大多數，至少八九成。但是他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夠自養，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增加糧食生產，便要規定法律，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讓農民

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我們要怎麼樣能够保障農民的權利，要怎麼樣令農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關於平均地權的問題。前幾天我們國民黨在這個高師學校，開了一個農民聯歡大會，做農民的運動，不過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起點。至於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民生主義」第三講）現我政府在臺灣已根據國父這個遺教，實行「三七五減租」，以保障農民利益，並使多得收成。至於「耕者有其田」，亦正作初步的實施，例如年來公地由放租到放領，又採取限田政策，即將實施「扶植自耕農條例」，其顧及廣大農民的利益如此，自可爭取他們來支持反共抗俄的戰爭。

此外，關於對敵經濟作戰，在遺教中，我發現他提過二個方式：一為經濟封鎖，一為經濟絕交（均見「三民主義」）。现就經濟封鎖稍加說明：經濟作戰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海軍封鎖，即直接封鎖敵國的海洋交通，以斷其對外貿易關係，但須有強大的海軍來執行。第一次歐戰開始後，英國即以海軍主力控置北海，封鎖了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使貨物不能經過荷蘭、丹麥與挪威輸入德國，舉凡是否戰時違禁品，只要是輸入德國的，或德國輸出的，都被沒收，使德國經濟起了極度恐慌。同時德國對協約國，尤其是英國，也施以經濟封鎖的報復，但因德國海軍力量不够，不能同英國一樣的作水上封鎖，只是實行深水封鎖，即以潛水艇封鎖英國，使英國亦受很大的痛苦。二次歐戰，英國對德又以強大的海軍做水洩不通般的封鎖德國，德國亦用潛水艇襲擊英輪，同時雙方又採用各種方法來破壞敵方的封鎖，例如德國利用西班牙的中立地位轉運由美洲輸入物資，英國實行武裝護航，以防禦潛艇的襲擊。說到我們反抗俄，以臺灣的地理環境，四面環海，又有海軍巡邏及第七艦隊協防，當然不怕匪俄封鎖，而我政府早已對匪俄實行經濟絕交，尙待恢復經濟封鎖。此刻三次大戰未爆發，美英諸國對匪俄已經實行戰略物資禁運。他日大戰爆發，匪俄因先天不足，經濟困竭，我們民主國家應予以徹底封鎖，促其早日崩壞。

六、戰爭與宣傳

宣傳戰或心理戰在現代總體戰中，其重要性並不下於武力戰，說到它的歷史，倘尙書所載「甘誓」，「湯誓」及「泰誓」，如果不是後人杜撰的話，那麼戰爭的使用文字宣傳，早已開始於數千年之前。漢高祖包圍項羽於垓下，令軍皆作楚歌，以打擊楚軍的鬪志，項羽聞之大驚失色，只得突圍而逃，演成烏江自刎的慘劇。諸葛孔明平南蠻，採用馬謖提供的攻心戰術，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使其心服不敢復反，因以造成北伐無後顧之憂。這都是歷史上宣傳戰的實例。此外，像唐駱賓王的討武曌檄，石達開的討清檄，洪秀全的誓師檄及佈告天下檄，都是千古名文，字字如電，句句如磁，迄今讀之，猶足令人興起！

在歐洲方面，關於宣傳戰的歷史，據彪黑氏（Buchen）說：「自有印刷術發明以來，各國爲取得輿論對本國的有利，用印刷的戰爭，是和武力戰爭並行着。」腓特烈大王於亞勒西亞之戰，是先發宣言，後開戰。拿破崙對於宣傳戰更爲注意，曾說過：「一個新聞社的力量，勝於一個師團的兵力。」

自由戰爭，同盟國在戰地設有印刷所，發行戰地新聞。

但宣傳戰成爲有組織的實體而起，却是在第一次歐戰期間的事情。在那次大戰中，協約國與同盟國互相報復以宣傳戰，尤以協約國方面爲大規模，不斷地針對着德國的弱點作巧妙而猛烈的進攻，因而促成德國的兵變與革命，德國只得投降了。二次世界大戰，雙方均展開大規模的宣傳戰，當時盟軍在這一方面的成功，曾導引出艾森豪威爾元帥說過這樣一句話：「毫無疑問，心理作戰業已證明了它有權利在我們軍事兵器中，佔有一個崇高的地位。」戰後，蘇俄大獨裁者史達林爲加緊完成征服世界計

劃，便以宣傳為唯一武器，據專家的估計，每年所用的宣傳費達十億美元，分佈於各國的宣傳員達六七百萬人（所有全球共產黨員均為當然宣傳員）。我們在大陸上的失敗，實先敗於其所指揮下匪幫的宣傳。美國近來對於宣傳戰（通常用「心理戰」一詞）亦已急起直追，設立「心理作戰戰略局」，於遠東及北太平洋聯軍總部則設立「心理作戰處」，在韓國第八軍團亦設立了一個和東京總部相似的心理作戰處，積極對匪展開宣傳攻勢，除使用砲彈射發傳單及飛機散發宣傳品外，尚使用有兩種宣傳新武器——喊話坦克、喊話飛機。前者車上裝有擴聲器，駛近火線，喊話能使二哩外清晰聽到，後者係於夜間懶懶地飛繞於匪軍陣地的上空，由女宣傳員就擴聲器——發出的聲音掩過引擎的聲音，向地而面的匪軍士兵與官長作一種具有魅力的講話，指出他們的痛苦，勸導他們向聯軍投降。其結果，依於戰俘審訊的顯示，自動投降的戰俘，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受心理作戰的影響，而在俘獲戰俘中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宣傳在古今戰爭上的地位及其效果已約略如上述。國父致力於現代中國革命運動，自不會忽略了這個最有力量的作戰方式。故他一經決定「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便「以學堂為鼓吹之地」（「自傳」），此後更發揮集體的力量以擴大宣傳。國父曾就當時宣傳戰的經過撰文說：「余於乙未舉事廣州，不幸而敗，後數年，始命陳少白創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後，革命宣傳驟盛。東京則有戰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為書』，尤為一時傳誦。同時國內外出版物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不變。及同盟會成立，命胡漢民、汪精衛、陳天華等，撰述民報，章太炎既出獄，復延入焉。民報成立，一方為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主義，一方則力闢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由是各處支部，以同一目的，發行雜誌日報書籍，且以小冊子秘密輸送於內地以傳播思想，學校之內，市肆之間，爭相傳寫，清廷雖有嚴禁，末如之何。」（「中國

革命史」)至於當時宣傳的方針，不外是同盟會宣言上所揭示的「一、驅除韃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及民報上所標明的六大主義：「一、顛覆現今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維持世界真正和平，四、土地國有，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六、要求世界列強贊成中國之革命事業。」洎乎 國父發表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諸著作後，本黨的宣傳武器始備。

國父是中國現代革命「軍事奮鬥」的領導者，也是「宣傳奮鬥」的領導者，他具有宣傳演講的天才，出口成章，不假預備，尤能把握對方心理，連講二、三小時毫無倦容，至於議論精闢，尤其餘事。

國父致力「宣傳奮鬥」達四十年，其所得經驗與教訓至多，又遭逢第一次歐戰及俄國革命的成功，(國父說：「本黨此次改組，乃以俄國為模範，企圖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黨員協同軍隊來奮鬥。……吾人由反對俄國各報紙所得之事實，則英兵由北冰洋上陸時，俄兵不加抵抗，自行引退，留下種種印刷品，問其何故來打俄國？列強既與德國和好，何以今日再有征俄之舉？各國兵士，當時以為往俄與德戰，不知為與民戰也。以此質諸上官，上官無詞以對，兵士遂即引退，或激成兵變。——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講詞)更使他對宣傳戰有深刻的認識。他在宣傳戰上留給我們不少教言，正是我們今日反共抗俄宣傳戰的南針。

一、宣傳戰的效力

國父認為宣傳戰在戰爭上與軍事戰並重，有時比軍事戰尤為重要。國父說：「從前把鎗砲的力量比宣傳的力量看得太重，少向宣傳那一方面去奮鬥……講起效力來，宣傳事業同軍人事業，實在是一樣的大，和一樣的重要。向民衆宣傳，就是同向敵人的猛烈進攻一樣。」(「言語文字的奮鬥」講詞)又說：「宣傳的效力，大抵比軍隊還大。本人說：『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宣傳便是攻心。……宣傳這種武器比軍隊還強。」(「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講詞)又說：「宣傳奮鬥的效力大，軍事奮鬥的效力小。」再說：「革命成功極

好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用一成。」（「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講詞）

再又說：「國內外為爭開國民會議，打的電報有幾千幾萬張，這種和平的爭法，好過用武力的幾千兵幾萬兵。」（「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講詞）因其重要，便有驚人的效果。國父說：「宣傳這種武器折服一人便算一人，傳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軍隊奪了城池，取了土地，還是可被人推翻的，還是靠不住的。」（「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講詞）又舉辛亥革命為例說：「今日蒙報界諸君歡迎，甚幸！此次中國革命（指辛亥革命——浴日註）數月成功，皆報界言論鼓吹之力。」（「報界應鼓吹借款修築鐵路」講詞）又說：「就武昌起義說，表面上雖然是軍事奮鬥的成功，但當時在武昌的軍隊，是清朝訓練的不是本黨訓練的。因為沒有起義之先，他們受過了我們的宣傳，明白了我們的主義，才為主義去革命。所以這種成功，完全是由於宣傳奮鬥的成功。」（「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講詞）再舉討伐陳炯明為例說：「數日前，有北京貴同業某君見訪，於致賀廣州勝利之後，慨然謂筆墨之力，終不如槍砲之靈。實則依鄙人所見，筆墨之力，確極偉大。此次廣東之事，看來似是槍砲之功，實則筆墨之效，大不可沒。縷縷述之，事殊神妙。陳炯明之在廣州，干涉言論，無所不至，廣州報紙在暴力之下，固不敢有所主張，即香港新聞紙，亦以許多關碍，不克自由發揮。然而香港有畫家數人，痛心於陳氏之作惡，相約以其擅長之藝術，描摹陳氏之罪惡，繪影繪聲，栩栩欲活，市民爭相購買，或用作廣告，或用代裝飾，有聚而圍觀者，有相與品題者，數月以來，已成香港之流行品，而對陳之觀念，深入人心。雖陳家將到香港者，鑑於街談巷議及家懸戶備之情形，亦悚然於人心之既去。且以滇軍發難，一戰而下廣州，迨陳炯明退往惠州，所部猶不下一萬餘眾，乃通電獨立，或宣佈脫離關係者，即其平日認為腹心手足之士卒，至欲負隅反攻而不能，香港畫報平日之浸潤感化，著深有力焉。吾人今日固不能抹殺彼討陳諸將士之功，然筆墨之權威，要亦不可否認。今茲粵中之事，二十日而解決，前十日可謂係

槍砲之勳勞，後十日實筆墨奮闢之效果也。」（「發揮筆墨之權威以與軍閥搏戰」講詞）過去北伐的勝利，實由當時我們的宣傳壓倒北洋軍閥官僚的宣傳，此次大陸的失敗，則由於共匪的宣傳壓倒我們的宣傳，痛定思痛，亟應重溫 國父的遺教，思所以發揚於今日。

二、宣傳 戰的對象

宣傳戰實施的對象，可以分爲對內對外兩方面，在對內方面，如對人民，則在感化以本黨的主義，國父說：「如何以黨員打勝仗，就是凡屬黨員，皆負一種責任，人人皆爲黨而奮鬥，人人皆爲黨的主義而宣傳。一個黨員努力爲吾黨主義宣傳，能感化一千幾百人，此一兩千幾百人，亦努力吾黨主義宣傳，再能感化數十萬人，或數百萬人，如此推去，吾黨主義，自能普遍於全國人民。此種奮鬥，可謂之以主義征服，以主義征服，是人民心悅誠服，所謂『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國。』就是這個道理。」（「國民黨過去失敗之原因與今後努力之途徑」講詞）今日則須配合反共抗俄的宣傳。對軍人則在使其變爲有主義鬥士，國父說：「廣東以後把四境肅清了，或者要休息兩三個月，在這兩三月中，他們必須做宣傳的功夫，讓這幾十萬兵，都明白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個個明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樣，他們的能力，必定同七十二烈士一樣，出去打仗，便有勝無敗，便可征服吳佩孚。」（「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講詞）在今日亦須配合反共抗俄的宣傳。在對外方面，主要的是對敵方，尤其敵方的軍隊，于此，國父有一個最英明的提示：「吾人當努力宣傳於一切軍隊中，使了然其自身之地位，變反動的兵力爲革命的兵力。」（「撫輯平民士兵案」）國父又舉例說：「武昌起義，當時能够達目的的道理，完全是由於滿清軍隊的自動，一經發起，便馬到成功，那些清兵有自動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於我們宣傳的效果。他們受了宣傳，都贊成我們的主義，所以便不來和我們反抗。像這樣用敵人的軍隊，來做我們的事業，所收的效果，該是何等的大呢！」（「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講詞）這

也是今日所謂「化敵國的軍隊為敵國的敵人」的新戰法，在我未反攻大陸前，或反攻大陸時均應遵照國父這個偉大的昭示，來加強對匪的宣傳作戰，宣傳作戰便是攻心。國父說：「能攻敵人之心，就是沒有槍沒有彈，也可以打勝仗，也可以統一中國。」（「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所以，我們能够攻下匪軍的心，把匪軍取爭過來——不說是全部，僅有一半，則打倒朱毛政權就很容易了。此次韓戰中，所用的喊話飛機，可以說是對匪宣傳作戰的一種最有效的宣傳武器，我們應從速計劃運用。

三、宣傳戰的種

此外，宣傳戰在實施上尚有許多問題須同時解決，始方可收獲豫期的成果。第一、要有宣傳作戰計劃。國父說：「諸君去年到今，筆墨上用力不少，然或不免於浪費，蓋作戰須有計劃，攻擊必有目標。」第二要有宣傳方法，宣傳材料，明瞭敵情，臨機應變及能够發生感化的作用。國父說：「我黨均須每日學習宣傳方法，時時訓練，訓練純熟，然後才能戰勝一切。」（「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又說：「如軍隊打仗然，打過後須補充子彈，今黨員出外宣傳，亦當如之。每星期到此補充材料，則宣傳事業自易着手。」（同）又說：「諸君所用的宣傳方法，就對人而論，應該由近及遠，先對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說明，再對親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說明，就措詞而論，所說的話，應該親切有味，要選擇人人所知道的材料。」（「女子須明白三民主義」講詞）又說：「革命主義，既知人生為最終之目的，故必須週知敵人之情形尤須明瞭士農工商之狀況。對待此類人們，非可殺之也，實須生之。如何方可以生之。則須知其痛苦所在，提出方法，痛陳主義，乃能克敵致果。此乃無敵之雄師，無人能抗之者，在乎我黨能善用之否耳。如遇農則說之，解脫困苦的方法，則農必悅服。遇工遇商遇士各種人們亦然。」（「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又說：「感化就是宣傳，大家擔負這種任務，所用的方法，必須臨機應變。好像現在因為關稅問題，外國人用兵士來示威，我們要和他們反抗，便要應用民族主義。」（「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

事」)又說：我們宣傳主義，不特是要人知，並且要感化民衆，要他們心悅誠服。我們若果能感化民衆，民衆能够心悅誠服，那才算是我們宣傳的結果，那才算是達到我們宣傳的目的。若是徒然知，而毫不被感化，便是毫無結果，沒有結果，便不是我們的目的。要感化人，那才算是宣傳的目的。」(「言語文字的奮鬪」)第三、要有宣傳人才，人才決定一切，宣傳戰自亦不能例外。國父說：「到了知道怎樣去宣傳，那便是宣傳人才，要有很多的宣傳人才，非要辦一個宣傳學校，慢慢的養成不可。」(「黨員不可存心做官」講詞)而負責宣傳戰的人員，則要有誠意和恒心。國父說：「學問和口才本來是宣傳的方法，如果要能够感動人，究竟以什麼爲最重要呢？我們要感化人最要緊的，就是誠。古人說：『至誠感神』，有了至誠，就是學問少，口才拙，也能感動人。所以『至誠』有最大的力量。若是在宣傳的時候沒有『至誠』的心思，便不能感化民衆，有『至誠』的心思，無論什麼人都能够感動。」(「實語文字的奮鬪」)今日歐美宣傳家都一致承認「真實」爲宣傳的要則，亦一致承認「真實常能獲勝」，而反對說謊與虛偽，因爲這樣常會被人家拆穿的。國父所說的「至誠」，比「真實」則更爲根本，因爲真實是至誠的表現，唯有至誠纔能取信人家，並感動人家。又說：「諸君擔負宣傳的任務，應該有恆心，不可虎頭蛇尾，今日熱心奮鬪，明日便心灰意冷。因爲要人心悅誠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動，能够收效果的，必要把我們的主義，潛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效果。我們要能够收到這種效果，便非請諸君對於宣傳，做繼續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繼續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恒心。因爲革命是有目的，要達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廢止。」(「國民黨奮鬪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這是說幹宣傳的人要有持久的精神，也是說宣傳戰是一種持久戰，不是一種速決戰，它的功效往往不像以槍擊人那麼顯著和快速，而是要從潛移默化中去說服人家，戰勝人家。所以宣傳戰要先於武力戰而開始，武力戰一開始更要作適切的配合。要之，用軍事專家來治軍，同樣

亦要找宣傳專家來辦理宣傳，依於專家們的設計和指揮常可決勝於千里之外。

在反共抗俄中的宣傳戰是要急起直追了，國父說：「我們從前手無寸鐵，何以會革命成功呢？就是由於宣傳力。革命以後，大家有了軍隊，有了政權，以為專在實行，不必注意宣傳。豈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傳一道，可惜大家都忘記了，現在我們要反省纔好。」前面說過，此次大陸的失敗，由於共匪的宣傳壓倒我們的宣傳，今日我們更要加倍反省纔好。須知他口反攻大陸，專靠「軍事的奮鬥」是不够的，（國父說：「吾黨之奮鬥，多是倚靠兵力之奮鬥，故勝敗無常。……若專靠兵力，雖百戰百勝，亦不得謂之成功。」——國民黨過去失敗之原因與今後努力之途徑講詞）還要注意「宣傳的奮鬥」，不論在反攻前，反攻時，反攻後，「宣傳的奮鬥」都是很重要的。今日大陸上的老百姓個個都厭共了，個個都在祈禱我們早日反攻大陸，宛若大旱之望雲霓。匪軍由於韓戰的慘敗，亦已厭戰，時起譁變，這正是我們宣傳的良機，我們不要辜負這個良機，我們要有一個强有力的宣傳戰總機構（人才多，經費多），努力從「宣傳奮鬥」上來爭取匪區的同胞，瓦解匪方的軍隊，促成匪偽政權早日崩潰！

七、建軍要圖

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來看，一個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恒決於武力的強弱大小。故建軍之事，便成爲古今中外每一民族國家的大事。尤以丁茲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時代，吾國擁有廣大的土地，衆多的人口，豐富的資源，如果沒有強大的武力以爲自衛，難免野心國家的覬覦。自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以迄八國聯軍之戰，每戰皆敗，這是什麼原因呢？就是由於我武力的孱弱，亦即清廷建軍的失敗。倘若當時建軍成功的話，則陸海軍均具強大的戰鬥力，那裡會打敗仗，不特不會打敗仗，恐怕連列強也不敢輕啓戰端。故 國父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後，便常常以建軍爲倡導，他說：「中國向以積弱稱，由於兵力不強。……現在共和粗建，須以兵力爲保障。昔南非洲有某某共和國，以無兵力，卒被人吞併，可見共和國家無兵力亦不足以救亡。」（「共和須以兵力爲保障」講詞）又說：「我中國未革命以前，列強環伺，欺凌侵併，無非以我國武力不足。今日民國正革命草創，欲中國成爲強固之民國，非有精強陸軍不可。故民國前途依賴我軍人之力正多。今日要務在於擴張軍備，以完全鞏固之國，然後可與世界列強並駕齊驅。」（「軍人之本分」講詞）又強調兵力關係民族國家的興亡說：「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爲力湊合而成。人爲的力量，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爲的力最大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包括兵力——浴日註），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民族主義」第一講）至於欲完成革命大業，亦須擁有武力，創建好的革命軍，國父說：「國事未定，則吾人須有不可侮之實力，質言之，即是武力，如何創有組織或駕馭原有之師旅，皆須以敢死得力之同志爲本位，然後堅固不搖，戰勝一切。」（「致鄧澤如書」）又說：「因爲沒有革命軍的奮

圖，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甚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種好骨幹成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如果沒有好的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要失敗。」（「革命軍的基礎在深高的學問」講詞）但爲完成革命而建軍，其軍須與民衆結合，成爲人民的武力。國父說：「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北上宣言」）即第一項是說軍愛民，民敬軍，軍民合作，打成一片。第二項是說軍隊成爲人民的武力，非私人的武力，爲保障人民的生命與利益而作戰，自可取得人民的愛護與支持，那有何戰不勝！今日我們反共抗俄，正待積極建軍，擴張軍備，國父這個偉大的遺教，我們應出研究而實踐。

綜合 國父建軍的意見和主張，可分爲下述各點：

一、整理

軍政

在建軍上，整理軍政實爲要圖，國父於民二目擊軍政不修，其所釐定的「國民黨政見宣言」極力主張整理軍政說：「今日處於武裝和平世界，對外方面，軍備亟須擴張，然擴張軍備，當自整理軍備始。蓋擴張軍備之舉，須待諸三四年後，而今日入手方法，則在整理軍政，軍政整理，而後始有擴張可言也。」關於整理軍政的方法

有五：

一曰劃分軍區：於行政區域之外，另劃分全國爲數大軍區，獨立處理軍事，使軍民分治，易於實行。

二曰統一軍制：今各省軍隊之編制，亦至不一，紛歧錯亂，非軍事所宜。故當使全國之軍隊，按定之編制，俾軍事歸於統一。

一曰裁汰冗兵；軍備須應擴張，而冗兵則不可不裁。蓋兵備貴精，其操練不動，老弱無用者，理宜一律裁盡也。冗兵既裁，然後於其強壯者訓練純熟，使之成軍，始可以為擴張基礎。

一曰興軍事教育：欲擴張軍備，則當求良好之將校。吾國今日之將校人才，異常缺乏，故此數年中，亟宜振興軍事教育，以養成一般將校人才。

一曰擴充兵工廠：吾國今日軍備上最大缺點，則為軍械不足，兵工廠祇有數所，而製出品為數亦微，今日即欲擴張軍備，然無器械，與徒手無異。故宜極力擴充兵工廠，先使器械豐富。

這五大主張，因當時本黨非執政的政黨，未能付諸實施，到了今日仍具有重大的意義。今日我政府正準備反攻大陸，除「劃分軍區」外，而關於「統一軍制」，「裁汰冗兵」，「興軍事教育」，「擴充兵工廠」諸端，均經分別切實施行。就中如「裁汰冗兵」，即在汰弱留強，增進新生力量，本年輕將軍中老弱士兵辦理除役，計被除役之老弱官兵，共有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五名（官佔少數），分別予以轉業，或安插於機關當公役，或安插於農場墾區耕作，使人人皆有安定的生活。這是我政府整軍的成績，也是本黨過去政策實現於今日。關於「擴充兵工廠」，因我欲反攻大陸，則所需的兵器彈藥是大量的，戰場消耗也是大量的，光靠外援，有時而窮，仍須自力更生，以全力發展軍需工業，擴充兵工廠，提高生產能力，重兵器固難一時自給自足，輕兵器亦應做到自給自足。

二、練兵

要點

整軍之外，練兵亦為建軍要務。兵法說：「兵在精，不在多。」精兵全靠教練，教練得好不好，繫乎戰爭的勝敗至鉅。尤以今日武器的進步，技術的專門，戰術的革新，及政治思想的複雜，人格道德的低落，更使我們非重視練兵問題不可。國父說：「練兵一事，為今日根本之圖。」又說過：「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均見「致蔣中正函。」）于此，我們要注意的，現代練兵的標準，每個士兵都要訓練他們有充

當班長，以至充當排長的能力，他們有了較高一級的能力，才會做出更好的動作。並且要訓練他們有各個獨立作戰的精神，因為現代武器的進步，在場戰上不僅連長不能照顧全連的士兵，就是一個連長也照顧不了一排士兵，又要訓練他們都具有不怕死的精神，以免臨陣縮，望風而逃。故須假以相當長久的時間。「不教民而戰」固不可，即教不精而戰亦不可。國父說過：「當兵的人，必要受過了許久的訓練，然後才能應戰。到了臨陣的時候，還有計及生死利害，違反他職守的。近來文明國的士兵，雖有死守職務，不計利害的，但是他們的天性純厚，還是不及蜜蜂。至於中國的士兵，更是比不上。俗話常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要他們成好士兵，必須經過許久的訓練，才勉強有用，如果說忠心一層，和蜜蜂比較，更是差得遠。蜜蜂賦有天生合群的性質，一群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訓練，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賦有多少天生合群的性質，但須加訓練，然後合群的性質才有進步，進步到極點，還是不及蜜蜂。蜜蜂實行天賦的特性，勇往直前，毫無顧慮，人每因後天的訓練，沒有嫻熟，容易喪失先天的特性。」（「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講詞）這是就精神訓練方面來說的，精神的訓練，在養成其忠勇合群的性格，以一當十的鬪志，不成功即成仁的精神，即如國父「軍人精神教育」所講的內容（詳見下章），自然非短期所能完成，須假以相當長久期間。今日我們準備反攻大陸，此一準備期間似非很短，故應切實利用來作充分完滿的訓練，一面提高其革命精神，一面嫻熟其戰鬥技能，使個個都變為精兵銳卒。

于此，與練兵有關的編制問題，國父提示了一個很寶貴的意見說：「今日開始練兵，猶不能行我所定編制，若謂練成之後，士兵官長都成了習慣，而後再行改制則更難矣。此為我所定之制，則欲練成之後，可以應我方寸之運用也。倘開練之時，已不能行我之制，則練成之後，我亦無心用之矣。今為應我所用之故，特托嘉蘭將軍將我衛士練至一營，以為他軍之模範。兄謂我編制規模太大，若果因此何不練至一

營或一團爲單位，以一營等一團，以一團等一族，有何不可？我想人家不欲行我之制者，則全爲故習所困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軍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爲何物，而以其師承一成爲不易也。因爲此故，我更要今日之軍人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斯將來乃能服從我之命令，聽從我指揮也。如果今日教學生則存一成見，教成之後，何能使之爲革命軍負革命之任務。試觀北洋之軍隊，訓練非不精，補充非不備，而作戰則遠不如敗殘之楊化昭、臧致平、以彼二人會與南方稍有革命行動之軍隊接觸，而無形中學得一二革命之戰術也。此間今日所練之軍隊，如果將來能聽我指揮，則我必導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此等任務，更非常兵法所有。倘今日開練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練成時，謂能聽我指揮，我決不信也。」（「致蔣中正函」）國父這個改革編制的主張，例如一個步兵師，共有兵數三八、九九二名，官數一、一六二員，（註）其人員之多，戰鬥力之強，實爲一種大單位的編制。今後國軍的編制，尤其今日準備反攻的部隊，固要充實其人員，尤要加強其火力，改善其裝備，務使一連一排有一連一排的戰鬥力，一團一營有一團一營的戰鬥力，方能達成任務。不過我們要知道：軍隊的編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進化的，即依於兵器的進步，戰術的革新和假想敵軍的編制而進化改變。

三、官兵

生活

在建軍上，關於官兵的生活問題應作合理的解決，方能鼓舞士氣，安定軍心。

國父於民十三向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提的輯撫平民士兵案，其中有一項說：「革命軍揭國民黨之旗幟，爲人民而戰，以從事於捍衛國家，克服民敵者，當受國家之殊遇。兵士於革命勝利之後，國家應給以適當之土地，使復歸於善良之農民。」又經及士兵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固然，這個政綱的範圍是很大的，但我們從這個政綱及上述的提案，可以看出國父

對於官兵的生活問題非常重視。而這個生活問題，是包括服役與除役退役後的生活問題。政綱中所說的「注意……經濟狀況」，係指服役時的生活題，如薪餉如何提高，衣食如何改善等。提案中所說的「給以適當之土地」是指除役退役後的生活問題。至於「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這是為增進其改善生活的技能的。今日我政府在臺灣已注意及此，也可以說正在根據 國父的遺教來實行，除最近已頒佈「戰士授田條例」，使一般戰士皆知戰後復員時，均有田地可耕，自己及家屬生活可得保證外，又推行「克難運動」，以增進軍中生產，且每月均有魚、肉、油、豆等物配給，眷屬亦有配給，軍中康樂設備亦比前充實。倘能再加改善，更可安定軍心，而鼓勵士氣。

四、兵工

政策

國父於民十一目擊軍閥各據一方，擁兵平作亂，認為欲謀中國的和平統一，必須先行裁兵，而安插被裁之兵的政策，便是化兵為工。他主張說：「軍興以來，兵額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來齊民間，為不法武力所驅使，非其本意，一旦淘汰，使之驟失所業，亦所未安。宜以次悉改為工兵，統一編制，一切如舊，收其武器，與其工具，每日工作，約六小時至八小時，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餉，較現時倍加，將弁月餉百元以上者加之，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則其工作所產之純利，以一半歸於國家，以一半歸於工兵，論人數均分，自無差等。如此則一轉移間，易戰事為工事，兵不失業，無挺而走險之慮，工事日繁，有生產發達之象。然後善收外資，投之實業，以起積年之疲弊，謀社會之繁榮，轉危為安，悉繫於諸。」（「工兵計劃宣言」，民十一發表於上海）「並於十二年初陸續發表『和平統一宣言』及『裁兵築路』，「欲救廣東宜從裁兵禁賭及改良吏治着手」，「和平統一化兵為工」等講詞，及「裁兵為統一和平之根本條件」談話，作積而廣泛之號召，雖然這個主張以當時軍閥的勾心鬭角，各懷鬼胎，未能實現。迄民十三於撫輯平民士兵案中又提議說：「本大會並認本黨總理所主張之兵工政策，及實業的建國方略，

爲適合於中國改造之政策，負努力宣傳及實行之責任。」亦未實現，直至今日始爲我政府推行於臺灣，不過由於時勢不同，今日所推行的兵工政策，不是由裁兵來化兵爲工，而是運用守臺的部隊於備戰的餘暇，來從事兵工建設。自推行以來，諸如水利工程，鐵路公路的修築，以及墾荒等，均收穫豐碩的成果。既節省了政府很多建設經費，安定了社會工價，增進了軍民感情，而官兵的副食費亦均得增加，尤以一般官兵受此建設上的訓練後，其所得經驗與技能足供反攻大陸後建設之需。

以上係就陸軍而言，因當時建軍以陸軍爲主，故在遺教中亦以關於這一方面的言論爲多。此外，關於空軍及裝甲部隊，國父亦曾作過初步的建設（詳見本書「緒言」章），倘若當時財政許可的話，他必作大規模的擴張。這是國父鑒於這兩種新兵種在第一次歐戰時的驚人戰果，尤以在未來國際戰爭上必佔最重要地位，國父對於海軍素有研究，所得印象亦至深，因爲護法之役靠海軍，他說：「護法事業，凡三波折，六年之秋，余率海軍艦隊，南去廣州，國會開非常會議，舉余爲大元帥。」（「中國革命史」）又說：「向來革命之成敗，視海軍之向背，此次文質率海軍主力艦隊南來，其餘未來之艦，亦不爲彼効命，我已操制海之權矣。」（「南下護法致鄧澤如函」）廣州蒙難，退入永豐艦，與陳炯明相持於白鵝潭達兩月之久，也是靠海軍。尤其他遊歷世界各國時，目擊列強之強在於海軍，民元已開始號召建設強大海軍說：「與船政以擴海軍，使民國海軍與列強齊驅並駕，在世界稱爲一等強國。」（「與船政以擴海軍」講詞）今日我們爲反共抗俄而建軍，仍應遵循着國父這條路線而邁進！

（註）國父革命軍步兵編制表：（其餘砲兵飛兵（代騎）工兵輜重車，機關槍，甲砲車未定）

六人	爲一伍	兵數	六	官	〇
六伍	爲一列	同	三六	同	一
三列	爲一連	同	一〇八	同	四
六連	爲一營	同	六四四	同	二一
六營	爲一團	同	三、八八八	(附二人)	二二九
三團	爲一旅	同	一一、六六四	同	三八八
三旅	爲一師	同	三八、九九二	同	一、一六二

此表人數定實，官數可酌量再加。

八、軍人精神

孫武子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拿破崙說：「戰爭勝利，四分之三依赖于精神要素，而依赖于物質之情況決定者，不過其四分之一。」
克勞塞維慈氏說：「精神力為軍事最重要因素之一，戰爭全部因素無不受精神力所貫注，而為其縱。」

哥爾茲將軍說：「殲滅敵人之戰鬥員，其價值較消滅敵之勇氣為小，失敗主義者若充斥於敵之全軍中，則勝利即在吾人之眼前矣。」

福煦元帥說：「我欲為勝者，必須保持戰勝敵軍之精神力，指揮官必須將此精神貫注於自己之軍隊，故指揮官戰者，乃粉粹敵之精神力，以至於最高度之謂也。」又說：「必勝之意志乃勝利之第一條件，兵卒應以此為第一要義，同時指揮官亦必須以最高之決心，貫注於每一個兵卒之精神中。」

普通的軍事家尚且如此重視精神力，何況 國父是革命的軍事家，中國現代革命的領導者。當民國十年取道廣西北伐，師次桂林時，為振作全軍的戰鬥意志，強化全軍的精神力量，於翌年一月集合當時所統率的滇、粵、贛各軍將校給予剴切詳明地演講：「軍人精神教育」，這一部演講詞，為 國父的寶貴遺教，在世界兵學上具有不朽的價值，另成一新體系，雖名軍人精神教育，實包括一般的哲學思想與倫理思想，不特可作為革命軍人的基本教科書，且可作為一般國民身心修養的座右銘。

一、精神 重於物 質

蔣百里先生說：「在軍事教育上本來有兩種方法：一種叫做『外打進』。一種叫做『裏向外』。『外打進』的方法，就是從外表儀態的整齊嚴肅，行動必須規規矩矩（孔子教顏淵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爲求仁之目的），以浸潤之，使心志和同，養成紀律，鑒於『裏向外』的方法，這是拿破崙所發明的，教育方法是啓發其

愛國心，自尊心，使人人樂於爲國犧牲，但外表則不甚講求，故帽子不妨歪戴，軍禮不必整齊，然而實際作戰，便能得到非常的成績。當法國在大革命時，人民不替自己對於槍會不會開放，但是一聽到『祖國危險了』的口號，成千成萬的人便自動的拿起槍桿上前線與敵人作戰。法國有一張圖畫，是紀念革命時代人民愛國的心理，其圖爲一家族，有絕美的太太，有極可愛的小孩，同男人正在一桌吃飯，忽然門口飛進一張紙條，紙上寫了『祖國危險了』幾個字，於是男人就放下飯碗奪門而出，踴躍赴戰場應敵。那時法國四面都是敵人，而且敵人的軍隊都經過長期的訓練，論武器亦較法國民軍優良得多。但是法國民軍作戰的精神，個個勇敢非凡，所以在拿破崙未出世之前，法國一個國家，已經可以抵抗全歐洲的敵人。」（註）考 國父研究拿翁兵術，最有心得，他的倡導軍人精神教育，也許受到「裏向外」的教育方法的影響。原來精神與物質是不可分的，是互相影響的，兩者比較，精神是活的，是可變的，物質（武器裝備）是死的，是不可變的。換言之，精神力是無窮的，不是用數字所得而計算，物質力量是有限的，却可以用數字正確的計算出來。而且創造物質是人的精神，使用操縱物質也是人的精神，故在戰爭上精神比物質爲重要，也就是說精神教育比物質教育爲重要。固然一國軍隊的精神力與物質力兩皆優越爲至善，但美國以物質條件最優越的國家，艾森豪威爾元帥尚且強調：「士氣是勝利的一個超越因素。」至於物質缺乏的國家，其軍隊更應注重精神，以補物質的不足，自不待說。國父致力國民革命，他一面統率劣勢裝備的軍隊，以與優勢裝備的敵人搏鬥，另一面又看到將來對外抗戰，因爲我國產業的

落後，勢必以劣勢裝備的軍隊，與優勢裝備的敵人作戰，乃特別注重於軍人精神教育的倡導，確是看穿戰爭決勝的機微。至於我們過去在大陸的失敗，乃先由於精神的崩壞，失敗主義的瀰漫，這是人人所共知共見的，更足證明國父理論的正確。國父這部遺教，洋洋萬餘言，分爲五課：第一課精神教育；第一節精神教育之要旨說：「欲身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爲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然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諸君之所以爲軍人，非爲有軍人資格乎？非爲會受軍人教育乎？否則執途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如何其可！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即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須與弗離，雖至迭次顛沛之間，守而勿失，夫然後可以爲軍人，可以言革命，可以卜成功，否則反是。」第二節精神之定義說：「人爲萬物之靈……凡非物質者，即爲精神。……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恒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淖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死物矣。」更在第三節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上，以武昌起義爲例，證明精神力爲戰勝之本說：

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既如前述。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槍枝務求一律，則曰子彈必須補充，此外種種武器，亦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自余觀之，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爲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試以武昌起義爲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以物質能力論，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爲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士兵之入黨者，

均爲查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砲兵、工兵兩營，留駐武漢，其中同志尙多，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以爲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死耳，置於死地而發生，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此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激、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激且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發兵濫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命中，殺敵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爲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以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者，爲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敵人，相持四五日，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殊若此，將謂以少勝衆乎？直乃精神勝物質耳！又如日俄戰爭，俄國出兵多於日本數倍，未戰之先，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不啻驅羊豕以犒虎吻，必無倖也。何以戰爭結果，卒至俄敗而日勝？此無他，俄之敗，敗於無精神，日之勝，勝在有精神而已。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而甘心俯首，惟命是聽者，是何耶？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馭之，此猶顯而易見之例也。依上述各例，則知此次北伐，亦惟恃有精神，卽能制勝。可勿問敵人子彈多少，我之子彈多少，但問我之精神如何。若無精神，子彈雖多，適以資敵，一旦臨戰，委而棄之，非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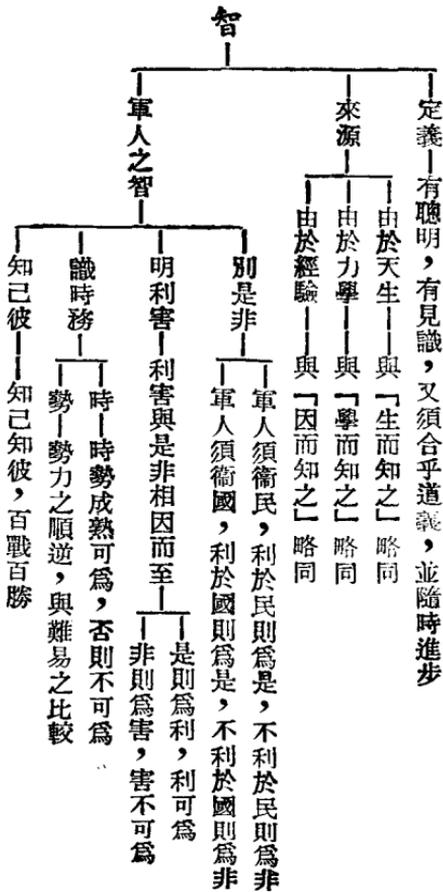
敵人運輸戰利品乎？故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而使失其戰鬥能力。兵法有言：「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攻心者，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猶其後也。去年粵軍回粵，既下惠州，桂軍聞風破膽，先自逃竄，我乃兵不血刃，長歌而入廣州城矣。此足見物質不可恃。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爲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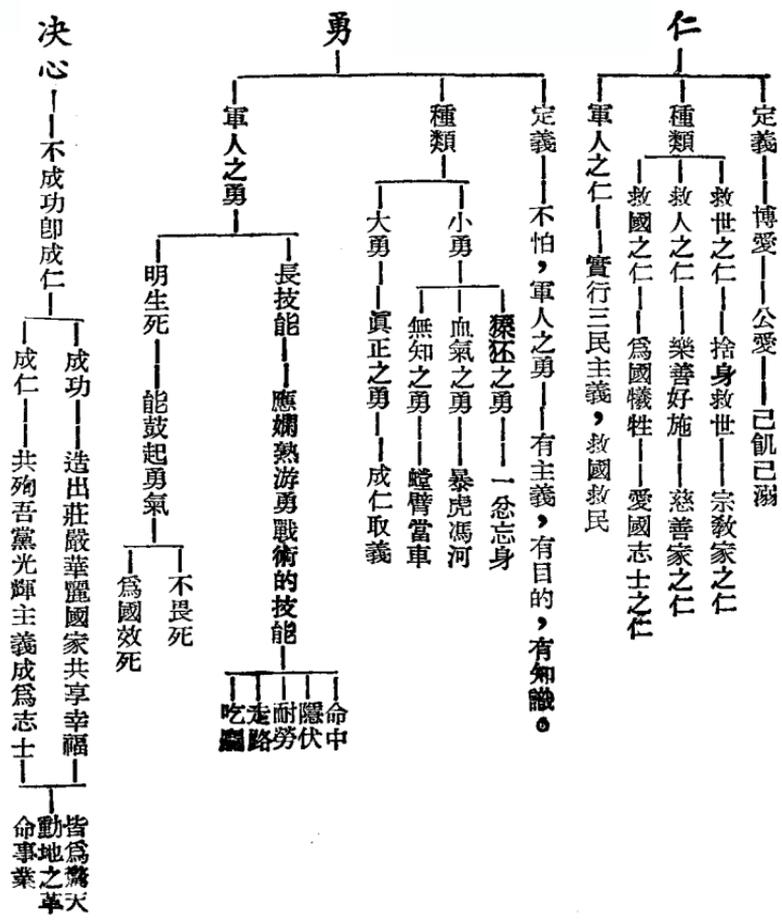
雖然精神重於物質，而在長期戰爭中，對於物質實有同時改善的必要。因爲物質不足，每易影響到精神的沮喪。所以我們於強調精神之外，還要力求物質的改善，不待說，這是維持精神，振作精神的最實際的方法。最近英國工十五位科學工作者合著「戰爭與科學」一書，會有下面的闡明，可供參考，該書說：「一般說來，有兩個條件是和士氣振作有關的：一個是士兵的物質條件，如食物、營房和軍器供給必須好，否則瀕職的事是難免的。第二是士兵自己必須明白他是爲什麼而戰，同時要他相信戰爭的方向是對的。前一個條件是基本的，短時期缺乏糧食休息或彈藥，雖可用心理上的因素來對消，但不能維持長久，飢餓疲乏的兵，絕不是以飽待飢的兵的對手，在這點上說來，士氣的問題變成了給養和組織的問題了。現在民氣也和士氣一樣重要，而食糧對於兩者都是基本的東西。」

二、軍人的精神

第四節軍人之精神說：「現時之中國，前途險象，較前尤甚。南北分立之局，擾攘數年，未能統一。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如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割據地盤，擁兵自衛，政治之壞，過於滿清，人民轉徙流離，如在水深火熱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維何？須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則須負革命之責任。革命之責任者，救國救民之責任也。……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當知軍人之職志，在防禦外患，在保衛國家，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之國家，不受外國之控制？以余觀之，固猶未完全獨立也。國會雖選

出本總統，而內亂尚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尙居多數。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而正式政府，又未經各國承認，當此危亡絕續之交，非先平內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無革命精神，則爲法屬之安南，終受勢力屈服。有革命精神，則爲英屬之愛爾蘭，終得崛起自治。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印國久受英國壓迫，近亦引起反動，其革命思想與前不同。」跟着又聳龍點睛地指出軍人精神的要素有三：——曰智，一曰仁，一曰勇及決心。即「欲使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但所謂決心者，須多數人決心，合群策群力而爲之，非少數人能集事。」方能剷除反革命勢力，改造中國爲「新世界」。不特說，這是全齊的骨髓。茲將第二課講「智」，第三課講「仁」，第四課講「勇」，第五課講「決心」的內容，摘要列表如下：





我們從以上的表解，已可明瞭智、仁、勇及決心的主要內容，現可進而研究智、仁、勇及決心的淵源問題。關於國父所說的智、仁、勇，有人說淵源於兵聖孫子，始計篇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也有人說淵源於哲人孔子，中庸載：「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孫子兵法為軍事哲學的書，中庸為政治哲學的書，如果說它純粹地淵源於孫子，却缺了「信」「嚴」兩項，說它直接地淵源於孔子，却又用在軍事上。其實國父對這兩部名著都很有研究的，故不如說他是攝取兩家的學說而立論的。此外國父又參照新兵學加上「決心」一項，而建立他軍人精神教育理論的新體系，且其內容又是全新的，不同於孫孔及其他兵書上的解釋，這是他的獨創——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獨創的。

智、仁、勇是中國的軍人魂，亦即中國軍人的武德，它以仁為中心，故可使智勇不致陷入歧途。所以缺乏仁之武德的軍人，決不是健全的軍人，如果他擁兵的話，必變為軍閥，戰爭的話，不是為爭權奪利，便是為侵略征服。這都是國父所極端反對的。所以我們中國軍人的武德，不是日本的武士道（軍人精神）所可比擬，因為日本的武士道偏重於勇智，丟了最重要的仁，過去日本軍閥只得走上侵略之路。拿破崙亦談智勇不談仁，他說：「為大將應具之種種理想的才能，極難具備於一人。實際上為大將最需要者，同時最能揚名者，即智勇雙全。若有勇而寡智，則往往不慎，而生意外。若有智而少勇，則意想之事，往往不能作。」所以他在歐洲極其量亦只盡其蹂躪的能事而已。舉世奉為兵學大師的克勞塞維慈氏，他對於智勇分析得最為詳明，讀者可看他的名著戰爭論。至於我譯的「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一書，其中有一段說：「軍事上的天才，即憑於智力、感情、勇氣及其他各種心力的合一，以從事軍事活動的卓越軍事指導者。世人慣將單純而勇敢的軍人稱為軍事上的天才，這是不對的，殊不知智力比勇氣尤為重要。雖是下級指揮官，苟欲成爲一個優秀的指揮官亦必須具有優秀的智力，其階級愈高，則所需要的智力亦愈大。」但他却不談「仁」，並且強調「戰爭為無限界的暴力行為」，徒造成德

國軍人的好戰成性和暴虐無道，這不能不說是克氏戰爭理論的一大缺陷。至於蕭米尼、威利遜、杜慈、福煦、魯登道夫等的著作亦常有同樣的缺陷。於此，可見國父兵學思想的不同凡響，及我國兵學的特色。本來仁的戰爭觀念，在我國古代有一種說法——「不殺人」，叫做仁，其實這僅是片面的，它的出發點，應為撥亂反正，濟弱扶傾。又如司馬法的仁本篇說：「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可也。」國父所謂仁，應為如此，所以他仁的戰爭觀念，決不僅僅是那片面「不殺人」之仁，也不是春秋時代宋襄公之仁——「不重傷，不擒二毛」，因為這是婦人之仁，是小仁，非大仁之仁，更非國父之所謂仁——救國救世之仁，實行三民主義之仁，站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立場上，縱是澈底殲滅敵人亦非不仁，這是我們應該澈底認識的。

總之 國父所講的智仁勇，是三位一體的，缺一不可，尤以仁為中心，殿之以決心，以為實行發揚智仁勇的原動力，益見完整而有力。就是說軍人如果缺乏決心，則智仁勇，也是徒然。但決心生於信仰三民主義，為實現三民主義而犧牲我們自己，就是個人的「成仁」。革命軍人能夠個個決心「成仁」，則革命事業必「成功」。所以「成仁」與「成功」是一件事情。再就個人而說，決心成仁者，往往未成仁而先成功，決心成功者，往往未成功而先成仁，成功固偉大，成仁更偉大。遠如唐之張巡、宋之文天祥、明之史可法，近如此次抗戰中之儲子青、張自忠、戴安瀾等，戡亂中之張靈甫、黃伯韜、劉戡等，這種轟轟烈烈的「成仁」，簡直成為中華民族的軍神，千秋萬歲後，猶令人聞風興起。

固然，智仁勇及決心為每一個將校所必備，就是每一個士兵也要具備，不過在程度上各有差別而已。至於程度的高低固與先天有關，尤繫乎後天的學習與修養，所以我們革命軍人決不可自暴自棄，應不斷地努力學習與修養，提高自己的智力、仁力、勇力，及鍛鍊自己的決心，這樣就是士兵亦可成為將校。今日反抗俄戰爭所課於我們軍人的精神力實在太大了。倘若我們個個都具有高度的精神力，則失敗

主義自可逃形，必勝信念自可增強，反攻大陸，光復大陸，端在乎此。

(註) 見蔣百里先生：「兵學革命與紀律進化」演講詞

九、軍隊紀律

「軍紀者，軍隊之命脈也。軍隊必須有嚴肅之軍紀，然後精神上之團結力得以鞏固，戰鬥力之持久性得以確保。蓋戰時各部隊之任務不同，其境遇亦各有差別，從一定之方針，取一致之行動者，厥爲軍紀是賴。」——作戰綱要草案。

軍紀是軍隊的紀律之謂，亦猶社會的規律，國家的法律。社會沒有規律則不成爲社會，國家沒有法律的使命，惟其使命重大，自然需要極嚴密極完善的紀律，來維持其生命，健全其本身。至於平時軍紀，它是戰時軍紀的基礎，倘若平時軍紀不良，必致影響戰時軍紀的維持，戰時軍紀如不能維持，則上下凌亂，各自爲謀，正如烏合之衆——忽聚忽散，亂飛亂噪的禽類之群，以這樣的軍隊去打仗，縱有良好的命令，必無法執行，縱有必勝的戰略戰術，亦無從達成，唯有戰敗而已。戰敗就是軍隊的覆滅，團體覆滅，個人亦不保，所以軍人的生命、榮譽、功業是繫乎有組織的軍隊，而維持軍紀，則須自每個人遵守紀律始，如果個個軍人都不肯遵守紀律，則軍紀必致蕩然無存，而個個一切也必隨軍隊的沒落而沒落了。說到紀律的遵守，不容有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有始無終的行爲，亦無階級之分，彼此之別，及特殊的例外，上自統帥，下至士兵，均要一律遵守，尤其階級愈高的官長，愈要身體力行，以爲部下表率。法國「新軍論」作者卓萊氏說：「革命政府對革命軍之官長與兵卒，本真正共和之誠意，爲一國同仁之賞罰。賞厚於兵卒，而首於官長，長官厚而兵卒不平等，不平等則鳴。如是或官兵相攻訐於部隊中，或軍隊攻訐政府，而軍紀壞矣，故欲保持軍紀，須賞罰公平也。」

古今中外的將帥對於軍紀，均極重視。尤其是戰時的軍紀，更視爲神聖不可侵犯，例如穰苴之斬莊賈，晉文之斬顛顛，劉邦之斬丁公，孔明之斬馬謖。發爲理論的，如兵聖孫子列「法令孰行」爲七計之一，又說：「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子驕，不可用也。」腓特烈說：「余戰勝利，皆軍紀之賜也。然戰爭既久，軍紀稍弛緩矣。國家繁榮安靖，皆軍隊有紀律之故。羅馬人及高盧人之剛健，口耳曼民族之狡蠻，終能征服世界者，軍紀嚴肅之故也。」拿破崙說：「紀律肅嚴，乃從收歙、殺傷、污辱中救護軍隊者也。軍隊之污辱者，比死刑尤酷也。」魯登道夫說：「戰時軍紀較諸平時尤爲重要，在民族的生存之奮鬥中，對於違反軍紀者，應用一種特別法律，加以迅速嚴格之懲罰，否則，綱紀一毀，軍力亦不保矣。」

國父在革命戰爭中，對於軍紀亦極重視。他說：「當軍人能够犧牲自由，就能够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如果學生軍人要講自由，便像中國自由的對待名詞，成爲放任放蕩，在學校內便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在學校內不講校規，在軍隊內不講軍紀，那還能够成爲學校或軍隊嗎？」（「民權主義」第二講）又說：「儻軍人與官吏，借口於共和與自由，破壞紀律，則國家機關，萬不能統一。機關不能統一，則執事者無專責，勢如一盤散沙，又何能爲國民辦事。是故所責夫機關者，全在服從紀律，如機械然，百輪相錯，一絲不亂，而機械之行動，乃臻圓滿。……而在職爲軍人或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萬萬不可。」（「自由之真諦」講詞）又說：「軍隊在奮鬥的時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時不對，當士兵的都要服從，照原命令去共同前進，若是能前進，或者將錯就錯，也能打勝仗。如果一部的軍隊看出了命令不對，便單獨行動，以致牽動全軍，不能一致前進，弄到結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顧，自亂陣線，便要被敵人各個擊破，全軍就要覆沒了。」（「黨員之奮鬥同於軍隊之奮鬥」講詞）又說：「傅瀛軍有一位師長，因爲金錢驕驕，便被部下的兵士押起來，此風一開，

如果我們還不另籌良法，作長久之計，那麼，所有現在的軍長師長旅長，以後都是危險的。講起道理來，那位師長是應該押，是不應該押呢？照軍法說：長官如有吞食士兵的軍餉，須要我把他押起來，那才算正當。而現在他偏做自已部下士兵的囚徒，這是成甚麼體統呢？現在世界上士兵敢殺長官的，只有俄國，他們的士兵，當起革命的時候，去殺皇帝和保皇黨的長官，推究他們的原因，是在要行革命主義。如果瀛軍士兵，把長官押起來，也是爲行主義，那麼，我是很佩服的。但是只爲金錢問題，便弄得士兵目無軍紀，是實在不對的！」（「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

國父對軍紀的重視，已如上述。而爲維持軍隊的紀律，見於實際上的，如民元就臨時大總統後，會令陸軍部說：「頃據上海太晤士報載南京之兵士現象，均係實情。該報向表同情於民國，今爲懇切之忠告，若不切實警戒約束，不惟貽笑外人，後患何堪設想！該報所載下級軍官及高級軍官，終必同受其危險者，誠非過慮。爲此令仰陸軍部速即頒行軍令，責成各軍司令以下將校，切實奉行，以後各負其責任。並附譯該報所論之文，給與各軍將校傳閱。須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然後能保軍人之名譽，壯民國之干城。我金陵軍隊，不乏愛國健兒，斷不容以少數不規則之行爲，致壞我軍人全體之名譽也。速將此令通知之。」又，電孫毓筠囑飭皖北各軍嚴守紀律說：「頃得任代表轉來電稱：『據倪濬司電稱：皖北革命軍，以革命爲名，招集土匪，六安、鳳陽所屬，及穎、霍兩縣，在城則苛捐勒派，在鄉則擄掠姦淫』等語。查我軍素稱義師，中外共見，倪電所稱，難保無誣竇之處。請轉飭皖北各軍，務宜嚴守紀律，認真訓練，以保義師之名譽，勿令敵人所藉口。甚爲至要！」民十二所頒佈的帥令：其一是：「……各部軍隊，着就現駐地點駐紮，自經規定以後，各部軍隊，非奉本大元帥命令，不得擅自行動，致滋紛擾。該總司令等（指楊希閔、劉震寰等——浴日註），務各督率所部申明紀律，保衛地方，以期無負本大元帥撫兵恤民之至意！」其二是：「近日查各師旅部有緝獲奸細，即自行處決，市內廣衆大場之中，而

竟然陳屍數日者，殊於文明人道，大相違背。着該總司令嚴行禁止各師旅部自行處決人犯，所獲奸細，務令解至司令部辦理之。又查各處之有無兵而猶用某某司令等名目，以招搖舞弊者，着隊司令嚴令拿辦。其三是：「茲有不法之徒，專投入各軍隊，領有軍章為護符，無惡不作，致人民與軍隊日生惡感，此與大元帥救國愛民之旨，大相違背。今特派大本營偵探長李天德嚴為偵察，如查得該匪徒之機關所在，即行報告衛戍總司令部憲兵司令部並公安局協同緝拿嚴究。」此外定為條文的有：

一、倒清
時代的
軍紀

國父在同盟會時代，為推翻滿清，對革命軍所頒佈的「軍律」，極為嚴肅。計開

- 一 不聽號令者殺。
- 二 反奸者殺。

- 三 降敵被獲者殺。
- 四 私通軍情於敵者殺。
- 五 洩漏軍情者殺。
- 六 臨陣退縮者殺。
- 七 臨陣逃潰者殺。
- 八 造謠者殺。
- 九 私逃者殺。
- 十 任意擄掠者殺。
- 十一 強姦婦女者殺。
- 十二 焚殺良民者殺。

十三 殺外國人焚折教堂者殺。

十四 勒索強買者，論情抵罪。

十五 私鬪殺傷者，論情抵罪。

十六 遺失軍械資糧者，論情抵罪。

十七 獲敵軍資糧軍械，藏匿不報者罰。

十八 私入良民家宅者罰。

十九 盜竊者罰。

二十 賭博者罰。

廿一 吃鴉片者罰。

廿二 縱酒行凶者罰。

二、倒袁

時代的

軍紀

嚴加。計開：

祖父在中華革命黨時代爲打倒袁逆世凱，而約束將士，所頒佈的「軍律」，亦極

一 不聽號令者槍斃。

二 臨陣退縮者槍斃。

三 洩漏軍情者槍斃。

四 潛逃者槍斃。

五 反奸者槍斃。

六 搶掠者槍斃。

七 焚殺良民者槍斃。

- 八 強姦或強佔婦女者槍斃。
- 九 收受賄賂，勒索賄賂者槍斃。
- 十 尋仇報復，捏詞誣陷者槍斃。
- 十一 擅用私刑，擅捕良民者槍斃。
- 十二 結伴持械互鬥者槍斃。
- 十三 捏報名額，虛領領項者槍斃。
- 十四 殺害外國人，焚折教堂學校醫院者槍斃。
- 十五 造謠者槍斃。
- 十六 販賣人口，或擄人勒贖者槍斃。
- 十七 強買強賣者禁錮。
- 十八 鬪毆傷殺者禁錮。
- 十九 遺失或浪費軍械彈藥者禁錮。
- 二十 虜獲敵軍軍資軍械物品，藏匿不報，私行售賣者禁錮。
- 廿一 私入良民家宅者禁錮。
- 廿二 賭博或開設包庇者禁錮。
- 廿三 吸食鴉片煙開設包庇鴉片煙局者禁錮。
- 廿四 縱酒行凶滋事者禁錮。
- 廿五 滋鬧娼寮戲館者禁錮。

上述軍紀真是秋霜一樣的嚴肅，也許 國父是根據於孫子所說：「施無政之令」的原則。他日我們

反攻大陸亦當如是。唯有如是才能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北上宣言」)但是嚴肅的軍紀會使官兵的精神，陷於機械呆板，且有時而窮，正如古人說：「徒法不足以自行」。故必須養成全體官兵均能活潑地從內心上自動遵守紀律，才算是最進步的軍紀，亦即軍紀的真精神。蔣百里先生說：「近代戰爭要人自為戰，並且每個人都要由內心的自覺來遵守紀律，這才是近代最進步最高的軍紀。」又說：「現在軍事上由於兵學革命，紀律非出於自動不可，比方現代戰爭，一個連長在戰場上無法可以照顧全連人，所以連長在平時要教導士兵，到了戰時，在戰場上能照他所講的自動去做，這算是一個好連長。空軍的紀律尤其要出於自動，倘使飛行人員不能自動的遵守紀律，司令官要他去擔任某種任務，他卻駕了飛機在天空亂飛一陣回來，至於是否達到任務，司令官耳目不能看到，自然不得而知。所以我說空軍的紀律，必要出於自動，才算是一個現代的空軍戰鬥員。」(註)

但怎樣才能够養成全體官兵有遵守紀律的自動精神呢？唯一法門是統一全體官兵的主義信仰，——對於三民主義都有深切的信仰，因為三民主義是軍紀的根源，是軍紀的中心，倘若全體官兵於任何時都決心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為三民主義而犧牲，則他們便可以自覺自動的遵守紀律，而紀律也就可以自然地得到維持，國父昭示我們說：「要大家為三民主義去奮鬥，變成革命軍，便是要大家為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為什麼要大家為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呢？因為為三民主義去奮鬥，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義，所謂「仁義之師」。這種死法，是為主義而死，不是為金錢而死。」(「革命軍不可存心升官發財」講詞)又說：「如果我們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義，便變成革命軍，如果變成了革命軍，便可替革命主義去犧牲，以一當百，百當萬，同心協力去定中國。……他們明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樣，他們的力，必定同俄國的兵士一樣，出去打仗，便有勝無敗，便可征服吳佩孚。」(「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當然這樣的軍隊，是自動地遵守紀律的軍隊，也是說明三民主義是軍紀

的根源，軍紀的中心。

今日國軍在臺灣的紀律是比大陸時代進步得多了。因此便得人民的敬愛，並博得國際人士的好評。不過我們還得要有一個最高的目標——養成官兵的主義信仰，使他們個個都有自動遵守紀律的精神。

(註) 見蔣百里先生：「兵學革命與紀律化」演講詞。

十、戰略戰術

戰略與戰術的關係，正如母子一樣，戰術依存於戰略，又隨戰略所指示的方針而行動，戰術的行爲可以影響戰略的成敗，而正確的戰略却常能給予戰術致勝的基礎。至於戰略戰術的定義，幾乎每一個兵家都有他的界說，蕭米尼說：「戰略係在地圖上作戰，對戰爭全局打算的方術；戰術係在戰場上直接指揮部隊的方術。」克勞塞維茲說：「戰術爲一戰團間使用戰團力的學術，戰略爲使用多數戰團以達到戰爭目的的學術。」毛奇說：「戰略係在地圖上運用理想，決定方針，統率全軍以行作戰的方術；戰術係在實地的戰場，指揮一部份軍隊，以行作戰的方式。」哥爾茲說：「戰略係指揮全軍之術，戰術係指揮一部份軍隊之術。」這都是供我們對於戰略戰術意義的了解。以下我且來研究 國父的戰略戰術。

現在我們根據 國父的言行來研究他的戰略戰術，可以說他在對內的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略是攻勢，即「戰略攻勢」，在對外的革命戰爭上所主張的是守勢，即「戰略守勢」，至於戰術則以採取攻擊爲主，我且先論他的戰略。

一、戰略

方面

國父在對內的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法，像民元以前的進攻滿清，是一種奇襲式的攻擊，亦可稱爲游擊戰。（詳見本書「緒言」）民元的興師北伐，是採取戰略攻勢，民十一、十三的兩次北伐以及歷次的討賊軍事，也是採取戰略攻勢，即以精神力量比敵處於優勢的革命軍（自然人數武器比敵處於劣勢），作連續的進攻，求敵而殲滅之。西方兵家說：「雖說數目上的優勢，爲任何企圖勝利者所不容忽視的原則，但數目較少的一方，仍有進攻並擊敗敵人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之下，優勢之所在，或爲指揮人力物力較少者之智力，或爲將士

用命。」（註一）可作爲「國父這個戰法的註脚。見於遺教上有：

一、民元佈告全國同胞書說：「凡我各省軍民代表同心戮力，率衆前驅，效諸萬一生謹慎之行，守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旨，選籌宜決而密，用兵貴神而速，自能垂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

二、民四發表討袁宣言說：「一旦義旗起，義動天地，當以秦隴一軍，出關北指，川楚一軍，規劃中原。闢粵旌旗震海，合齊魯以撐京左。三軍旣興，我將與諸君子，扼揚子江口，定蘇浙以樹東南之威。竄庭掃穴，共戡國賊，期可指日待焉。」

三、民六護法之役電襄陽黎聯軍總司令暨全體將領說：「執事據荆襄重地，地扼江漢之形勢，南與滇、黔、川、湘、桂軍互爲聲援，合力並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則必勝之算，操自我手。若復東取武漢，斷敵歸路，而西南大兵，奮擊於前，更使逆軍匹馬長輪不返。前此失在姑息，除惡未盡，以致奸人逸出，變亂頻仍，今茲務定正本清源之策，爲一勞永逸之計。」

四、民十一討陳電覆陳護法說：「分路進兵，以期破賊。」

五、民十三關於討陳及北伐致蔣中正先生的信，其一說：「望見鼓勵各人速出，一由東江擊破陳渡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則川湘各軍必爭先而出武漢，而中原可爲我有。否則不論率直誰勝，西南必亡。際此之時，能進則存，不進則亡，必然之理也。」其二說：「江西得救，則湖南不成問題，然後再會滇、黔、川、湘、黔、袁會師武漢，以窺中原，曹吳不足平也。」於此可見「國父是採取拿破崙「分進合擊」的戰略原則。此外，他亦採取我國古代兵法所謂「先發制人」的原則，因爲欲採取攻勢，其動作必須先發制人，爭取戰爭最初的勝利，由最初的勝利，而發展爲整個的勝利。他說：「余倡議討袁，皆南方同志持重，不敢先發制人，致遭失敗。」（「孫文學說」第六章）又見陳英士致黃克強的信說：「中山先生

在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發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是誓必去之，所定計劃，厥有兩端：……一日聯日……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爲袁氏手深大權，發號施令，調兵遣將，行動極稱自由，我輩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但戰略攻勢的採取，並不限於革命者或侵略者，革命者爲完成他的革命目的須採取攻勢，侵略者爲完成他的侵略目的，亦須採取攻勢。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閃擊歐陸各國是採取攻勢，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亦是採取攻勢。因此，他們都是先發制人，施以猛烈的閃擊。於此我更要引申的，攻勢與守勢，並不是極端對立的，雖說「較強的一方恆採取攻勢，較弱的一方恆採取守勢」，但在某種情形之下，攻勢可轉爲守勢，守勢也可轉爲攻勢。不過在攻擊的一方未達目的而轉爲守勢時，却會給予守勢的一方以反攻機會。守勢的一方，爲力求保全自己人力物力，和對方實力在攻擊中消耗之後，終獲決戰的機會，而取得最後勝利。所以我們可以說，攻勢固可以取得勝利，守勢也可以取得勝利，正如毛奇所說：攻勢是「到達目標的直路」，守勢則是「兜着很大的圈子」。

其次，關於對外抗戰的戰略，國父基於當時的情勢是主張取守勢的，亦即持久戰略，消耗戰略。因爲敵人來侵，施行攻勢作戰，利在包圍殲滅，速戰速決，而我因軍力比敵劣勢，自然要施行守勢作戰以制之。但國父所謂「守」，決不是絕對的「守」，永遠的「守」，是以反攻爲最後目標的「守」，克勞塞維慈說：「凡自信是孱弱的，不得不先處守勢，但守勢的結果，不可歸於消極。若守者之力已漸大，則當轉變爲積極目的，速把守勢棄掉，一至抵抗到相當程度，即自然須變爲攻勢。所以守勢作戰是循自然之進行，必始於守勢而終於攻勢。若因最初處於守勢環境而限於一般被動的抵抗，始終不行攻勢運動，這是不合理的。若不問事態如何，始終墨守守勢，決不轉爲攻勢的，那是更不合理。因爲守者專

靠站在前來的地位來打退敵人而不轉為攻勢的軍事行動，是和以絕對被動的守勢思想來行會戰一樣的不合道理。」國父的主張正和克氏相同，即先取守勢，俾取得充分的準備，養其全鋒，俟敵疲饋，然後乘機大舉反攻。當民高帝俄侵略我外蒙古日急，國父主張對俄抗戰，意謂在戰略上應先採取守勢，即所謂謀不取之戰勝，以批鄂鄂而保領土，俟第五年練兵八百萬至千萬，然後轉為攻勢，直抵莫斯科，俾彼得堡。詳見「震幣革命通電」。今日我們反共抗俄，在戰略上就是採取守勢，一俟時機成熟，當轉為攻勢，反攻大陸，與諸民主國家會師莫斯科。

此外，還應特別舉出的，國父在戰略上（或用兵方略）有兩項較具體（並帶有彈性）的指示：其一是：「此後戰事五大變更，集中全力進趨省城為上策，集中全力以撲滅麻子為中策，縮短戰線，以保勢力，而得後進為一策。誰不忍捨去土地，與敵相持，分派兵力則為下策。望兄連酌施行！」（櫻園某書戰略三種電）其二是：「競存不日動，各宜先後繼起。艦隊若遇被令分防，宜立即集中江門，與附近各營同時起事。並令少部隊與數小艦進攻三水，扼而守之，以斷其交通之路。以大隊水陸並進，取香山順德糧而守之。以容奇為艦隊根據，以大良為部隊大營，以甘竹勒樓黃連紫坭茶蕉門一帶之水為防線，水陸軍據而守之，為持久計。此防布置妥當，即分兵進取虎門東莞石龍一帶為右翼，以絕彼東江之交通。然後分東西路水陸夾攻：西路取道官窰石門，水路以攻石井，東路取道廣九鐵路，進攻長州牛山各砲台。得手進攻河南花地，與西路聯絡，而包圍佛山陳村敵軍，盡繳其械。如此省城可不攻而下矣。此作戰方略之大要也。務望與艦隊同志謹識而執行之！」（「再致李綺庵指示作戰方略電」）于此亦可見國父確是一個大戰略家。

二、戰術

方面

克勞塞維慈說：「戰爭唯一手段，無論為攻勢，為守勢，而決定戰鬥者，厥在戰術。所以一切戰略計劃，皆以戰術之成果為目的者，蓋以戰術之成果，為勝利根本原因也。」福煦元帥說：「戰略自體不能存在，須賴戰術，始能發揮其價值。」戰術之重要，於此可見。在這一方面，我們首先應知道國父關於戰術的論述：第一、關於戰術的發生：國父認為它是發生於戰鬥的事實。他說：「現在的軍人都是說入學校，研究戰術學，學成了之後，為國家去戰鬥。照這種心理來講，當然是先有言論，然後才有事實。但是照世界進化的情形說，最初人同獸鬪，有了幾百年，然後那些毒蛇猛獸才消滅。在那個時候，人同獸鬪，到底有沒有戰術呢？當時或者有戰術，不過因為沒有文字去記載，便無可稽考，也未可知。後來人同人相爭，國同國相爭，有了兩萬多年，又經過了多少戰事呢？因為沒有歷史記載，所以後世也不知道。就中國歷史來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實學。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是先有戰鬥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就是現在的戰術，也是本於古人戰鬥的事實，逐漸進步而來。自近來發明了無烟槍之後，我們戰術便發生一個極大的變更。從前打仗，是兵士看見了敵人尙且一排一排的齊進，近來打仗，如果見了敵人，便趕快伏在地下放槍，到底是不是因為有了無烟槍，我們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實然後才有書呢？還是先有書然後才有事實呢？外國從前有這種戰術，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戰始。當時英國兵士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一排去應戰，波人則伏在地下，所以英國兵士，便受很大的損失。伏地戰術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蘭搬到非洲的，當時的人數只有三十萬，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總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從前吃虧不少，便學土人伏地的戰術。後來學成了，波人和英國人打仗，英國人也吃虧不少，所以英國人又轉學波人的伏地戰術，後來英國兵士回本國，轉教全國，更由英國傳到

全世界，所以現在各國的戰術學都採用它，由此可見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不是先有言論，才發生事實。」（『民權主義』第一講）

第二、關於戰術的革命：拿破崙說過：「沒有十年不變的戰術」。克勞塞維慈也說過：「沒有一成不變的戰法」。從歷史上看：戰術的變化，在專用徒手肉搏的時代，是「點的戰術」，到了用戈矛弓矢的時代，便變為「線的戰術」，再到用槍砲兵艦轉戰陸上海上的時代，又變為「平面戰術」，洎乎現代，由於飛機的出現，使空中亦變為戰場，更進化為「立體戰術」。這不過是就其大體而言。至於戰術的基本原則是不變的，所變的只是解釋及其應用方法，這又是不可不知。自然 國父對於戰術的認識，不是永久不變的論者，且以受到拿破崙克氏理論的影響，所以他說：「專就兵學講，外國的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國兵書，今日沒有人還拿去看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看，就是十年以前的兵書，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艦。現在外國的戰艦，每艘要值五千萬元以至一萬萬元，能够值這些錢的船，才叫做一隻兵艦。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艦為最快，戰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戰以前的戰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海軍的戰艦有這樣的大變動，就是陸軍的槍砲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次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槍，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槍砲，到了今日也算是舊式。……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革命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民權主義』第五講）又說：「武器與戰術固有關係者，以中國論，昔用之弓箭，而今用槍砲，武器不同，戰術亦隨之而異。」（『軍人精神教育』）可是戰術的進化

，固是跟着武器，而武器的進化又跟着什麼呢？當然是科學。他說：「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為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利便，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彈藥，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培根、牛頓那些大學問家，所主要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民族主義」第四講）

國父認為我國在現代戰爭中，應先講戰術，他說：「自海禁既開之後，與英戰，與法戰，與日戰，與聯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槍砲，不諳戰術故也。苟諳戰術，則昔日安南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杜國之農民，英國患之。」（「軍人精神教育」）但他却反對「圖吞棗」，依樣畫葫蘆地抄襲外國的戰術，他說：「此次歐戰發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彈，實不知其幾萬萬也。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十數萬萬發。然以其效力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戰術，乃以子彈遮攔敵人，使不得前進，故多在二千米達以外用之。若在八千米達以外，至幾萬米達時，則須用重砲，亦如用步槍然，多在以子彈遮攔敵人之前進。此外空中以飛機戰，水底以潛艇戰，類皆愈出愈奇，尚有露天地洞，與閉天地洞，為砲彈所不能及者，兩方兵士相遇，則以徒手搏擊，甚至開戰時，闕若無人，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者。推其所耗子彈極多，以噸數計，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每噸合中國一十六擔八）。此種戰術，中國決不能學，因彼之製造子彈有加無已，且發彈係以機器，不費人力。現有最新式機關槍，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以一百顆為一盒，計算每一分鐘可發十五盒，彼固不求一一命中，務在多發子彈，堵截敵人而已。」（全）惟在革命戰爭中的戰術應採取攻擊或防守呢？今日我根據追隨國父的老同志說：國父的戰術是以採取攻擊為主的（註二），並且我們根據他如下的電令亦可以看出來：

其一、電令許某：「陳天太部已出四會矣。現戰情已變，江門軍當全數出三水蘆苞，向高塘新街方

面進攻，以速掃滅襲擊省城之敵（指陳炯明逆軍——浴日註）爲先，然後再爲第二步進取。」

其二、電令胡漢民傳令永豐艦長：「現楊總司令令希閱親率漢軍由龍崗出擊淡水平山之敵，該艦長搜擊海上偷渡之敵，毋使漏網。並相機與楊總司令聯絡，協同動作。若無線電不通，着暨運使派安北艦傳令，並助永豐擊敵。」

其三、電令虎門廖司令湘芸：「我追擊軍大破殘敵於石灘之東，現已占據福田石龍之線，殘敵向惠州潰退，虎門各部，着速出擊，以掃蕩石龍南東之殘敵爲要。」

於此，我們要明白的，戰術攻擊固配合戰略攻勢，亦可配合戰略守勢。但是在現代戰爭上，倘若被迫而取戰略守勢，戰術亦以防守爲主，死守陣地的挨打主義，這樣，犧牲固重大，更無從戰勝敵人，勢必爲敵人所迂迴包圍或中央突破，而招來全軍的覆沒。古兵法說：「以攻爲守，乃自保也。以守爲守，乃自斃也。」正是此意。故爲擊退敵人，殲滅敵人，戰勝敵人，必須採取攻擊主義，對敵實行進攻，後攻，左攻，右攻，或襲擊，擾擊，誘擊，伏擊，截擊，側擊，尾擊，追擊，亦即放棄「以靜制動」的戰術原則，改取「以動制動」的戰術原則，方可獲勝。

又，國父在戰術上最喜用「奇兵」，（有時亦包括戰略）他說過：「用兵忌攻堅，尤貴出奇。」（「致石青陽與黃復生從速圖陝電」）這是採用我國古代兵家孫子「以正合，以奇勝」的原則。民十（二）東江之役，電朱培德許某等指示說：「望顯承抽一勁旅抄敵人後路爲要。」電劉某指示說：「望兄彙調一隊至白沙堆，一以絕敵人後路，二可保我航線，聞敵人食糧輜重，皆在鳳門坳附近，若見能照此行事可悉奪之，則博圍可解，我軍實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圖之！」但用奇兵以「神速」和「秘密」爲要件，能如是，才可以出敵意表，博得輝煌的戰果。

此外 國父在戰術上（亦即以攻擊爲主）尙有兩大貢獻如左：

一、游勇戰術：此種戰術，即現今所謂游擊戰術，國父於進行推翻滿清時，即用此種戰術。國父對於安南之黑旗用以抗法及南非洲杜國之農民用以抗英的游勇戰術，素有研究，當民國十一年與師北伐，駐節桂林，曾召集各軍將校講演「軍人精神教育」，謂「此種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以北方交戰，尤為相宜。」跟着舉出此種戰術的五種技能：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擊斃，並作如下的說明：

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鬪力，以能殺敵與否為斷，故命中為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即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若游勇戰術，則與之相反，彼視子彈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輕施放，而有五十顆子彈，便已十分滿足。以現在軍隊論，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何以一言北伐，猶以為少，豈命中之技，尚不及游勇耶？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有在後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視子彈，因其子彈，只有此數，非遇敵人，則無補充之機會，故不在後方接濟，而在取諸前方，此不獨游勇為然，即如粵軍自浚園以至回粵，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為多，而不專恃後方接濟，其明徵也。若在無槍砲而用弓箭之時代，射箭比放槍更難，而古時有百步穿楊者，即在能命中，否則臨陣之際，最多隨帶三四十枝箭矢，若無命中能力，即不啻無的放矢，祇須數分鐘間，矢盡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戰？槍砲亦然，不能命中，則子彈之消耗多，而殺敵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壇之戰，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而張勳之兵死傷，合計不過一百七十餘人，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觀之，子彈之有效，在能命中，不能命中者，子彈雖多，皆為贅物。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不問命中與否，放槍時，甚有高樓兩手，或緊閉眼睛者，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須知子彈最為寶貴，中國既無若干大兵工廠，不宜學歐洲戰術，以子彈為遮障，宜學游勇戰術，視子彈如生命。但平時須練習射擊，務求命中，不使虛發，此為軍人之勇，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

何謂能隱伏？即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係利用地形，爲人身之屏蔽。余在安南時，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即知，故須藉地形以爲埋伏之所，或藏在石頭後，僅露共首，以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尙可從容窺探其舉動。即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閉藏，勿庸驚竄，因此時前後左右，必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蓋得諸經驗，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故隱伏亦爲技能之一。

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聯者，我亦問諸游勇，彼謂：「隱伏秘訣，祇是『不動』二字，至少須耐十二小時之勞，直至夜深，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力，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絕足，必不能過於子彈，走避易爲所中，不如耐心隱伏，較爲安全也。」此外尙有實例可證，前此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調四人，藏在山上，敵之圍攻者，約六百餘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人爲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抵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才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排，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一役也，即全在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甯有幸事耶！

何謂能走路？現時中國尙有完全鐵道，行軍之際，專恃走路，練習之法，祇須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後，每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頓，而脚力自健。彼游勇戰術，亦即以善走稱。尙有實例可徵，北軍一到南方，每以山嶺崎嶇爲苦，南軍則如履平地，快捷異常，是爲我之所長，敵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爲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重也。

何謂能吃糧？游勇所恃之糧食，即此炒米一種，每人携十觔，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飢，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飯時間，此亦爲游勇之特長，勝於正式軍隊者。去年湖南援粵之役，其始佔據地方不少，卒因後路補充缺乏，乃至於敗。糧食亦爲補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糧，則於行軍極爲簡便。

，既免飛禽輓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患煩雜也。

以上五種技能，是 國父在距今剛剛三十年前所說的，較之今日游擊戰上所用的技能，雖很簡略，仍可作爲今日活躍於大陸上游擊隊之用。今日我們應加緊發展大陸上有槍或無槍的游擊隊。

二、非常戰術：這種戰術，亦稱革命戰術，係主張「用我軍一萬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去打破敵軍十萬人。」甚至「用一個人打百個人，用一百個人打一萬人。」本來尋常戰術，都是主張以優秀的軍隊對劣勢的軍隊，或以相等的軍隊而戰，至低限度亦不過以二對三的軍隊相戰，像兵學天才家克勞塞維慈在他戰爭論上，也是強調「兵數的優勢爲戰略上第一原則」，戰略如此，戰術亦如此。其論拿破崙的作戰說：「拿破崙常以大會戰制勝，他是近代絕無僅有的名將，除一二會戰未能以多兵制敵，不得不用超絕智力而取勝之外，他都以集中較激優勢的兵力或稍稍劣勢兵力爲常法。」可見國父的戰術思想，比普通兵家的戰略戰術思想爲進步，他日我們反攻大陸必須發揚 國父這一個戰略戰術思想。今日所謂「以寡擊衆」亦應作如是觀。國父說：「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和尋常軍有甚麼不同呢？不同地方，小而言之：革命軍的一個人，常常能够打一百個人，至少也能够打十個人。大而言之，用我軍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可以打破敵軍十萬人。像這樣以少數常常能够打破多數訓練很純熟，武器很精良的軍人，才叫做革命軍。……現在廣東有十多萬兵，都不能說是革命軍。因爲他們都是一個人去打一個人的。如果我軍一萬人遇到敵人一萬人，才敢去對陣，若是遇到了兩萬敵人，便不敢前進。像這樣的軍隊，有甚麼用呢？怎麼可以說是革命軍呢？至於本大元帥今天所講的革命軍，是一千人能够敵一萬人，像有這樣大力量的軍隊，在諸位軍事家看起來，或者以爲不可能的事。大概照尋常的軍事經驗講，我軍無論練得如何精良，總要用幾倍人去打敵人，才可以操勝算。譬如用三萬人去打一萬人，才可以說是有把握。如果敵人有三萬人，我軍祇有二萬人，便不能說是有把握，至於敵

人有一萬人，我軍也祇有一萬人，更不能說是有把握。像這樣的軍隊，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革命軍。世界上有非常的時候，能够做非常的事業，便要有非常的革命軍，才可以做成功。竊諸位將士不信，祇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歷史，革命黨和清兵奮鬥，沒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敵百，用一個革命軍打一百個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好革命黨。諸位將士是湘軍，是從湖南來的，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的有黃克強。有一次，自安南入欽廉起義，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革命軍」不過兩百人，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用那樣少的人，和那樣多的清兵，打兩個多月仗，到後來彈盡而援不至，還可安全退出。照這一次戰爭說：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人，像這樣的戰鬪，是非常的戰鬪，不可以常理論，像這件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還算你湖南人做出來的。所以本大元帥要大變以後能够打勝仗，做非常的事，便要變成非常的革命軍。像黃克強那次在欽廉打仗一樣，如果不然，就是槍好彈多，還是送把敵人，自己沒有用處。」（「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講詞）

再說：「現在的軍隊不是革命軍，祇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在廣州起義的軍隊，才可以說是革命軍，當他們起義的時候，在廣州的清軍，有滿洲的駐防軍，有李準的水師，張鳴岐的陸師，總計算起來，不下五六萬人，革命軍的人數不過二三百人，那裏有今日這樣多的軍隊呢？當時的武器不過是手槍炸彈，那裏有今日這樣好的長筒大砲呢？那樣少的人數，只用手槍砲彈，一經發動，便攻進水師各行臺和總督衙門，後來因為約定的外援，沒有趕到，便完全失敗，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黃花崗，所以黃花崗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一天打死了的革命軍，就是捨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才不愧稱為革命軍。假如當時我們的革命軍有三千人，或者敵人祇有三千人，那一次革命，便可以成功。但是當時廣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有了五六萬人，我們的革命軍，又沒有三千人，只有三百人，眾寡太相懸殊，所以結果歸於失敗。至於以戰論戰，當時城內之戰，可算是成功。」（「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講詞）

再又說：「普通的戰術，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便以爲了不得，古時的兵法，都說是『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近時的兵法用一個人打一個人非守即退，像這樣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當的戰術。……辛亥革命，在廣州起義之後，又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推到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呢？當時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兩個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革命黨分到了五十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發難，城外砲營，立時響應，便拉兩門砲進城，遙攻總督衙門，趕走瑞澂，佔領武昌。至於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鎮的新兵，有長江的海軍，又有巡防營的舊陸師，總共不下兩萬多人。革命黨祇用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廣州起義，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結果是失敗。武昌起義，用一個人打五百人，結果是成功。都是以極少數的人，打極多數的人。廣州是失敗，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奮鬥，不能一概而論，這種奮鬥，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祇有革命歷史中才有這種例。……軍隊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砲，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到了武昌起義之後，便都歸革命黨所用。總而言之，革命是非常事業，不可以常理論。從前留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海陸軍學生，我們總是設法運動，要他加入革命黨，但是有許多學生，總是不肯加入，始終反對革命。他們那些反對革命的有智識軍人，是甚麼心理呢？仔細考究，就是他們都有一種成見，自以爲是軍事專家。在我們革命黨主張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用一百個人打一萬人，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爲這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這個道理，我們不必深辯，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是誰造成呢？成功的時候，固然是有許多軍事家的贊助。但是窮脈溯源，說起原動力，還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推到當時一般沒有智識的

軍人，以為用極少數打敗頗多數，是戰術中決不能成功的定案。因為不贊成這個道理，便不贊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因為那些軍人，都不贊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黨，真是有軍事知識的人，還是很少。辛亥革命之所以大功告成，是由於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聯名發電贊成共和，才能够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為降格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羅這一般軍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所以辛亥革命之成功，實在沒有真正軍事學識的。」（「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於此可見 國父在用兵上是實不負責的。就是說，如果我們真軍事學問都有「爲革命主義去犧牲」的攻學精神（武器爲次要條件），像這樣的革命軍，「以一當十」，自有殺敵效果。這是有戰例爲證，並非誇大之談，觀於上述，便可瞭然。何況革命軍對敵作戰，勝固戰，敗亦戰，從屢敗屢戰中，爭取最後的勝利。倘若當兵一千人與一萬的敵人相遇，或一千人與一千的敵人相遇，便心寒膽散，甚至棄械逃遁，像這樣的軍隊，根本不配作戰，更談不上參加革命的戰爭。所以我們今後在練兵上，尤其爲反攻大陸，更應訓練每一個士兵都有爲主義而奮鬥犧牲的「以一當十」的攻學精神，那麼就容易取勝了。又從我們古代兵學上來看，像孫子兵法說：「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或「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或「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或「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如果我們能够運用這些原則，當然可以達成「非常戰術」。再從現代戰爭來看，雖說戰略以寡擊衆，戰術則仍要以衆擊寡。但在戰圖上以寡擊衆而獲勝的亦不少，要在如何運用而已。更可見「非常戰術」的正確。

德國哥爾茲將軍說：「關於戰略戰術，從事著作者，無論何人，非其所述原則中考慮本國特別事情，提供吾人以國民的戰略戰術，則不能謂之真有所貢獻於國家。」真的，中國今後的戰略戰術是不能再徒事抄襲了，必須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戰術。國父的戰略戰術是最適用於中國革命戰爭，我們今後應加以發揚光大。

- (註一) 見英國福爾區著「現代戰爭論」。
- (註二) 據李仙根、趙超先生等口述。

十一、戰史述評

首先我要說的，是國父對戰爭時代的劃分。關於歷史上戰爭時代的劃分：有人分爲：（一）點的戰爭時代，（二）線的戰爭時代，（三）平面戰爭時代，（四）立體戰爭時代。至於近代的戰爭，也有人分爲煤力時期，油力時期，電力時期，原子時期。這都是就戰爭上所用的工具或動力來劃分的。國父則從人類歷史進化上把戰爭劃分爲如下的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

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

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

第四個時期——是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

以上的劃分，見於民權主義第一講，就中「人同獸爭」及「人同天爭」的兩個時期，僅是戰爭的起源，唯有第三第四個時期的戰爭，才算是真正的戰爭。而且國父在這第四個時期，有一個理想，認爲基於民權革命的成功，即民主政治的實現，足以避免將來國內的戰爭，像今日世界民主國家，軍隊是對外的，所有政治問題均由議會上來解決，那自然沒有內戰的發生。英國如是，法國如是，美國如是（自建國以來，僅發生過一次所謂「南北戰爭」）。同講說：「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反對他，後來陳勝、吳廣起義，各地都響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楚漢相爭。劉邦項羽是爭什麼呢？他們就是爭皇帝，漢唐以來，沒有一個不是爭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外國嘗有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

中國幾千年來所戰爭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我們革命黨爲避免將來戰爭起見，所以當初發起的時候，便主張共和，不要皇帝。現在共和成立了，但是還有想做皇帝的，像南方的陳炯明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廣西的陸榮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還更不知多少人都是要想做皇帝的。中國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兵權大的就爭皇帝，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現在一般軍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這也是歷史上競爭的一個進步了。」固然依於民權主義的實現，可以避免由政治上發生的內戰。而依於民族主義的實現，亦可以避免種族間的戰爭。依於民生主義的實現，亦可以避免由經濟上而發生的階級戰爭。從這點上，更可見 國父三民主義的偉大。

戰史是兵學的泉源，也是將校的教師，歷代兵家名將對戰史皆有深刻的研究。孫武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可以說是黃帝擊敗蚩尤，與唐虞夏商周五代及春秋用兵的結論。克勞塞維慈所著的戰爭論，是研究腓特烈大王及拿破崙戰史的結晶。他如吳起、韓信、關羽、岳飛、戚繼光、漢尼拔、毛奇、興登堡等的戰勝攻取，亦莫不由於研究戰史爲其基礎。又如拿破崙說：「欲成爲偉大的將帥，唯一的手段，應把握着兵術的祕訣——研究戰史。」華旬傑伯爵說：「戰史的智識決不是蒐集一切實例，以供我們必要時發見其足以模倣的適例，便算完了，乃是憑實習所獲得的精神訓練，使我們於不知不覺中容易認識正確的目的，且可改進我們以前那低劣的無意識的天賦本能，使成爲有意識的力量。」普克爾將軍說：「軍隊若缺乏戰爭的經驗，則可以戰史爲教育的基礎，更屬必要。……戰史雖不能代替實際的經驗，然足爲實戰的準備，在平時研究戰史，乃學習戰爭與決定兵術原則的真正手段。」戰史的重要可見。

一、關於
本國戰
史

國父爲領導中國革命，當然對戰史要有深刻的研究。因此，在遺教中，可以找到他許多關於中外戰史的言論。國父對中國歷代興亡史，戰爭史，尤以太平天國戰史爲最爛熟，這大概是基於推翻滿清的需要，正同洪秀全的革命一樣。關於這點，我前接到一位老同志由渝給我的信說：「總理生平最爛熟者爲太平軍戰史，對於進兵攻

破得地之戰法及地理，往往如數家珍。其材料除得自私人紀錄，及官書外，外人所著關於太平朝事跡，概應有盡有。嘗言革命用兵與國家用兵之戰略不同，太平戰法大可採用，並批判其勝敗之由。」（註）

國父爲漢公著「太平天國戰史」一書撰序說：「雖以羅會劉郭號稱學者，終不知春秋大義，且陷於以漢攻漢之策，太平天國遂底於亡，豈天未厭胡運賊？其當時戰略失宜，有以致之歟？」這是對太平天國之亡的一種感慨。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裡更深入地論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說：「從前太平天國便是清軍之驍，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講起原因有好幾種：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因爲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約，承認太平天國，不承認大清皇帝。但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不見天王洪秀全，因爲要見洪秀全便要叩頭，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便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約，後來派戈登帶兵去打蘇州，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有人說他們的失敗，是由於不懂外交。這或者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又有人說洪秀全所以失敗，是由於他得下南京之後，不乘勢長驅直進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失敗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所以失敗，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有六七萬精兵，因爲發生爭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

，也羣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進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爲，並且自己也被人懷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因爲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做皇帝，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韋昌輝、石達開、楊秀清那四部份基本軍隊，都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尙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了南京，經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因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個王，使他們彼此號相位等，可以互相牽制。但是從此以後，李秀成、陳玉成對於各王便不能調動，故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這是從政治上來分析太平天國的失敗，也就是說政治的失敗足以導致軍事的失敗。

其次，關於中國近代對外的戰爭，例如論中法戰爭說：「鎮南關一戰，中國還獲勝仗，後來因被法國恐嚇，中國才和法國講和，情願把安南讓與法國，但是剛在講和的前幾天，中國的軍隊正在鎮南關露山大勝，法國幾乎全軍覆沒，後來中國還是求和，法國人便以爲很奇怪。嘗有法國人對中國人說：『中國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議，就各國的慣例，凡是戰勝之國，一定要表示戰勝的尊榮，一定要戰敗的割地賠償，你們中國戰勝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國，定種種苛虐條件，這真是歷史上戰勝求和的先例。』中國之所以開這個先例的原因，是由於滿清政府太糊塗。」（「民族主義」第二講）又論庚子之役說：「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爲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砲，那種架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

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像歐美的洋槍大砲，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更利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議和團的勇氣，始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團的軍形，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砲，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槍砲，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體相搏。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便用機關槍去掃射義和團，義和團雖然被機關槍打死了很多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畏懼，還不退却，總是前仆後繼，死死的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乾着乾着過楊村，直進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請了大兵來幫助，纔能夠到達北京，得各國公使請聯軍。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武器是西式槍砲，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相搏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藉，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這其令人驚心動魄。」（「民權主義」第五講）從這一述評，可見武器在戰爭上的重要性，亦可見「勇銳之氣，殊不可當。」

二、關於外國戰史

國父對外國戰史亦很有研究，尤愛研究各國革命戰史，如英法的民權戰爭，美國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及俄國的革命戰爭（散見三民主義及各譯詞中，茲略）。他為周應時「戰學入門」一書撰序說：「世之善戰者，有得於天才，有得於學問，如鐵木真之起於游牧，而能掃蕩歐亞，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此天才獨勝者也。如莫罕克（即毛奇——浴日註）之運籌帷幄，決勝先機，一戰而勝丹，再戰而摧奧，三戰而敗法，此學問特長者也。至於拿破崙乘法國革命之運，統饑寒之殘卒，與奧戰於意大利之野，以少擊衆，連戰皆捷，轉危為安，及後兼奄全歐，其用兵之妙，古今無匹，此才學兼長者也。」足見他對鐵、毛、拿等戰史亦研究過

一番。至於論第一次歐洲大戰，散見於遺教中較爲詳盡，他說：「前幾年的歐洲大戰，這次戰爭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呢？因爲這次戰事擴充影響到全世界，各國人民都被捲入漩渦之中。這次大戰爭所以構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爭海上的霸權，因爲德國近來強盛，海軍逐漸擴張，成世界上第二海權的強國，英國要自己的海軍獨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權的德國，英德兩國都想在海上爭霸權，所以便起戰爭。二是各國爭領土，東歐有一個弱國叫做土耳其即突厥，土耳其百年以來世人人都說他是近東病夫，因爲內政不修明，皇帝很專制，變成了很衰弱的國家，歐洲各國都要把他瓜分，百餘年以來不能解決，歐洲各國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發生戰爭。故戰爭的原因，第一是白種人互爭雄長，第二是解決世界的問題。如果戰後是德國獲勝，世界上的海權便要歸德國佔領，英國的大領土便要完全喪失，必成羅馬一樣，弄至四分五裂而亡。」（「民族主義」第四講）這是就歐戰發生的原因而論。關於此，又說：「像這次歐洲大戰，便有人說『打太陽』的地位，因爲歐洲列強多半近於寒帶，所以起戰爭的緣故，都是由於互爭赤道和溫帶的土地，可以說是要爭太陽之光。」（第一講）

○次述歐戰的軍事動態：其一、關於構築障地方面說：「吾今欲請學者一觀近日歐洲之戰場，當德軍第一次攻巴黎之失敗也，立即反攻爲守，爲需要所迫，數月之間，築就長壕，由北海之濱至於瑞士山麓，長一千五百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線各重之防禦，每重之工程，有陰溝，有地雷，有鐵道，有棧房，工程之鞏固繁複，每線每里比較，當過於萬里長城之工程也。三線合計，長約不下五千餘里，而英法聯軍方面，所築長壕亦如之。……而歐洲東方之戰線，由波羅的海，橫互歐洲大是，而至於黑海，長約三倍於西方戰場，彼此各築長壕以抵禦，亦若西方，其工程時間皆相等。」（「孫文學說」第四章）其二、關於使用兵器方面說：「當歐戰的時候，法蘭西本國以北的許多地方，都被德國軍隊侵入，人民的產業化爲烏有，房屋也打破了，在那個地方兩軍相持三四年，不但是房屋沒有，就是一草一木都找不出來，

成了不毛之地。這是甚麼原故呢？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打仗，是用子彈分勝負，每打一次仗，一日要用幾十萬幾百萬子彈，歐美現在打仗，不用子彈分勝負，要用砲彈分勝負，每日所用的砲彈，總是以幾千萬計。我們現在的戰爭，在他們看起來，是拿破崙的戰爭，是幾百年以前的戰爭。他們現在的戰爭是甚麼情形呢？在戰線以內的人，不能在地上走，要在地底下走，在戰線之內挖了許多隧道，去接濟前方的補充。他們現在用砲，好似我們用槍一樣，我們打了勝槍，是說繳槍，他們並不說繳槍，要說繳砲，每次最多的時候，要繳五六萬砲，要繳幾十萬機關槍。」（「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講詞）此外關於最後幾兵復員說：「這次歐美聯軍一共有幾千萬的兵，不到一二年之後，大半可以裁去的道理，便是用這個安插的方法。本大總統這次回粵化兵爲工，便是利用歐戰各國裁兵的方法。」（「和平統一化兵爲工」講詞）至於分析日本武力派的發動戰爭尤爲一針見血。如說：「當被日本之武力派，尙以軍艦進取之利器，彼參謀本部是計劃十年作一戰爭，一八九四年以一最短暫之中日戰爭，獲最豐之報酬，於是因之而長其欲。日俄之役，獲大勝利，所得利益亦非較小。最後以一九一四年之大戰爭，復加入聯軍以拒德國，而日本以出力最微，費財至少，竟獲一領土，大如未戰前之羅馬尼亞，人口衆如法國之山東。由此觀之，在近三十年間，日本於每一戰爭之結局，卽獲最厚之報酬，無怪乎日本軍閥，以戰爭爲最利益之事業也。」（「實業計劃結論」）

以上所述的都是關於過去的戰爭，至於未來的戰爭呢？國父於此亦有一個觀察，我想附帶一說。雖說「未來是不可知的，」「人類的眼光不能透視將來」，但是人類總是用盡觀察力與想像力打破這個悶葫蘆，來尋找答案。先知先覺者對於將來之變化雖未能作詳盡的豫言，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總可以推知將來的趨勢，政治如此，軍事亦如此。

國父對於世界未來戰爭趨勢的觀察，不同於一般戰爭小說家的描寫，也不同於一般星相家的預言，

他依於世界進化的情勢，認為將來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亦即以思想主義為中心的戰爭。這是兵學上一個共通的原理，可用以說明過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可用以說明未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國父說：「就歐洲戰爭的歷史說，從前發生國際戰爭，最後的歐戰，是德、奧、土希諸同盟國，和英、法、俄、日、意、美諸協約國，兩方戰爭，經過四年的大戰，始筋疲力盡，雙方停止。」以後的戰爭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今日德國與歐洲受壓迫的國家，可謂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情相濟，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那些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國家，拚命一戰。推測全世界，將來自種人，主張公理的，實種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自種人主張強權的，和實種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大戰之趨勢。」（「民族主義」第一講）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國家與強權國家，亦可以說是公理戰勝強權。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卻又出現了一個專講強權國家——赤色帝國主義蘇俄，即蘇俄在大強權者史達林的統治之下，完全改變了革命成功初期「抑強扶弱，應當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全）作風。不特凌弱且侵強，不特壓富且欺貧，專在世界上伸張霸道，製造不平，欲以蠶食的方式征服全世界。所以現在全世界各民族國家不分自種人或實種人或其他種人，凡受其侵略者莫不同病相憐，聯合起來作堅決的抵抗。儼蘇俄這樣不斷地侵略各國，勢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在這一場大戰中，由於我們主張公理的民主國家——思想正，力量大，必可戰勝那主張強權的俄帝集團，如果再沒有強權者的繼起，則世界從此可臻於永久和平康樂之境。

（註）馮自由先生於三十年七月由渝給我的信。

十二、結語——知難行易的軍事上證明

國父的革命戰理，真是博大精深，我的研究，暫止於此。惟對「知難行易」的學說，我想在這裏試從軍事上證它一個證明。這個學說是有其普遍性與必然性的「凡知皆難，凡行皆易」的一貫學說。

國父爲建立這個學說，便著孫文學說一書。不憚其煩，連篇累牘，列舉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大例證，使人人容易了解「行之非艱，知之維艱」的道理。並打破過去「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謬說。又從人群的進化上作進一步的證明，就時的方面分爲：「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之後，爲知而後行之時期。」此三時期，以第三個時期爲歷史發展最難的時期，足證知爲難，行爲易。就人的方面分爲：「其一先知覺者，爲創造發明。其二後覺知覺者，爲做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爲竭力樂成。」此三系人，在古今社會上都以第一系人爲數最少，亦爲知難行易學說之左證。還有「國父所謂「知」，決不是泛泛的知，空談的知，乃「真知」，即科學的知。正如 國父說：「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又說：「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決無所難。」其意在勉人力行。

依上所述「知難行易」的道理，我們也可以在軍事上找到證明：發明射擊原理較實行射擊難。策定作戰計劃較進行作戰計劃難。設計架橋難於執行架橋。設計要塞難於構築要塞。定典範令難，行典範令易。（你看典範令不知是積多少次戰役的經驗教訓及多少專家的心血而成）推而至於發明飛機、大砲、坦克、雷達、飛彈及原子彈等亦比製造和使用爲難之又難。至於軍事的進化亦可分爲「不知而行」，「行而後知」及「知而後行」的三個時期，即由古代的「不知而行」時期，進化到中古的「行而後知」時

期，再進化到近代科學發明之後的「知而後行」時期。就軍人說，亦可把最高統帥普通軍官及士兵各階級分爲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及不知不覺者，由於此三系軍人相需爲用，協同一致，當可完成戰勝攻取的任務。凡此均可證明軍事上的一切，亦爲「知難行易」。在這裡我們更應明白的，像孫子兵法十三篇與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實爲千古不朽的兩大兵典，歷代名將的功業雖有駕乎兩氏之上者，理論上而能駕乎兩氏者實無一人，亦足證「知」的難能可貴，孫克兩氏爲先知先覺的兵學大師。又從孫克兩氏的理論來看，如孫子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克氏說：「苟欲成爲一個優秀的指揮官亦必須具有優秀的智力，其階級愈高，則所必需的智力亦愈大。」亦可證明「知」的重要性。其次像孫臏的滅灶計，田單的火牛計，韓信的背水陣，孔明的空城計，李愬的雪夜入蔡州，拿破崙的越阿爾卑斯山，漢尼拔導演的康納殲滅戰，興登堡指揮的坦能堡殲滅戰，這都是證明他們是先知先覺的名將，爲歷代軍人所罕見者。又，當先知先覺的統帥所策定的戰略戰術來殺敵取勝，部屬因限於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直至戰勝之後，仍有不知其所以致勝之道，正如孫子說：「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所以一個軍隊在先知先覺的統帥指揮之下，全體部屬只有恪守紀律，奉行命令，絕對不容有所懷疑猶豫於其間。

國父知難行易的學說，真是千古不刊的定理，由此學說推演出的結論：一是「能知必能行」，一是「不知亦能行」，一是「有志竟成」，都是我們革命軍人應當把握着的。先說「能知必能行」：前節已說過 國父所謂「知」，是眞知，即科學的知。國父又說：「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研究屢次不錯，始認定爲知識。」（「國民要以人格爲國」講詞）所以我們軍人的智識學問，不是徒在書本上死讀死記，及在課堂裏專心聽講，所可切於實用，須從實地觀察，實地演習，或在實戰中去理解它，去把握它，然後才不會重蹈趙括徒讀父書的覆轍。克勞塞

維慈說：「一切智識雖然大半得自推究事物的性能，而一切事物的效用必得經驗而後知，尤其是軍事智識的基礎在經驗，所以兵學是經驗的科學。例如火藥的效用，如雷聲經驗只憑想像與測算，實難得知其真相。所以自古以來，一切物質兵器的效果，必須反復試驗。子彈藉火藥之力一秒間飛行千尺，固可用測算而知，然其受空氣與重力的阻礙命中目標實際的效果，必由經驗而後知，物質的效果如此，精神的效果也是一樣。」又說：「所謂危險，所謂勞力，所謂情報，所謂障礙，都是戰爭特質的要素，從它們對戰爭動作的作用上面觀，可總稱為障礙，要如何方能克服這種障礙，一言以蔽之曰：『習慣』，常有慣戰能使身體忍耐大勞苦，惟有慣戰能使精神抵當大危險，惟有慣戰能使判斷不為眼前印像炫惑。例如吾人初入暗室，瞳孔放大，吸收所有的發光體，漸漸能辨別諸物和明處一樣，慣戰的情形大抵是如此的。戰爭的習慣，也可以由平時適當的演習，得着類似實戰的經驗，這要在演習中使各種障礙的一部份出現於實際，使指揮官磨練其判斷力與用意的周到，可以得很大的利益。」這樣所得的軍事智識學問，才是真知，科學的知，自然可以達到「知之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的境地。所以我們革命軍人今後的求知，決不可讀死書，應從演習上去求知，絕不可怕戰，應從戰場上去求知。這樣的知，才是百戰百勝的「知」，才是建功立業的「知」。

雖然「能知必能行」，但「不知亦能行」（包含知不完全的意思）。比如對敵人昏混不明的時候，如下最大決心，實行冒險攻擊，亦可以制勝敵人，並可以從攻擊行動中去獲得更確切的情報，以為我進一步行動的根據。假設我們因對敵情不太明瞭，必得取得更完備的情報然後動作，固會錯過「戰勝之本」的寶貴時間，反會給予敵人以獲得關於我更確切的情報的機會，又會喪失敏捷攻擊及初步獲勝的利益。至於「有志竟成」，這是教我們要完成任務，建功立業，必須立下堅定不拔的意志，發揮奮鬥精神力量來實踐力行。否則敷衍塞責，畏難怕死，決無成功之理。所以 國父說：「夫事有順乎天理，應

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與建國等事業是也。」依此而論，我們此次反共抗俄，就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大事，又爲先知先覺的最高領袖領導大家一致奮鬥到底，必可取得最後勝利，將如 國父發動推翻滿清，中經十次失敗，終底於成。

最後，國父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以超卓的天才，遠大的眼光，高深的學問，豐富的經驗，精勤的努力，在立憲立功上是不朽的，在立言上也是不朽。他的戰爭理論是繼承中國固有兵法的精神，吸收世界各國兵學的菁華，加以自己的實踐獨創而成。他本着他的戰理戰法，推翻了滿清，又完成了每次討賊軍事的勝利，所以他的戰理戰法，是必勝的，又是救國救世的。這是五千年來中國兵學上的第一大飛躍，也是證明反共抗俄戰爭依此而行必可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要研究和發揚 國父的革命戰理，

我們要運用和實踐 國父的革命戰理。

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李浴日著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增訂三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世界兵學社發行

台北縣中和鄉竹林路三巷十二街四號

辦事處：台北廣州市梧州街二十五號

各地書店均有代售

臺北特約
經售處

臺灣旅行社各埠服務處
武學書局
上海書報社
臺灣書店

兵學精華·制勝要訣

孫子兵法新研究

李浴日譯

國防部(中)網糾字第156號代電核准發行

全書都三百五十頁，註解新穎，具有特色。

克勞塞
維慈

戰爭論綱要

李浴日著

國防部(中)網糾字第285號代電核准再版

全書都二百六十頁，提綱揭領，精華呈。

兵

學

隨

筆

李浴日著

國防部(中)照煦字第177號代電核准發行

全書都十二萬言，共二百則，頗多創見，並有趣味。

備有目錄，函索即寄，歡迎郵購

台北縣中和鄉竹林路三卷十二街四號

世界兵學社發行